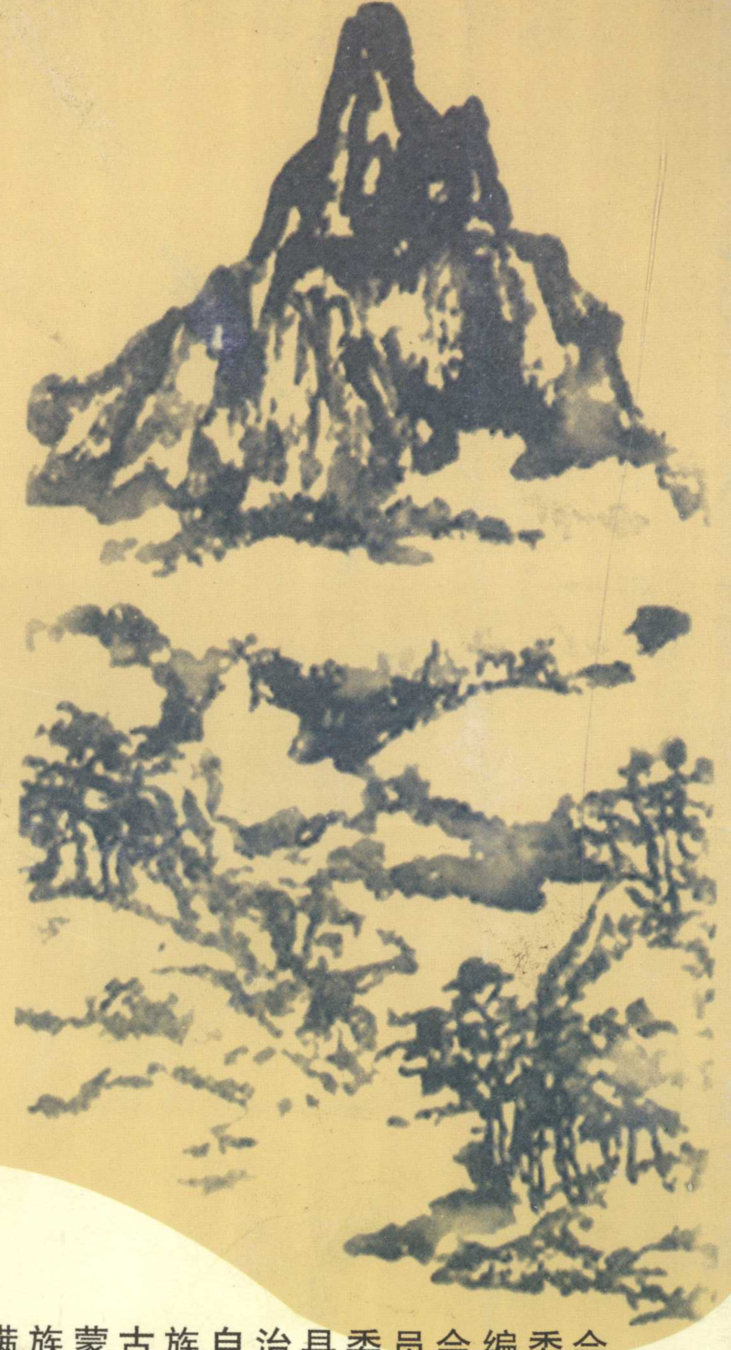
围场文史资料

第8辑



政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委会

围场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委印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宏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印张 8.34　开本 1/32　字数 128000

印数 1000册　2006年12月印制

冀出内准字(2006)第AC051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借鉴历史 展望未来

[illegible]

2007.1.25.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崇尚科学 服务人民

艰苦奋斗 开创未来

王志恒

二〇〇七年一月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存史资政
团结育人

胡熙宁

2002年一月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府县长

做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发挥鉴史资政育人作用，积极为建设和谐围场服务。

孙祥

二〇〇七年一月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协主席

第八辑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孙　祥

副主任:丁铁军　吴凤翔　李秀荣　白雅琴

编　委:丁铁军　吴凤翔　李秀荣　白雅琴

　　　　赵振玉　郑晓东　高万广　段志芳

编　辑:王福兴　白雯萍　陈沭辛　杨振国

　　　　尹志杰　张秀超　彭立平　韩玉文

　　　　孟　阳　张桂茹

主　编:王福兴

副主编:段志芳　白雯萍

前　言

闻名遐迩的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以其浩瀚的林海，辽阔的草原等自然景观引来四海宾朋、八方游客游览观光。这块位于河北省最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神奇美丽的土地，早在数百年前，这里就留下辽、金及元代游牧射猎、征战的足迹。时至清代，更有康熙皇帝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岁举秋狝盛典载入史册的重大政治、军事和娱乐活动，满、蒙、汉等多民族文化融合，使这里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独具特色的山川名胜，珍贵的历史古迹，人文民间传说，回荡着历史沧桑的足音，值得人们追溯回味。为建设这美好的家园，有众多志士仁人，抛头颅洒鲜血，舍小家为大家，留下了很多知兴替、展智力的宝贵精神财富，令人追昔抚今，思索人生，不断去求索，去攀登。

追忆历史，使我们的头脑更加理智，借鉴历史，使我们的思维更加宽广。只要你用心读一下历史，就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美妙的世界，是先人开启的；秀美的围场，是人民创造的。岁月如梭，岁月如歌。经历过的人，每一段回忆都异常珍贵，未经历的人，认真品读也会有所借鉴，获益良多。历史是一面镜子，正邪善恶只要一照就会显

露出来。写历史是为了宣传和证明历史，更重要的是让后人借鉴历史，推动历史不断前进。这是我们编印第八辑文史资料的初衷。“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涵盖面广，借鉴性强，坚持文史资料的“三亲”原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史为镜，以古鉴今，是我们的一贯追求。

为辑成此书，文史研究员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众多知情人，耗费了无数心血，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历史跨度长，原始资料残缺不全，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政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围场县的土地改革

杨振国

农民最基本生活靠耕种，土地是他们生活依赖的根本所在。在当时农民分得土地后激动地说出："金榜提名三年有遇，农民分地千载难逢！"这是贫苦农民从心窝子里溢出的话语。也是翻天覆地的喜事一桩。1945年祖国光复后，中共围场县委根据中央政策领导和发动全县人民进行"减租减息"，部分村分青苗，开展护地运动，反报复斗争，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风暴土改"、"纠编"和边沿村的"和平土改"，历时四年完成了全县的土地制度的改革。

一、旧社会土地占有和农民生活

本县的农业生产是在上世纪初形成的。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初开围，在县东部开始了耕作和养殖。光绪32年(1900年)全面开围，从冀鲁等省谋生或逃荒的人来到这里，人口逐渐增多，但

土地占有率不高。[1]土地占有方式：有钱大户向官府设置的垦植局挂地开荒，地主们占有大量基础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到民国元年（1912 年）改围场厅为县，农业经济已成主体，民国 22 年（1933 年）日寇侵占前，经过 20 多年的时间，鸦片种植逐年增加，但是国人认为是一害，政府也屡令“禁种”。日寇入侵后，成为掠夺奴役农民的一条渠道，扩种面积不断加大。

当时的情况是掠夺残酷，烟民日多，民族经济受到摧残，经济发展缓慢。其方式：

（一）地租：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租种地主土地要进行交租。交租的方式分死租和活租。死租是根据土地好坏议定，平地一般亩交斗租，含原粮 70 斤；山地 60 斤。活租（耪青）收获后按比例分粮，一般是对半分，秸杆归有畜户。也有地六劳四分的。一般不论死租还是活租，都要交一定的银元作抵押。亩交押租银一元至二元，由地主无息使用，一旦交不上租，以押租银抵顶。收成好坏地主不管。有的还有附加租，即按租地亩数每年交一定数量的柴、肉、蛋和猎物，还有出差役、劳工费等。此外，还有经营地主，本身少地或无地，从

① 见《围场厅志》

大地主手中租来转租，从中渔利，叫做“二地主”。

(二)高利贷：多数佃户口粮不足，向地主借口粮，所借之粮一般春借一(斗)还二。或“一米三谷”，即春借一斗米，秋天还谷三斗。半年多时间利加一倍。遇有天灾人祸向地主借钱，轻的是月息三分或五分，重的是加一，月末交不上就利息加本滚息，叫做“驴打滚”。

(三)佣工：劳动者给地主佣工。分长工、月工、短工(日工)。长工(打头的)工期农忙八至十个月，工资一般小米一石(斗米 95 斤)至石六(斗)；短工工价 2—3 角钱(折米价 4—8 斤)。遇荒年灾欠，扣完地租无过冬之粮，佣工只有逃荒。

二、土地改革

1945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冀东挺北支队进县城，围场宣告解放。围场建立民主政权后，头一件事就是发动群众围绕土地问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减租减息”和“反报复”斗争。于同年 10 月建立了民主政权之后，首先在县城召开了斗争大会，镇压了伪满“阿片纳入组合”的董事张树儒和伪警尉杨景衡，除掉这些恶霸汉奸，群众为之振奋。

1945 年 11 月党中央发出建立巩固东北根据

地的指示，中心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清算斗争，解决劳苦大众的生活、生产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热河省委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解放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恶霸、地主、汉奸、特务进行控诉、清算，发动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生活的迫切要求。

1946年2月，城关区成立了清算委员会，农村开始组建农会，各区都开展了“反霸”清算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指示：“我们在整个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要求在今年底全部获得解决，极大地巩固解放区。”省、地对此十分重视，两级派来工作团，以解决土地为中心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试点。省委工作团以工会主席郗占元为团长，于旧历年三十出发，正月初一到围场，以江明为工作组长，在小锥子山一带开展工作。另一组在克勤沟区为点。工作成效显著在报刊上介绍了工作经验，对全东北区影响很大。热西地委工作团是以专署秘书主任和王克东带队，在半截塔一带开展试点，带动全区，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建立基层组织工作等。都是从解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如“减租减息”开始入手，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一般称之为“双减”运动。

1946年10月10日，由于国民党的进攻，我方战略北移，到了经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地主乘机反攻倒算，进行反把，疯狂杀害我地方干部和骨干分子。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县分为围场(在西部)和围北两个工委，指挥对敌斗争。

1947年5月15日，我军第二次解放围场，发动群众对敌占时有罪恶活动的恶霸、地主进行了镇压斗争。在县城开了公审大会，斗争了大地主、国民党县参议长张允恭(绰号张四皇上)，公诉后执行枪决。同时，在全县展开了反报复运动。八月上旬县委(当时称政治处)在道坝子区召开了现场会，中心任务是围绕解决土地问题，开展反报复斗争。恢复基层组织。工作方法是"一点带三面"在一个中心村带动三个村，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收到较好的效果。但因诸多因素，当时也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表现在对地主、坏分子的斗争上，有"每斗必杀"，叫做"剪草除根"，如斗争了地主，连其子女也要除掉，半截塔区西顺井村清算了地主，株连在小学读书的子女也被处死。还有东沟村要埋掉被斗争户的婴儿。这件事引起了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同志的重视，立即派人来检查制止。这是不顾政策，违背民意的行为。反报复斗争持续到11月末。

在此期间，热河省命令恢复围场县，把围北的新拨、朝阳湾、棋盘山、克勒沟、腰站五区划回，仍称围场县。

(二)“风暴土改”和纠偏

1947年7月17日至9月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热西地委分两片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东片会址在半截塔由地委领导王平水、罗天同志主持，围场、隆化、滦河三县县委书记参加，出席会议有三县干部和从边区新分配来的干部共百余人。12月12日开会，会期十多天，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由地委宣传部长罗天传达土地会议精神，接着开展了“三查”即查阶级出身，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进行反右倾，评定成分和“搬石头”。12月20日以后，大会斗争进入高潮，对围、隆两县干部点名批斗了十几名，抬出“某干部被垂帘听政”等扩大其词，摘掉帽子、眼镜，扒光衣服，坐了“禁闭”等等。第三阶段部署工作。12月24日由王平水同志作了“地委工作总结与开展工作意见”的报告。会上制定了土改期间工作人员十大纪律：

一是与地主富农断绝一切联系。

二是不挑拨中农、贫农的团结。

三是不贪污群众斗争果实。

四是农民开会时，不压制少数农民发言。

五是允许农民批评和反对自己的意见。

六是禁止打人、骂人，禁止嫖"破鞋"和调戏妇女。

七是无动员证不得动员勤务。

八是不接受一切礼物。

九是不标新立异，不进行两面派和小组织活动。

十是见违反纪律的必须检举，不采取自由主义。①

会后热西地委组建工作团，把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同志开赴丰、滦、隆三角地带去开辟新区，经受考验，在这段工作中，错批和牺牲了许多好同志。

土地会议后，县集中了未参加半截塔会的干部，用地委会议同样内容，在县城进行了整风。接着在全县(除新拨、梁前四村、坝上五村)铺开了"风暴"土改。县、地两级都有试点：城关区的车道梁村是县委书记王克东的点；四合永区广义成村是县长胡为乐的点，银窝沟区的石匣村是县农会

---

① 见《半截塔土地会议》承德党史通讯。

主任郭春林的点，克勒沟区大水坑村是冀察热辽行署权哲民厅长的点，半截塔区的要路沟村是县委民运部长徐亮的点。全县组成25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由延安调来的同志充实到各区工作队，以区划片，由县委统一领导，每片为一个工作组，由区委负责同志为组长，每个行政村派1至2名脱产干部指导，开展工作。第一批铺开191个村(当时全县240多行政村)。各村清理了干部队伍，组织了农会，充实了积极分子队伍，从1948年1月至4月间，分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

1、访贫问苦

工作组进村，首先找贫雇农户进行访问，了解掌握情况，和苦大仇深的人交朋友，作为依靠对象，这叫作“扎根子”。由这些人联系一些贫苦农民扩大贫雇农阶级队伍。通过这些人了解该村过去的阶级斗争情况，地主压迫剥削等，以及干部路线，剥削阶级的罪恶等。如果原来的干部发现有路线不清，不可靠等，就把他们甩开，跳出他们的安排，这就叫“跳圈子”。同时，对贫雇农队伍要进行阶级教育，公布地主剥削罪恶史，让广大农民知道地主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认清谁养活谁的问题。同时对干部们进行实地阶级教育，许多城市学生出身的干部，在这次土改运动中坚定了阶

级立场，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语言。通过阶级教育、土改政策的教育和劳苦大众的忆苦等活动，阶级队伍很快形成，成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会，掌握起全村地主、富农等剥削的基本情况，打下了下一步开展斗争的准备，时期约半个月左右。

2、展开斗争

1947年农历腊月初八，全县统一行动，把罪恶较大的地主、富农家的当家人抓捕到村农会，有的地主全家扫地出门，进行查封。有许多贫苦农民在十冬腊月没穿上棉衣，向被抓捕的地主换了衣着。对民愤极大的剥削分子进行了大会斗争。对恶霸、坏人斗争后，交由农民法庭判处死刑，由群众当场处死。同时展开了挖浮财，有的地、富分子隐藏转移了浮财，群众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到交出财物后才肯罢休。起出的钱、粮、大烟、物件、农具、牲畜，交农会统一管理，造账保管。有的村一些较富余的农户，惧于运动，自动献了粮物，这是斗争的正面。另一方面，恶霸、地主们的阴险手段也十分狡猾，他们耍花招，施诡计，千方百计逃避斗争。造谣说："共产党长不了，隆化的国民党就要打过来了！"等进行恐吓。使出各种花招，简单总结有24种之多。有美人计、酒肉计、拉亲计、苦肉计、反间计、连环计、收买计、反扑计、栽

脏计、暗杀计、恐吓计、攻守计、窜唆计……，有些不坚定分子被拉过去，暗地给敌人办事，有的耍两面派手法，还有的积极分子被诬害致死，有的坏分子勾结国民党自卫队杀害农会干部等，用出各种手段，企图逃避斗争。但是经过发动斗争，被压迫的广大农民不怕恐吓，不怕昔日"老爷们"的威吓，统统打翻在地。棋盘山甘沟门的地主"老财迷"被解放了的妇女用铡刀铡了！伪满洲国的县长潘瑞鳞的家被斗了；碑亭子的国民党参议长"张四皇上"府第被农民们冲进去给分了；克勒沟官僚地主曹子斌的大院被斗争，把人给赶出去了。贫雇农士气大长，农会名气大振，克勒沟街国民党乡长冯有余被扫地出门，安了农会，过春节大门春联写的是：推翻地主；消灭封建。横批是：农民当家。

3、土地还家

经过斗争和挖浮财后，到了春耕生产的准备季节，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分配土地阶段，以便开展春耕生产。对土地的分配和分浮财，都以行政村为单位，处理办法（主要是土地）综合各点上的经验，有以下四种：

（1）中间不动（指中农）两头打乱平分。把地主、富农和贫农土地放在一起，按人口平均分配。

（2）总有土地打乱平分。全村所有土地按全

村人口平均以后，把土地按好坏搭配分给各户。

(3)抽肥补瘦。把地主所有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拿出来，(有的村把富余中农的多余土地也动了)分配给贫农和缺地的下中农。

(4)老牛赶山。把全村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均以后，按户应得数，先由佃户、贫农挑选，依次是中农、剩下的分配给富农、地主。

上边办法，二、四两种有侵犯中农利益行为。特别第四种，有左的倾向，后来停止了执行。

4、建立基层组织　巩固土改成果

通过运动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为基层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经过酝酿，选举了村长、副村长。对农会、武委会、妇联、青年等组织的主任、委员的人选作出了安排，健全了组织，巩固了土改成果。同时由民主推荐提名，党组织审查，从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中培养了大量的党员，扩大了党的队伍。

农民分得胜利果实后，为了保卫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除战勤出担架外，许多村青年民兵成建制参军上前线。半截塔区一次参加解放军为一个营，全县动员兵员万余人。为支援解放隆化战斗，民兵们抬担架、救伤员、运粮草和其它支前物资。并且远

征、支援了平津及热河省会的解放。

5、土改纠偏

土改运动是在尖锐地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在基本群众心里上就有一种阶级对抗思想。加上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时，在态度上有“宁左勿右”的情绪。此外在执行工作过程中，还有的带有个人情绪，这就难免给运动带来不健康因素，致使某些村出现了过“左”的偏差，表现有打击面过宽，侵犯中农利益，个别村错杀了人等，加上敌对势力的造谣破坏，致使土改运动后，出现了严重的灾荒。

(1)打击面宽的情况：据县委副书记徐亮在1948年半截塔区那林沟 的调查，当时全村267户1156口人，被斗争的48户263人，分别是户数的18%；和人口的22.7%。这些户内有地主13户69人；富农7户，41人；中农19户，132人；贫农4户，26人；其它5户5人。依据1933年文件定成分以后，应该斗争的21户115人，占户数人口分别是8%和10%。[①]打击面宽了一倍多。错定的原因是：依据不准和“沾包”被株连。这被错斗的27户中错划了19户，被株连(给地主存物品)的8户。错划的户中有把招夫养子的丈夫认为是佣工；有

① 见徐亮《那林沟村的土改纠偏》、《冀热察导报》

的把小土地出租者认为是地主，还有因和干部们有隔阂把中农诬为富农。

(2)错杀人问题。据1948年王克东书记在银窝沟区查正、画山、永和栈三个村调查：查正村有295户1195口人，杀了12人。其中有地主分子，还有地主子女，也有外来户等。根据群众反映该杀的有3人；错杀的5人；其它4人是可杀也可不杀。其原因是执行土改的干部郭春林(县农会主任)凭“匣子枪”的权势，执行政策的偏差造成的，群众有意见，上级不满意。

(3)纠偏。因运动中出现偏差，把团结的对象推向敌人，组织了全面纠偏。首先学习了农村划分阶级的1933年两个文件，按剥削量划定成分，进行对照：从那林沟村的材料中看出被侵犯的中农等户几乎近应被斗争户，面是比较大的。因此按政策衡量，把不够地、富的户做了纠正，从而划清了农村阶级阵线，团结了中农，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对被侵害利益的中农等户，通过纠偏，改正了成分，赔偿了损失。

6、新拨等区、村的和平土改

新拨区和梁前四村、坝上五村的土地改革，于1949年冬由热河省委组织工作团，加上新拨区的干部统一组成工作团进行的。团长是省党校副校

长张广经，副团长由新拨区委书记王文杰担任，成员100余人。根据解放老区和半老区土改文件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次进行得比较平稳，因称之为和平土改。

新拨区(包括山湾子)共40个行政村，这次进行23个村，土地调剂的13个村。土改村共有5201户，23116口人，依据剥削量划为地主的248户，划富农的227户，计地富475户，3727口人，分别占户数人口的9%和13.5%的打击面。其中岱尹城打击面是总户的14.2%；人口16.8%，为最宽的村，最小的是三道沟村，分别为户的7.8%，人口的9.8%。扣押了地、富、匪首165人。

对土地、房屋、财产的分配：把地主恶霸清出了原住的大院，一般中小地主，富农住房没动，只是将其多余房子让给贫雇农住。

土地分配，是按平均分配与抽肥补瘦相结合的办法处理的。宝元栈村是给贫农分两亩好地，富农也分两亩好地，给地主一亩好地，一般土地平均分配。其它村都是把地富土地打乱，由贫雇农和地富统一分配。对中农户的土地是用抽补调剂的。

牲畜的分配，原则上是贫雇农人口四口以上户分一头牲畜，地主留一头次牛或一头驴，富农留

一牛一驴或一头大牛。

粮食及浮财分配是：全区共斗争出粮食440303斤；山药427968斤；大烟土1620两；银子358两。分配方法：把银子交银行兑成现款，大烟一部分由公家折价收回，现款分给应得户。粮食和山药用到生产上，但有的村灾民生活困难，如三义永村等，暂分给灾民每人四升粮食渡灾。[①]

御道口坝上5村，多数是伪满时移民开垦土地，没有大地主，只做了一次发动教育，确定地权工作。梁前4村（今四道沟乡）地近隆化县，当时隆化是敌占区，这次土改比较平稳。

三、伟大的成就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从1946年贯彻“五、四指示”，到1949年冬的和平土改经过减租减息、反报复斗争，“风暴土改”到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全县的土地改革，其成就：

第一，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经过斗争从政治上摧毁了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农民们掌握了大权，把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进行了批斗，把

---

① 见《围场县新拨区土改工作总结报告》

罪大恶极的恶霸判刑当场处死，使他们威风扫地；有的还戴上“帽子”进行管制。他们再也抬不起头来。

第二，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是打出日本鬼子后，实现了民族、民主两大革命的胜利。经过这场斗争，把全县3614户地主富农的75万多亩耕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3.2万多户贫雇农，让这些从事农业劳动人得到了耕地、牲畜、口粮等，能够进行劳动生产。而且大部分区、村，把大地主从他们的深宅大院赶了出来，佃户农民住了进去，生活得到安定。

第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从1949年完成了全县的土地改革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生产恢复工作。消除匪患，清剿了白金辉，张桐轩、伊相臣、陶汉选、杨万森等大小匪帮50余股，约5000多人，安定了社会。开展了忌大烟运动，成立戒大烟的逐级组织，把全县55200多烟民，戒了大烟。这些被旧社会的“人变鬼”，在民主政府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从“鬼变人”，成为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还有对灾区拨了救济粮、救济款和衣物，向农村贷出了扶助生产的贷款。到1953年经过三年恢复以后，耕地面积达到1180900亩，比1948年扩大了37万亩，粮食总产量实现2528万

(市斤),是1949年建国时的三倍。实现了县委提出的“奋斗三年有吃有穿”的口号,推动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第四,保卫了胜利成果。土改运动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真诚的拥护。翻身后的贫苦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军参战。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妻送夫参军保卫家乡的事迹。为推翻蒋家王朝,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全县出兵员一万多人。还有民工支前、送粮、送草、做军鞋、出担架。支援解放隆化、多伦、张家口,支援了辽沈、平津战役。在支前中有的民工拿起枪和解放军一起战斗而立了功,是解放战争中的巨大力量。

第五,产生了新型生产方式。土改完成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组织,互相帮助开展生产运动。有临时换工插具,有季节性互助组,有长年互助组。到第二年(1949年)全县有互助组1786个,互助耕种面积17486亩,这些初级互助组织,展现出解放后的农业新气象。

四、结束语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围场几经起伏,历时四载,虽时间较长,但党和政府一直抓住了社会矛盾的焦点,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当成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全力去抓,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也让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确实得到了翻身。让围场人民终于主宰了围场大地。

在运动中，党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让群众明确方向，勇于斗争，成就是巨大的。但作为运动的领导在总揽全局的同时，更应注重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把上头精神学深吃透，给群众讲深讲透，这样就使运动的发展更健康。反之对上级精神理解的不够充分，运动中的某些群众的思想状况认识不足，才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甚至少数村错杀人的问题，这样在当时就很容易把团结的对象推向敌方，搞乱农村的阶级阵线。虽然在每个阶段，历次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及时作了纠正，但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但重要的是大量的艰苦工作是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引导农民。农民长期从事小生产，是小私有者，患得患失心理十分严重，特别是 1946 年 10 月以后，国民党占据了围场，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杀害我干部和基本群众，激起群众的一时仇恨，因而在反报复斗争中，出现了每斗必杀，“剪草除根”等，在“风暴土改”中也有“是敌就斗”，甚至和干部

平时有隙的人,也“找楂斗倒”。违背了土改政策。更有甚者,借运动杀害无辜,造成脱离群众,给敌人有可乘之机,这些都是不能忘记的。正如热西地委所批示:“在那里工作是执行一条盲目的乱杀方针……利用了自己的工作地位和匣枪,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拒绝了正确意见,这种作风是不好的”。[①]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把土改运动的成绩看得多了,问题看得少了,对一些不利因素缺乏认真的分析,结果出现了1948年夏暴发了全县范围的灾荒,出现了荒地近一半以上,重灾村荒地更多,许多人逃荒外流,饿死人的现象也相继出现。这次逃荒人口达5万余人;从1—9月份不完全统计病饿死人达6649口人。[②] 当然灾荒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造成,如日伪残酷掠夺长达13年之久,加上国民党发动内战,土匪抢扰,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烟毒为害等等,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灾荒的暴发。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只见到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对灾荒来临认识不足,结果灾荒暴发了,工作就陷入了被动。后来省、地给了大力支持,拿出大批粮、款,物资救济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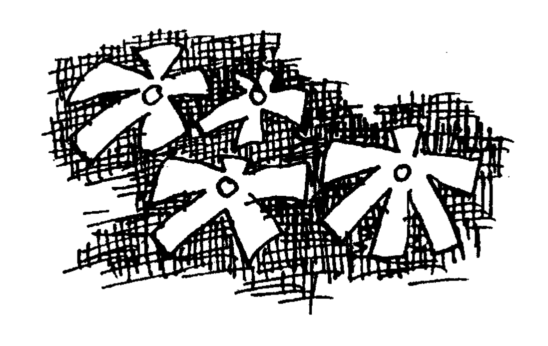
---

① 见《查证村枪决人犯调查》王克东1948年

② 见冀热察导报,1948年。

渡过了灾荒。

围场的土地改革运动，总得看，成就是巨大的。群众基本都发动起来了，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设了一个新政权。围场劳苦大众从此站立起来，为建设美好的家园一代接一代的在这块热土上奋斗不息。



围场县的“镇反”运动

车继国

一九四五年，祖国光复之后，国民党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从事破坏和捣乱。有的破坏生产、制造谣言、杀人放火、私藏武器；有的利用封建迷信发展特务组织。在这些反革命分子当中，第一类是杀人成性的惯匪匪首。这些土匪不只是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更主要的是残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半截塔区北沟村于万廷，伪满时当汉奸，认贼作父，残害人民。国民党侵占围场后，加入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牛刚自卫队。1947 年秋后带领队员到本村大肆抢夺群众财物，还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同牛刚一起制造了远近闻名的“北沟惨案”，杀死干部群众 10 多名，仅廉海一家四口人竟被杀死了三口，东沟村贫农团长陶山哥俩全被杀；阿抹村匪首李永亭（匪名李老号）流氓出身，十九岁为匪。一九四六年六月，组织了二十余名土匪活动于道坝子一带，打死八路军战士四名，后又向半截塔一带为非做歹。国民党侵占围场后，又当

了国民党燕格柏乡自卫队小队长，带领队员30余名到处搜抓干部群众，袭击我区村政府。一九四七年三月，又与刘亚轩自卫队一起活动，继任小队长。同年六月，带领匪徒三十余名到燕格柏乡阿抹村抢夺农民粮食、大烟、衣服、鸡、猪等财物。为了弄到大烟，将农民董子珍夫妇毒打三次，更残酷的是将董架在锅腔子上用火烧，将董烧得死去活来。七月又将贫民团长张登会、农会干部张玉晨二人绑到坝外杀死。八月又带匪队到本村阿抹南沟向农民葛有要枪，并残无人道地将铁棍烧红插入葛的肛门，将葛活活烫死。

第二类是国民党的自卫队长，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不但抢夺民财，并且组织反动武装，残害人民，袭击我区村政府。如自卫团滕团副团长张国祥、中队长王连庆、杜云清、贾俊等，在伪满时有的是惯匪，有的是伪团长，他们于一九四五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于十一月到我克勒沟区抢去大枪二十一支及洗劫部分商户。一九四七年九月袭击我隆化头沟区政府，抢去大枪十八支，杀死区长后又袭击我喀喇沁小牛群区政府，抢去大枪十多支，杀死区长、区委书记，仅陈贵廷一家五口竟被杀死四口。

第三类是勾结日伪蒋军、迫害人民的恶霸地

主。他们狐假虎威，抢夺农民已得的胜利果实，进行反把倒算；有的寻衅毒打村干部和一般群众；有的残害无辜。

第四类是进行特务活动的道会门头子。他们以发展道徒为名，从事特务活动。

第五类是打入我机关、队伍内部，专门从事反革命活动，组织叛乱的敌对分子。对这些彻头彻尾的反动势力不予镇压，人民就不得安宁，国家政权就无法巩固。

为了稳定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政权，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使这些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历史的惩罚，本县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到一九五五年末，在全县范围内先后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一次镇反(一九五一年一月——一九五三年四月)

根据中央关于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指示精神，在县委、县人委的直接领导下，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政府及公安部门检举揭发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写信揭发检举，有的亲自口述，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这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

子。从1951年1月至4月,全县共收押土匪48名、恶霸11名、特务4名、反动道会门头子9名,总计72名。

1951年5月4日夜,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次共捕获土匪70名、恶霸18名、特务12名、反动道会门头子13名。之后,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妇女、学生、教师、人民代表组成了宣传队伍,召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处决这批反革命罪犯。县政府于1954年6月9日召开了第六次人民代表会议,贯彻了镇反政策。公安局长张敏三作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之后,将县法院、省法院批准判刑的35名反革命分子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25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2名,判处有期徒刑的2名,释放管制的2名,做其他处理的4名。6月12日上午9时许,在城关市场的广场上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惩办、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会上,由公安局长张敏三提起公诉,由被害人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这些反革命分子杀害我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169名,抢夺耕牛309头、马101匹、其他财物若干。下午一时,将这群反革命分子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会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有的向公安人员表示，一定要与政府密切配合，继续揭发检举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人民政权，保护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

自从“第一次”镇反以来，进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只要发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立即向政府告发。县公安局也加紧了对敌对势力的侦破工作，在县内加强了对镇反比较彻底的乡治保组织建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群众监督，对潜逃在外的反革命分子组织力量进行调查追捕。到1953年4月，全县共追捕了这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444名，依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量刑标准，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分别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抗拒改造的均给予了严厉惩处。

镇反判定

1953年2月23日，县委组织省(下派干部)、县、区、村干部59名，分为两个组，在一区、五区的6个村进行了镇反判定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历时九天，总结了经验，以点代面，于3月5日镇反判定工作在全县249个村全面推开。全县原有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239名，经过本次镇反判定撤销了原管制中表现好的和不该管制的151名，继续

管制的88名，发现漏管必管的34名，进行管制的122名，约占总人口的0.5‰，对764名土匪、47名特务、89名反动党团骨干、9548名一贯道徒、343名家庭坛主以上的道首和1728名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嫌疑分子，根据镇反判定的标准，均做了适当处理。对那些日伪爪牙、反动封建道会门较多，而过去工作比较薄弱的偏僻地区（如克勒沟、棋盘山区）以及道教一条线的区进行了重点清理，捕获了道首；对一般村庄主要做了宣传工作，向群众讲明政策，解决了认识问题，纯洁了干部队伍。

经过上述一系列斗争，使土匪绝迹，治安稳定，从1951年到1953年5月，没有发生过大的反革命案件，占总人口80%以上的群众敢于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同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限，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当时全县共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组2309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1953年成为本县社情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第二次镇反（1954年5月—1955年末）

经过第一次镇反和各方面的斗争，县内主要的、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治进攻的形势，国内未被彻底消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不法分子与国外的间

谍、特务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特别是从1954年以后，破坏活动日趋猖獗，他们以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偷盗、纵火等手段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具体表现是，第一，针对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制造谣言，书写反动标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散布"美国要和蒋介石合起来打中国"，"俄国要吞并中国"的谣言；辱骂毛泽东；还有些残余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针对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破坏，鼓动部分入社的社员退社，编些顺口溜，骂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勾结部分犯罪分子进行盗窃。他们作案的对象主要是国公企业和农业合作社。仅1954年到1955年，全县共发生盗窃案63起；有的进行放火破坏，从1954年到1955年，全县共发生纵火案11起，被烧者多数是国有、互助组、合作社的财产和基层干部的住宅。有的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的地、富分子进行阶级报复和反把倒算活动，敌视村干部，向我公安委员、村长、民兵队长等主要干部索要失去的土地和财物；有的勾结反动道会门头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利用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及我少数干部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制造粮食紧张空气，煽动少数群众打骂干部，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的混入机

关、学校和国合企业内部进行破坏、制造事故、挑拨是非、打击积极分子等各种破坏活动。

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从1954年5月4日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广泛开展宣传、训练干部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了调查摸底工作，掌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材料。1955年8月1日，县委成立了镇压反革命审批办公室，到8月27日，共对116份材料进行了调查，经县委、县镇反审批办公室研究报省批准逮捕的86名。

根据省委关于继续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和省政法座谈会议精神，在县委统一布署下，公、检、法三机关密切配合，于1955年9月9日集中搜捕了反革命分子23名、阶级敌对分子9名、刑事犯罪分子17名，自9月9日至10月18日，全县共组织侦察力量奔赴外地捕回外逃反革命分子5名，运动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54名，在大逮捕中，对22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搜查，共搜出撸子枪一支、子弹6发、刺刀一把、大烟籽10斤、反动一贯道书2本、蒋匪少将支队长田庆泽任职名章一枚。年末，第二次镇反宣布结束。

围场的大跃进

杨振国

一、风起云涌的“丰产队”(当时称千斤队)

1958年大跃进,我正工作在那个年代。当时县委、县人委为了推动大上农业,抽调大批机关干部下农村,发动农业大生产运动,我被分配到新拨区任工作组长,全组共六人。北片三个区,担任总指挥的是县委常委王振兴县长。春节刚过,于正月初六县里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下乡工作地,县长王振兴和副县长王志庆与我们同车出发。

当天下午,我们风尘仆仆地到了新拨区,刚一下车区里党、政、青、妇各组织部门的领导,相继出来热烈欢迎工作组的到来。在新拨的小会议室里,两个区工作组成员向县长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打算,县领导听了后很高兴,继后也向工作组成员说明县里这次下来的主张。县长说:“这次下来,要抓组织,推进科学种田,在北部把优良小麦甘肃96号品种,作为首位,进行推广,这个新品种丰产性能好,抗逆性强,加上科学管理,准能推动农业

大发展。必须有创丰产田的专业组织，把握性更大。”副县长王志庆因势利导的说：“我们(包括县长)到山湾子区搞丰产田，建立搞丰产田的专业队，把新品种小麦种好，推动农业大上。”区共青团书记张莲芳听后，跃跃欲试；区委书记、区长积极请战，承担推广良种，大上农业的任务。经过酝酿，在旧拨大队(张莲芳是该队人)，选几位青年骨干，选好地块作丰产田，由张莲芳挑头，以青年团的名义成立丰产队，搞高产试验，并提出和县长挑战竞赛。就这样两个区的高产竞赛接上了对手，并各自都作了准备。

王振兴县长把山湾子区的工作安排以后，回到新拨区指导安排全区特别是张莲芳丰产队开展丰产运动的几项重点步骤。夺高产必须具备的是良种、肥和水这些基础条件，再就是全苗和丰产的管理措施。为了给丰产田多施农家肥，在新拨搞起了找粪肥运动，清厕所、猪圈、牛羊圈、居室内外，街道院落，碾磨棚来几个大翻身。特别是旧拨张莲芳青年丰产队，积肥运动搞的热火朝天。这一举动我们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王尚海听了后认为此举很好，很快就带着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来现场视察，并亲自参加了丰产队的积肥活动。之后，在新拨区召开了大搞积肥运动现场

会。会议由书记主持，王振兴县长作了积极开展积肥运动大搞青年丰产队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报告。会后县委下发了推广新拨区大搞积肥运动，搞好青年丰产队种好丰产田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文件，并组织各区到张连芳队现场参观学习。经过县的组织推动，青年队、中年队、老年队，各种形式的丰产队在全县相继展开，新拨区较出名的还有田桂荣丰产队、梁素珍丰产队、何玉珍的红旗林场等；棋盘山的“五虎千斤队”，朱景荣丰产队，围场镇南姑娘千斤队，以“千斤队”形式，展开了农业大跃进运动。

把大搞“青年千斤队”夺取农业大丰收运动的开展向地委作了汇报后，很快以王佐民专员为首的视察团来新拨区，并到张连芳队听取了汇报，到现场检查指导。认为以青年为主体组织专业队，推广良种，进行科学种田是夺取农业大丰收，掀起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很好形式。经地委领导检查后，很快地委加批语，转发了围场县委在全县以大搞青年丰产队，夺取农业大丰收，掀起农业大跃进的文件。通过地委的推动，把围场的农业大跃进形式推广到全地区。地委书记王克东同志和其它领导多次到新拨区以及全县检查指导，在小麦吐穗后，地委组织全区各县主管农业的领导和农业

技术人员，到新拨、山湾子等区小麦丰产田参观检查。给人们的印象是：麦苗全、穗头大而齐，丰收在望。农民反映是，在高寒山区，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麦子。

农业大跃进既成事实，《承德群众报》社派来了记者团，下到新拨等区农村现场进行采访。记者陈叔保到棋盘山区惠汉村采访后发出了“五虎英雄千斤队夺丰收”的长篇通讯报导，有声有色的描写了农民们不怕吃苦流汗，为夺高产做出的奉献。除在承德报上刊出后，《河北日报》等大报也给以转载。自此，围场农业大跃进的消息，不断在报端出现，这里创高产，那里“放卫星”，传遍全地区。为了介绍全县人民“改造山河”的壮举，县里组织了写作班子，编写了《红旗飘飘》小册子，把当时农村一些先进事迹进行记载和传播。当时承德火车站竖起围场惠汉“五虎队”创高产的展牌，表示了承德人战斗风貌。

二、各行各业齐跃进。

在大跃进中，围场畜牧业的事迹较为突出，这里边倾洒着老县长王振兴一片心血。在县委分工他主管农口，农口各条战线的大事，他都亲临现场。围场畜牧业占举足轻重的位置，对此他下了一定的工夫。如他下乡蹲点时，为谋求养羊业的

发展，认老放牧员丁万利为师，跟鞭放羊，探讨四季放牧抓膘、保羔的技艺。同时调查草场养护措施。特别对畜牧专业人才的使用，尽可能的发挥他们的技能，为畜牧业的发展和给农村创造财富，施展才艺。如畜牧技师赵球，被聘为政府人委委员、政协委员；高级畜牧师曹成林，是发展畜牧业的顾问，经常接待县长的咨询。在专业人员的建议下，县内建立健全了县、区、村三级防治畜病、家畜改良配种体系网络，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大家畜配种季节，县从南到北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家畜配种运动，并由领导发动、技术人员指导，经过培训后的配种员操作开展了伊逊、阴河、乌拉岱和滦河川的千里家畜配种线。河北省驻县人员向省作了报告，省里决定家畜配种现场会在围场召开。通知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唐山、张家口、承德七区几十个县主管农畜牧业领导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来围场参观指导。接通知后县里做了接待等各方面的准备，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材料的准备，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我被抽到秘书处做材料审察工作，还从县直机关抽调了四名材料组织员。在这次工作中最难忘的也是头疼的是写以县人委名义的《大家畜改良配种的动员令》。因事先没有准备，又缺参改资料，更难的是从来没写过。还要

在会议期间内写出公布，在此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写。多亏高沛昆副书记给了帮助，算是交了卷。于五月下旬召开了全县大家畜改良配种现场会。二是现场操作工作，由县长亲自检察指导，全体畜牧技术人员指导操作，全面展开了大家畜改良配种工作，副县长王淑珍（女）同志，也到现场指挥改良配种，在四个川的现场会上接待了各地区和各县的参观人员，还重点参观检查了朝阳湾区以王珏兰为主的"六女家畜配种站"和克勒沟区陈自谦（女）的家畜改良站。会上由先进单位作了发言，县长讲话并发布了全县开展大家畜改良配种工作动员令。与会人员盛赞会议开得成功，内容充实，经验丰富，围场发展畜牧业大有前途。

在全县水利建设高潮中，河北省委党校的学员由副校长路奔同志带队来到我县。县委认为这是一次开拓干部思路的好机会，请路校长给作一次解放思想的报告会。在大礼堂里给县城全体干部讲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又是实践的指导，用生活中的事实，有哲理性的开拓思路的报告。听的人很受启发。他们在县城稍作休息就去了新拨区水利工地。这时新拨区打"保丰收大井"正在高潮中，这些人的到来很受欢迎，他们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社员们和他们亲如一家，同吃同住。

旧拨丰产队的井很有特点，他们在村前大平地开了一个大口井，为了深追下打，把50马力大拖拉机开到工地抽水，拖拉机手没注意，将大拖拉机掉到井里，人机毫无损伤！说明这个井的口是很大了。全区的水利建设值得一提的是灌溉长渠，从宝元栈的三道沟直下阴河川，入金英河汇入赤峰界，修了个“百里长渠一条龙”，要浇全区主要平地。全县除打井、修水库、塘坝外，还修了“东海大渠”、“伊逊长渠”和半截塔的长渠。掀起了水利大跃进。

林业的大跃进典型要数边墙山村所造的“民兵林”。该村对造林一直保持造、管护全面进行，在乌拉沟门造有青年林、妇女林、集体林，管护的很好。在这次造林大会战中，民兵以连队整建制的上山，分出战地责任区，不把山头绿化不下山。乌拉沟西面山坡绿化，应该说是民兵们的一大功绩。更出色的是新地村的青年林，把出名的九头山给绿化了，孙连禹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建设者大会，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围场农业和农村大跃进有形式多样、事件多多，特别是思想的解放，敢想敢干的精神，使青年们创业干劲得以发挥，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有不足和缺点，但无论如何，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

精神是好的，通过大胆创新，当时要实现的，从一首《农家乐》里看出美好的想象：

万斤山药千斤粮[①]，绿化河、宅、村、路旁。
鸡鸭成群猪满圈，骡、马、牛、羊满山岗。
花果园里蜂酿蜜，朝阳坡上养蚕桑。
林网防实护田野，人民生活乐安康。

三、成就的展现

回顾围场的大跃进，给人们留下很多思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值得记述：

（一）在夺取高产运动中，青年丰产队对丰产田的管理，这种组织形式起了很好的作用，它推动了丰产运动。而且后来的治山治水专业队，短期工程，如造林专业队，果树专业队等等，一直持续若干年，恐怕现在还有小型的如蔬菜、防虫等专业队等，它能在生产中生存，就说明专业队组织的生命力。我们认为今后的创造、发展还是离不开“专”字，只是名称不同，作用将是巨大的。

（二）施用良种科学种田是十分需要的。当时推广甘麦96良种，加上肥、水、管的科学化，取得小麦的大丰收，全县小麦亩平均产量从80斤上下提高到170斤。张连芳丰产队的丰产田亩产高达

---

① 说的是每亩产量。

420斤，其它丰产队的丰产田亩产都在300多斤。推广良种获高产我想过去需要，今后更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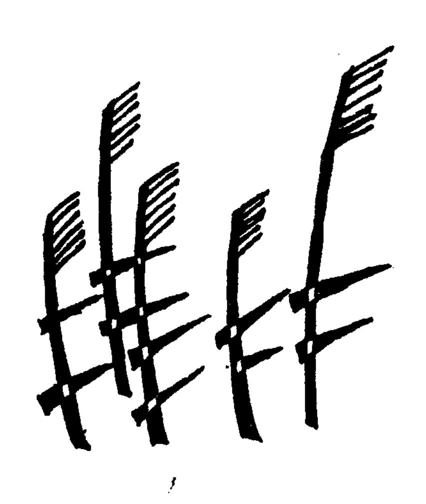
（三）大搞水肥等保驾措施是对的。当时打井、修渠，山坡修梯田，大搞治山治水，综合治理农田，在山区是非常适用的，后来发展到配以生物措施综合治理的小流域，对山区来说更是有效的。

（四）战天斗地创高产的创业精神是值得弘扬的。当时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敢和自然去奋战的劳动场景，至今想起也是感人的。青年人那种奋战夺丰收的精神，得到各级的肯定。在全国农业创丰收大会上，围场县长王振兴和张连芳丰产队被选入。张连芳队受到国务院的奖励，颁发了奖状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围场农业夺得省的帅旗。

（五）为展示一年农业的成就，县举办了大型农、林、畜牧、水利展览，并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走在前面的是河北省奖励的粮食升帐金字红底的大"帅"旗，锦旗之大，形体的威武十分可观。还有在展厅里边玲琅满目的农产品，使人看了，无不啧啧称赞。在当时这种直观的宣传和声势，大长了人们战天斗地夺丰收的干劲，起到鼓舞前进的作用。

但是，围场的大跃进运动并不都是完美的，在

某些方面缺陷还是比较大的。如在发动中当时带上了政治色彩，如“拔白旗”、“插红旗”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也伤害了一批人。这是其一。其二是浮夸、作假、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甚至一时成为风气。大话说到亩产千斤、万斤，甚至更虚、更大。在我们这高寒山区、旱地，一季作物，一般的作物、品种和管理方法，上千斤产量是很难做到的。还有欺上、瞒下等手法，也不乏其事其人，给人留下很坏的印象等等，应该引以为戒。



围场教育系统
“整风反右”亲历记

白雯萍

我县是从1957年4月开始党内整风，9月1日进行县直第一批“整风反右”，至12月底结束。期间教育系统的“整风反右”已经拉开了序幕，当时可算作第一批，在反右中揪出一中教师王朝恩、王文翰，教导主任王铁铮。扫盲办揪出胡文广，镇完小揪出教师李树明等12名右派分子。

第二批是于1958年6月22日开始，至九月27日结束，历时3个月。这是教育系统反右的重要时期，也是令我难忘的一次亲身经历。

一、三人材料小组

教育科通知我和十一区（城子）总校长赵云生提前到县，由视学丁朝彦负责组成三人材料组。小组负责学习材料的准备，历次鸣放记录本的整理，向反右领导小组不同时期的汇报，对每个步骤的工作安排以及反右简报。

据我所知整风运动共分四步：一步以学习“讲话”[1]为中心，鼓励去掉顾虑，大胆提意见。同时召开小组会、座谈会、辩论会和大字报等方式发表意见。二步是学习《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等一系列社论。开展大辩论：党的各项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问题。第三步是在辩论的同时对浮出的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二、揪出郑有

四区中学教师郑有，在1957年的学校鸣放中有些言论已构成右派言论，经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县全体教师“整风反右”会上被揪出的第一人。由赵云生作会场准备，和县发电厂联系延长发电时间（当时电灯照明是县电力局自己发电），拉上室外电灯，由教育科领导和四区中学校长研究，确定批判发言人。得知该校唐老师正和郑谈恋爱时，决定动员她发言。晚上集中全县教师（750余名）参加，根据郑鸣放的言论“揪出”（站起来）批判。算作“第一次练兵”。

三、全体教师集中第一中学集训

---

①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不久全体教师都集中县一中接着集训。文教系统核心组刘荣晟、尹庆云(文化科长)、杨景彧(文教科副科长)也进驻一中。把一中教导处以柜橱隔成里外两间,西侧一间为核心组办公地方,东两间为我和王凤琴(四区教师)办公地方。主管绝密文件的收发,我管核心组的一些文字工作。

同时,抽调各区党、团员36名,以三人为一组,交换摘抄一个区的鸣放记录。办公地在当时一中教导处的隔壁教室。

此时县委派来郭芳林(原盂奎教师,"肃反"后留在宣传部)作联络工作,组成郭芳林、白文萍、王正三人小组,负责把各区摘抄件汇集起来,按人归档,不许更动一字,按照时间、地点、言论归纳一起,由王正刻写10份,由郭芳林分送核心小组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审批。

另有摘抄三人小组(每三人为一组,负责摘抄一个区的鸣放记录)计39人,材料组成立时,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使材料组人人掌握什么样的言论应划右派,什么样的言论不应划右派的界限。由尹庆云科长向39人宣布三条纪律:他说:你们是经过组织审查的,是忠诚可靠的同志,你们必须严守纪律,一、在摘抄鸣放材料时要按照"六条标准"原封不动地抄

录构成右派的言论，不准漏掉一个，也不准抄错一个字，冤枉一个好人，三人互相监督，不能出差错；二、不准带出一块纸条；三、不准向任何人泄漏一点有关右派的情况。

当时参加材料组的同志，是做到了这一点了。如冯树清（十一区总校长、省劳模）也是摘抄三人小组成员，但他的“鸣放”记录中有右派言论另人摘抄时，从未向他透露。大字报把他的言论亮出来，他才知道。

四、铁的纪律　严密的监督

为了发动大家互相监督，在“一中”离道口近处，可以随手放进纸条的地方、厕所内、餐厅门口，教室过道等处设六个检举箱，责成专人——李应芳（教育工会副主席）负责开锁取检举材料（这里的检举信件不作为划右派依据，因为不是当时当事人的鸣放言论）。

在“反右”进行一个阶段的一日上午九时许，我去厕所（现在一中宿舍楼北侧——当年是个台地，高于东侧的教室），刚站到台上，七区教师曲治和（我在“承师”的同学）也站在我的身旁，小声问我：“我怎么样？”我当时并未能回答，我向大便坑看了五个（当时都有半人高的隔墙）又向北边坑看了看，确认无人时，才回到台上向他说：“你心里没

病，还怕吃冷粘糕”。他会心地微笑着走出厕所。我回到办公室不过五分钟，李应芳走到办公室门口，用手指着我说：“文萍！你泄密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本能的站起来，觉得头发也立起来了。李接着说：“你刚才在厕所和曲治和说什么来?”我把原话重复一遍，他把纸条给我，说了声：“以后注意啊！”我的心才落了下来。

五、严格的审批程序

在摘抄组 39 人(当时有 13 个区，每区 3 人负责摘抄)的逐页逐人的审查摘抄中，每天都从各中心校的鸣放记录中抄出一些人的右派言论。这些由郭芳林、王正我们三人互相监督归类于个人名下，由王正用蜡纸刻印 10 份，由郭芳林分送核心小组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批示后交核心小组。前一个时期由郭芳林完成这个任务。后期郭约我也参加数次去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审批。我参加几次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郝宝恒、监委书记赵培军、副县长王淑珍等人的汇报会。我们念材料，他们边看边听，最后逐个审议。他们对照中央 17 号文件慎之又慎，字敲句酌的反复研究。构不成右派的不再上报。已定的由核心组责成赵云生等人组织各区积极分子第二天早晨贴出大字报。上午就会在本区揪出进行批判。因而人们每天早饭前都

去礼堂前、餐厅墙上看大字报。

在批揪出的右派时，对积极分子公布该人的右派言论，要求积极分子有准备、有理、有据的批判。在批判时，也有些教师即席发言，不属右派言论，或者是私人成见，也强行上纲进行批判，因而使一些划右派（现已改正）的人心中不服气。如七区批判翁兆普的右派言论时，有人提出在学校挖山石的劳动中，翁起出一块磨盘大的石头，滚下山去，离总校长陈玉只有二尺远，差点没把党员校长砸死，是蓄意谋害党的领导干部等等。此类情况其他区也有发生。

核心组曾数次召开各区掌握会议的同志开会，要求批判时既有文字依据，又有右派言论，不可拔高（那时没有无限上纲一词），更不可对一些不重要的平时言论大加批判，也不提倡揭发检举（就连集训时在鸣放时错误言论也未作这次划右派的依据）。

右派言论，是在各区的鸣放记录本中，按原文摘抄的，这一点是当时任何一个摘抄者，在二人的监督下、铁的纪律中，不会有含糊的，也是不容质疑的。

在反右批判阶段，把各区划分四片，一、二、三区和城关完小为一片由康勤负责；四、五、六区由

陈玉(党员、棋盘山总校长)负责;七、八、九区由张春林(半截塔中心学区校长、党员)负责;十、十一、十二区由赵云生(城子总校长、党员)负责组织领导。

六、反右扩大化之一——查日记

中央文件中一直用"右派是极少数,只占5%左右"的文字表述。在八月上旬,核心组在学习中央文件中提到"有的县市右派分子也可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在核心组讨论时多数人认为我县750余名教师已揪出40余人,已超过5%认为可以告一段落了。杨××说:"我认为我县也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一语惊人,几位核心组成员都看着他。他接着说:"高文恒不是右派不可能,别看他鸣放没说……,查日记。"核心组最后定,由尹庆云科长负责分别找总校长了解哪些教师记日记。尹找来总校长,有的当时说了人名的,有的说回去了解下的,最后有21人写日记。由党、团员组成三人小组分头去各校或其家取日记本。取高文恒日记的是李云亭、于占元,还有一位忘记了人名。取来是精装本11本日记。由三区负责抄录城关完小的,只摘抄三本,右派言论就已绰绰有余了。由此也可以证明,在当时任何人想把谁打成右派没有原始文字根据是办不到的。

七、批邢克明

邢是教育科副科长,党外人士。在“人代”会上,第一批反右时已被揪出。为消除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在“一中”榆树林中(现在一中只剩一株榆树的东北地方)组织全县教师参加批判。他的重要论点是“党的政策多变,像孙悟空似的,工作起来不好遵循;小学教师生活、工作条件艰苦,把教育科发的痰盂当菜盆用”等等。

八、批“孤芳自赏”

杨××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认为知识分子有自高自大,骄傲自满思想,容易犯错误。全县批机关中学校长惠某的“自高自大,孤芳自赏”。仍在“一中”的榆树林内。惠当时卅多岁,有随“第四野战军”随军记者南下的革命经历,但也是心里没底,批完是否成为右派?因而泪痕满面,即席检讨也很深刻。

九、交心运动

九月初,进入“整风反右”最后阶段,“向党交红心”。由孙德荣负责组织,叫半截塔完小会计王泽生在“一中”礼堂设立个“交心园地”做了个50厘米的红心悬于上侧中心,各区发动教师向党献红心:交立场、交政治观点,要求交真、交深、交透——凡是过去所犯任何错误,坏思想全部说出来、

不记账、不抓辫子。党员、团员不参加交心。到九月二十日左右集训结束，教师回到工作岗位。

十、右派分子的处理

文教系统两批计揪出右派分子 80 名。组织他们学习一段后，根据“中发(57)25 号中共中央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右派分子处理原则”(12 月 12 日)，分五类予以处理。

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类：撤消原职务，监督劳动；三类：撤消原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待遇；四类：撤消原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第五类：撤消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六类：免于处分。另有七人，围场县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处理。“整风反右”基本结束。

附　　录

此材料在写作和回忆过程中，得到县档案局朱炳福、王金生、张玉林等局长的先后大力支持。在翁玉莲、陈玉珠和谭彩芬同志的亲自帮助下，查阅了中央、省、市、地和县五十余件当时档案，使材料的时间、事件、人物真实可靠。

县图书馆刘征、董丽华馆长和姚素敏同志提供五八年《人民日报》，使我查到了当时中央统战部历次邀请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使材料内容充实。

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再现

——纪念塞罕坝机械林场肇建四十周年

陈沭辛

京北第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199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批准将距首都北京400公里,全国最大的人工林海——塞罕坝机械林场开辟为"塞罕坝木兰围场国家森林公园。"公园有林面积110万亩,其中人工(落叶松、樟子松)林86万亩,全园有点将台、十二座连营、月亮湖、滑雪场、狩猎场等古迹和风景区20余处。不经名传的塞罕坝顿时闻名全国,因为这里以林遮天、以草蔽地,天蓝、山绿、水清、气爽。被人誉为: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草的原野,水的故乡,鸟的乐园,兽的天堂。塞罕坝林海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独特:"三庚无暑,六月生风",是人们避暑、度假的理想场所。自93年开园以来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00余万人次。公园现有星级宾馆

3处，旅店100余家，有床位8000余个，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收入4500余万元。杨尚昆、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知名学者亲临视察和观光，对当年塞罕坝人创建林海、恢复木兰围场的壮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塞罕坝人工林海这颗璀璨的明珠，不仅供人观赏，其相应的森林效益和林副产品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她的林产品直接回报经初步计算是当年投资2084万元的20倍；今木材总蓄积544.5万立方米，价值人民币16多亿元；更大的效益是水源涵养和京津地区的生态屏障。因此，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决定在华北再建两三个塞罕坝。这个消息传向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看好了这块瑰宝，争相投资。那么塞罕坝机械林场是怎样在这曾经荒芜了几百年的高原上创建起来的？木兰围场又是如何再现的呢？这要从历史说起。

历史的辉煌与波折

塞罕坝地区是古代北方奚族的游牧集居区、“平地松林”的一段，因森林茂密，古树参天，野生飞禽走兽种类繁多，为辽、金、元历代帝王狩猎之

所。元世祖忽必烈曾在此地建“昭应宫”，松州知州仆散图格前后射虎万计，被赐誉“万虎将军”。元末义军刘福通部将出师塞北，上都和“平地松林”同毁于战火。明朝徐达等兵将多次经此地北伐，成祖朱棣也曾挥师于此。只清皇太极（1632年）追击察哈尔林丹汗一战，二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塞罕坝地区的森林和野生动物又得以恢复和繁育，所以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年（1681 年）于此建立起封闭式的以狩猎方式训练清军和绥服以蒙古为主的等少数民族为目的的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秋狝盛典达 88 次 140 年之久，木兰行围之场 78 所，塞罕坝森林公园范围就有 18 处。康熙帝陪同祖母孝庄太皇太后避暑居留塞罕坝（清代亦称兴安）的拜察连续 7 天，如此长的时间住一地也是清帝木兰秋狝不多见的。可见塞罕坝有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但是自咸丰年因内患外侮，清宫廷为弥补国库空虚便采伐树木乃至招户垦荒，将美好的木兰围场蚕食一光！加之日伪时期的反动统治，残存的天然次生林几乎被砍伐和火烧殆尽。造成光山秃岭、水土流失、河床滚展，冲积扇吞噬了村庄、良田，大自然的惩罚人民苦不堪言……。至解放前夕围场空有其名，人们似乎已把木兰淡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便在阴河组建以王德诚为首的三十余人的武装护林队，负责塞罕坝林区的护林防火工作。1953 年护林队撤销，自 1954 年先后在阴河、大唤起建立森林经营所，1958 年改建为以造林为主的国营林场；1958 年 4 月河北省林业厅在坝上组建以谢光、黄仲儒为领导的机械林场（以下简称坝上林场），1960 年划归承德行署林业局管辖。塞罕坝林区自 1954 年开始育苗，1955 年整地，人工造林起源于 1956 年春，限于经费等因素国营造林尚难以形成规模。

艺人的力作

新中国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部长梁希，对国家林业远景提出："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并号召林业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的林人，也是新中国的艺人"。激励着千万林业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地为新中国绿化事业奉献着光热。冲龄的人民共和国 1960 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是"乱云飞渡"、"暮色苍茫"。在党中央、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至 1961

年冬就出现了好的转机。就在此时主持林业部日常工作的罗玉川、惠中权二位副部长为改善京津地区的自然环境，拟在张家口或承德地区建设一个百万亩防护、用材林基地。部长助理、造林司长荀昌武、副司长刘琨分赴围场和张北考察。

是年，滴水成冰的严冬，荀司长在围场县农林局长邹焕章、阴河林场场长郑国严等陪同下，骑马视察了阴河、坝上和大唤起林场。荀司长对陪同人员说“你们围场应该名副其实，虽然沿路光山秃岭，但近坝地区的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满不错嘛，围场很有希望！”一个前所未有的百万亩大型林场，在即将晋升为副部长的荀昌武运筹中。部党组通过了选场报告，为尽快向国务院拿出设计方案，刘琨副司长率程总、杨德馨、陈希诚等专家组一行七人在承德行署林业局长刘长仕和邹焕章、郑国严等陪同下，冒零下40度严寒的风雪天气，对阴河、坝上、大唤起三场宜林地进行了全面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设计方案报送国务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按建场四项原则（一、建成华北大片用材林基地；二、积累高寒地区育苗、造林经验；三、改变当地面貌，保持水土，创造条件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四、研究积累大型国营林场机械化管理经验）亲自批示

签发，计划投资2084万元，20年完成造林74.6万亩，抚育天然次生林14.05万亩，育苗4300亩，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62年春节刚过，中央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林业部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正在按设计方案组建，刘琨副司长同在京参加会议的围场县委书记韩银铭及会外工作人员副县长张震协调了人员、组建等有关事宜。当时定为营科级单位，主要负责人邹焕章，场长由行署林业局长刘文仕兼，副场长黄仲儒，林业部工程师张启恩为技术副场长，阴河（干部8人，工人27人）、坝上（干部26人，工人45人）、大唤起（干部8人，工人27人）三场合并，总场设坝上，所有人员和经营范围，固定资产全部移交。为了充实力量，林业部调机务技术干部及前下放的行政干部共3人、调当年在塞罕坝林区工作多年的县农林局行政技术干部5人和熟悉农村工作的围场县行政科级干部7人，先后到场；相继调入机务工人和分配到场大中专学生、军转干部及承德市五女青年志愿者。至1964年全场来自17省市（区）及外国侨民共有固定员工397人，其中具有本科和大专学历的62人（包括处科级各1人，文革前调去黄河水委会及其他林区16人），有中专和相当于中专职称的技术人员107人

(文革前调去黄河水委会3人),行政干部33人(其中县处级3人、科级21人,没有学历的专业干部如财会、气象等4人),缺少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干部、工人仅占少数。可以说塞罕坝机械林场人才济济,林业部计划再分配到场林学大学生23名,目的是为将来林业事业发展储备、锻炼人才。

一个大型林场的建设正百业待兴,林野调查设计、造林、育苗、农耕、公路、电话、物资、宿舍、学校、卫生等各项工作,都需要统筹安排,齐头并进,当时人们忙碌的情景可想而知。

1962年春的机械造林,尽管全场上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仓促完成1052亩,放叶率仅5%。

塞罕坝机械造林失败了,有人不顾事实,把客观问题说成是主观现象,问题反映到承德地委。1962年7月,地委考虑林业部在承德 地区建立国家立项的大型机械林场,日后生产施业中一定会出现林牧争地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要影响事业发展,所以建议林业部将该场升为县处级,选调现地委委员、行署农业局长原围场县委书记王尚海到场任党委书记,调县团级王福明为副场长,兼场长及技术副场长不变。刘文仕请缨到场任场长,经林业部与承德地委的协调,批准了这一人事变动方案。他们在困难中受命于坝上,为了表示决

心，党委三成员（王尚海、刘文仕、王福明）把家属从风景秀丽的“避暑山庄”迁入海拔1500余公尺的塞罕坝。

1962年全国农业大丰收，塞罕坝机耕粮食也丰收了，党委三成员带领和组织全场员工和家属极力抢收，仍力不从心，粮食有受损失的危险。正心急如焚之时，刘琨副司长带领部机关干部70余人乘两辆卡车到场，加入了围场县政府支援塞罕坝秋收的行列。刚刚分配到场的干部、工人也立即投入粮食抢收活动。经全场上下人机结合，夜以继日的争夺，30余万斤粮食入了库，在国家困难时期为以农保林、促进林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粮食贵如金的年代，其意义是重大的！

1963年春在总结上年机械造林苗木长途运输失水、伤热和时间差的教训，决定扩大当地棋盘山大阁216亩苗圃。但是当年造林的苗木还须从承德上板城运回，机械造林1240亩，仍然没能达到存活标准。“坝上不能造林”之风不仅场内再度刮起，而且也有人对林业部发难。场党委迎风而立，王尚海书记在各种会议上讲：“我们学习大庆，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认为大家一颗红心都放在塞罕坝的建设上。人工造林，我们总

结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不会出问题。机械造林没搞好，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生长的客观规律。有人说：'坝上不能栽落叶松'是错误的！我们总场东边那几棵老松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北大顶子的一棵松迎风而立，是它自己长起来的。天然的能成活，机械的我们那样精心培育它，为什么不活？是我们对它的生存条件还没掌握！"王尚海书记鼓励工程师、副场长张启恩："听到别人的风言风语，你心里着急我知道，我们都是在摸石头过河，要说负责由我来负，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干，客观规律一定会找到的！"

1964年春节后，林业部政治部把场长刘文仕调去搞"四清"。尚海书记对此很着急，同大家说："老刘这一走就是二年，这下担子全放在了我们的肩上，前二年机械造林没搞好，是花钱买了教训，今年再搞不好，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难以向人民交代！"，他日夜思索着如何打好春季造林这一仗。他找机务队长郑国严谈话："前两年机械造林失败的主要因素是苗木和土壤保湿，我觉得咱们总结的还不够深入，其责任在我。我认为学习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应该再深入一步，从'严'字上查一查机械造林到底哪个环节上有漏洞。要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是生产一线的工人，请

他们把意见和想法全摆出来，从新制定施工方案。”他要求郑国严：“要树立信心，今春一定把机械造林搞成功！至于天公不作美，另当别论。”

全场上下总结过去机械造林如何保成活的三结合（总场领导、技术人员和工序工人）会议开得如火如荼，工人们提出了从起苗、选苗、运输、移动假植和土壤镇压保墒各细微环节的时间与操作等几十条重要意见。新的《机械造林施工方案》在机务队制定了，总场研究认为可行。尚海书记要郑国严选块好的宜林地搞好春季造林。将63年先期整地的马蹄坑定为64年春机械造林地，因为这里是三面环山、南面临川的台地，土壤、气候、温湿度等优于别处，在塞罕坝是独一无二的。

1964年春，马蹄坑机械造林会战在四月下旬拉开了序幕。这次机械造林如同解放军临战一样，各施工环节都立下保证书，争创“四好”机组和“五好”个人。造林大军从总场出发，各种车辆和机具排列有序，政治处把高音喇叭架在场部前，电子管扩大器播放着《解放军进行曲》和《运动员进行曲》，送别出征的队伍，显示出史无前例的壮举！造林工地虽然距总场仅十华里，但是上至党委书记王尚海、副场长王福明、工程师副场长张启恩，下至机关干部、机务工和投苗员，一律在工地吃莜

面枯粒(此食物是围场传统饭,因其耐饿,是旧社会劳苦大众所喜爱的饭食,故有“苦力”之称呼,笔者认为“枯粒”是其象形,用此较为准确),住条山大炕、蒙古包和窝棚。工地总指挥王尚海,副总指挥张启恩,副场长王福明和机务队长郑国严各具体指挥一个机组。尚海书记跟在植苗机后面,既当质量检查监督员,又是手提植苗桶、肩扛植苗锹的补植员。

马蹄坑机械造林大会战,工地指战员通过岗位练兵和实际作业,经过七天的拼搏,“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 688 亩机械造林完成了。机械造林虽然不像战争那样浴血奋战,但也饱经风霜。白天一身土,夜晚一被霜,除不流血牺牲外,不亚于一场战斗!

林造了,人们期待着苗木成活。尚海书记曾三次到马蹄坑查看造林成活情况。喜讯传到林业部,夏季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来场视察,亲自调查机械造林成活率和存活率均达百分之百,超过了国家《造林规程》标准。机械造林的成功,展示着塞罕坝未来的光辉前景!塞罕坝人的热血沸腾了。1965 年塞罕坝新的施工方案是惊人的,实际完成育苗 394 亩,造林 33850 亩,其中机械造林 10206 亩,创国家针树种造林万

亩先例。1966 年上半年王尚海书记因患病去兴城疗养，王福明等赴南京学习，刘文仕场长回场主持全面工作，完成育苗 470 亩，造林 57212 亩。动乱的 1967 年是“闹革命”的高潮，而是年创育苗 567 亩，造林 63828 亩的最高记录，收获粮食 20 万公斤。取得如此成果，应归功于塞罕坝人的集体奉献精神，绝大多数员工都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967 年 8 月中下旬，正当“秋造”、“秋收”的关键时刻，有那么几个人串连外地学生进场“闹革命”，由于受到场内广大员工和家属的抵制，而未能掀起大的风浪。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十年即完成了二十年的育苗、造林、天然次生林抚育等任务。取得如此成绩的主要做法是：(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员工队伍。当年在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突出政治方向，把大庆经验作为办场准则；在以林为主的前提下强化粮食生产，不仅场内员工和家属能吃饱，而且对人工整地、造林和幼林抚育的农民工按劳动强度也给以粮食补贴；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场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建场十年总场没有勤杂工，没有粉刷过房屋，除工程师副场长外一律合属办公，使用退役的桌凳，全场没有一件沙发和一把弹簧椅。(二)实行“官兵”一致、干群

一体牢固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党委和支部领导干部的表率带头作用，哪里艰苦、哪里困难，就有党委和基层支部成员在场，实行同吃、同住、同工作劳动的“三同”；当年剿匪被称为“虎胆英雄”的分场教导员侯庆山，学习铁人精神在各项生产工作中一向身体力行，他看到机械造林生长速度快于穴状人工林时，便亲自扶犁搞起带状整地“牛犁山”，闯出造林新路子，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赞扬；全场在粮食供应上打破商品粮食和场销粮的供应标准，处处体现上下一体和内外一致的原则。(三)量才用人，打破论资排辈和干部工人的界限。技术人员一律在工作一线实施生产的领导骨干作用，工人施工员是农民工具体生产的指挥员，每个人的肩上都负有任务和责任，真正做到人尽其能，充分体现出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汽车司机梁臣懂机务，被提拔为副科级主管一个部门的党务工作，体现了用人不拘一格。(四)按大庆经验建立高工作速度、高工作效率、高效益的生产职能机构。总场由当初五科一室精简为二室(办公室、生产办公室)、一处(政治处包括组监、人事、工、青、公安)，下设五个分场和一个机务队；场队只设教导员、场(队)长、业务主管(技术员)、会计，不设股室，直统生产单位营

林区(队),减少中间环节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五)以表扬为主,全场上下开展学有榜样,比有标兵,赶有目标,帮有对象,超有先进的“四好单位”和“五好个人”活动,实施季有小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做到成绩讲够,问题摆透,体现出上下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融洽、愉悦的和谐氛围,激励人人奋发向上,全场生产蒸蒸日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六)生产和科学实践形成了塞罕坝人以场党委为核心的凝聚力,要求进步的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中专生占百分之十,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十五,英年早逝的曹国刚、张国绣、曹明章、刘明睿、李希义、王友兰、王学权和李宗瑞、张凤亭等知识分子及工人就是当年的佼佼者。之所以能克服生活困难,攻破技术难关,尤其是动乱的年代生产不乱,而且获得林农业大丰收,创建成全国最大的人工林海,与基础的牢固是密不可分的。

林人的素怀

说塞罕坝人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展现给世人的葱翠林海,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必然联想到“老班长——王尚海

书记(王尚海同志生平,详见本书《青山有幸埋忠骨》一文)！尚海同志虚心好学,能与知识分子和工人心连心,他在塞罕坝人的心中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上下一致,一视同仁;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劳动,身先士卒;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绝对忠诚。所以他赢得了场内外的信赖和敬仰！塞罕坝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班长”的作用是密切相联的。他当年语重心长的话,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我们要记住,毛泽东思想,大庆和雷锋精神是我们塞罕坝人的精神食粮,围场党和人民是我们办好事业的靠山,没有他们的支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的确,围场广大民众和周边许多农民都为塞罕坝林海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尤其围场人民献出牧场,抽出众多劳力,屈指算来50余万农民,今45岁以上的男女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参加过塞罕坝机械林场当年的造林、整地、育苗、营林和护林防火等建设事业,不仅出力流汗,而且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应永远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在纪念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四十周年之际,回忆建场初期397名员工和家属工战友,如今在岗的屈指可数。大学生绝大多数离场分赴新的工作岗位,在事业上也多有成

就。四名县处级领导已经走了两位，中层干部只剩三分之一。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炊事员王绍玉、饲养员范德志、临时工饲养员李文奎和家属工代广英老妈妈等等，他们虽然早已仙逝，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李宗瑞和离我们而去的塞罕坝人以及为林海建设献出宝贵生命而未留下姓名的围场农民工，他们的英魂将同塞罕坝林海永存！

荣誉的归属

荣誉是对科学实践成果的肯定和奖赏，这是用辛勤和汗水换取的。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批准建立“塞罕坝木兰围场国家森林公园”以来，上级有关部门给以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荣誉——命名共有四个：

2000 年河北省林业局授予“艰苦创业教育基地”。

2002 年 4 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授予“思想教育基地”。

2002 年 7 月国家林业局授予“再造秀美山川示范教育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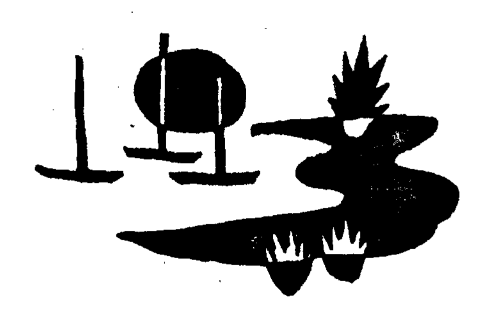
2003 年 7 月河北省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

组授予“河北省青少年环境教育基地”

如此荣誉不仅属于塞罕坝机械林场艰苦创业的全体员工和家属，而且属于围场地方党和政府各部门、广大民众以及周边地区一些单位和民众！没有这些部门、单位和广大民众的协作与支援，难以取得如此成就！没有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及林业部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今天！

荣誉是协作之花，是上下一致努力的成果，应该共享！同时，有赖上苍所赋予的风调雨顺。

注：“赛罕”为蒙语，意美好；“坝”是蒙语“达巴汉”（意岭）音符的简化。当年批建场时即沿用“赛罕”，“文革后该场被下放至河北省，林业厅给更名为“塞罕”，已非原意。



满族祭祖

尹志杰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礼仪的民族。平常素日的晨昏定省，行礼问安，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然而，神圣隆重的祭祖活动，却鲜为人知。

按说，祭祖是满族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多少年来，世代相传，经久不衰，人们是不该陌生的。但是，曾有过一个时期，人们把满族祭祖同封建迷信混同起来，受到非议，所以公开祭祖的人家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昔日的皇家狩猎名苑——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有些老户至今还保留着祭祖这一独特、古老的民族习俗。

满族祭祖，一般在农历的冬、腊月进行，也有结合过年，把祭祖放在大年三十前后的。祭祀前，先要在历书上择好日子，确定祭祀时间，再把一个系着红布条的干草把绑在大门上，或在“索伦杆”顶端系上红线绳：这表示要祭祖了，同族人看见，到时候就自动来参加；外姓人看见这样的标志，就

不来借东西了。

祭祖活动要进行两天，按老辈人的说法，叫“祭双不祭单”。第一天早晨六七点钟，人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把屋里院外拾掇一新。尤其是西屋，更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满族人“以西为贵”，“以西为圣”，祭祖自然要在“尊贵”、“神圣”的西屋进行。

为什么“以西为贵”，“以西为圣”呢？这倒不是因袭佛教的说法，认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神圣净土”；而是源于本民族一个悠久的民间传说。

据说，老罕王努尔哈赤每只脚心上有七颗红痦子，懂行的人说，那是“脚踏北斗，有天子气”。当时，他正在吉林总兵李成梁手下当随从，李总兵得知这事后，怕他日后夺明朝的天下，便起了杀老罕王之心。恰好，这事被李总兵的小女儿赛花云知道了。她平时很看重老罕王，又可怜他的身世，就把一匹大青马和一只大黑狗送给他，叫他连夜逃跑。后来，老罕王倒是化险为夷了，可是赛花云却被李成梁残忍的杀死在西炕上，打那以后，为了纪念赛花云搭救老罕王的恩情，在满族人中间，有了“以西为贵”，“以西为圣”的说法。

祭祀开始时，先由主祭人把祖宗匣从祖宗板上请下来，放在西“腕子炕”上。然后，主祭人右腿

跪在炕沿上，左腿站着，打开祖宗匣盖，恭恭敬敬地把祖像、祖谱和木制五色旗请出来。祖像、祖谱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铺有用火烤过的毛头纸的枕头上，五色旗立在祖像两侧。倘若珍藏着皇帝的敕书，也要拿出来摆在祖像的前面，以荣耀自己的门庭，赞誉祖宗的功德。

这时候，锡酒壶里的黄酒，都斟满了，锡香炉里的线香都点燃了，“纳锅的”把刚刚蒸熟的粘糕也切开摆好了。锡烛台上的红蜡烛辉映着贴在祖宗板前面的挂签，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长辈在前，晚辈在后，虔诚的满族后人跪满一地。

主祭人将一只公鸭（不要白色的）拿到祖像前，再上一遍香，用满语颂扬祖宗的功德，禀明祭祖的用意，请列祖列宗前来“领牲”。说着说着他猛然将一盅酒倒在鸭头上，鸭子一扑棱脑袋，就表示祖先“领牲”了，意思是：列祖列宗看到了晚辈的孝心，同意享用他们的供品。

“领牲”之后，“纳锅的”将鸭子从膀根处杀死，放到炕沿底下。全家人一齐叩拜，表示致谢。与此同时，响起了主祭人一遍又一遍的祷祝声：“春秋四季，秋成八月，诚心诚意，祭奠祖宗”。

祭祀这天的早饭异常简单。只有一盘酸菜，两碟用小根蒜和香菜腌制的咸菜，主食是粘糕蘸

红糖水。此中寓意，也许是让人们触景生情，重新体味一下祖先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时的酸、甜、苦、辣吧?!

到下午吃两顿饭时，祭祀活动又向前深入了一步，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杀祭祀猪。猪要黑毛的，头天杀“屯”，第二天杀“正”。人们说“猪大人喜，猪小神喜”，所以，祭祀用的猪一般都在一百八九十斤以上，猪小了显得对祖宗不尊重。抓猪的人也有讲究，必须是“全科人”。抓住后，绑住前左腿和后右腿，但不能绑嘴，抬到神案前的八仙桌子上，猪头对着老祖宗，猪嘴朝南。然后，重复上香、祷告、“领牲”、叩拜等几个环节。“纳锅的”杀完猪后，不许吹打，在外屋锅里燾煺，开膛取出五脏，卸成八大块，放在锅里煮上，供晚间祭祀用。

晚间掌灯时分，祭祀达到高潮。起先几步程序同早晨一样，只是供品不再是粘糕，而是熟猪肉。“纳锅的”将煮熟的八大块猪肉，按着猪的原形，依次摆在槽盆里，这叫“摆件子”。可以说这是满族后人献给祖先的最隆重的礼物。摆好件子的猪，头西尾东，站在槽盆里，宛如活猪一般，也有的在猪头上用刀穿个窟窿眼儿，把香缠上新棉花，蘸上豆油，点着后插在上面，熊熊火光随风摆动，带有一种古朴粗犷的原始色彩。

这一切都安排就绪后，在主祭人的祷告中，所有族中人都要对祖宗行跪拜礼。礼毕，由家察码（义务的娱神者）和站在房门口的几个姑娘、小伙，敲动手中的单鼓、抬鼓和掐拉器（神板），扭动身躯，迈动舞步，唱起祭祖神歌。神歌一起，族中人也都一起拍手应和。歌词大意是："天上的太阳，永远在天上照着；祖先的功德，永远在心里记着。恳求列祖列宗降福于我的家族；保佑我的子孙们，平平安安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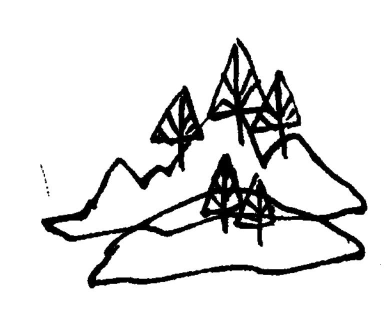
优美的神歌，和谐的器乐，时而缓慢，时而急促。缓慢时，如高山流水，悠然自得；急促时，似铁骑突出，惊心动魄。就在人们载歌载舞，如醉如狂的时候，突然，主祭人熄灭了屋子里所有的灯火。霎时间，所有声音嘎然而止，万籁俱静，参加祭祖的人们都齐刷刷的跪在地上，默默向祖先祷告，使祭祀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就是"背灯祭"。据说，此时列祖列宗要回来享受供品，如果屋内有响动，则会惊动祖宗，是对祖先在天之灵的不孝不敬。因此，"背灯祭"时，屋子里总是鸦雀无声。人们在一片静谧之中，缅怀祖先含辛茹苦所创下的业绩，激励自己继往开来、发奋图强的决心和信念。

约摸十几分钟以后，灯火重新点燃，供品相继

撤去，一天的祭祖活动结束了。人们把长辈人让到炕上，晚辈人则围坐在地下的八仙桌旁，大家吃着白肉、血肠，喝着甘醇的烧酒，谈古论今，兴致勃勃，一直热闹到深夜。

第二天的祭祖同第一天相似，这里就不再赘述。

古人云："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满族祭祖，融"礼"、"乐"为一体，实际上是增进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形式。他们祭祀列祖、列宗，求得四季平安、幸福美满，这种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事实上，合族团聚，共举"大礼"，也起到了促进团结、协力同心的作用。难怪岁月如流，风云变幻，此间尽管也出过几个"数典忘祖"的不孝子孙，但绝大多数满族后裔，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扎在白山黑水之间，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曾有过"祭祖"这样一种古老的习俗。



蒙古族婚俗

吴恩巴雅尔　　王福兴　　白雯萍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喀喇沁、翁牛特两旗蒙古王公，把这块游牧地献给清廷，玄烨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设置了肄武绥藩的木兰围场。

原游牧于此地的蒙古族和以后护围的蒙古官兵及其家属，以及同治年间开围"安插闲散旗民"，光绪时期由于"八旗生齿日繁"、"生计日促"，"筹办京旗移屯"，来围场挂地耕种的多数是围场满族、蒙古族的先民。到了清末民国以后时期，围场蒙古族的婚俗有了很大的变化。

除保留本民族婚俗主要特点外，也融合了满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习俗。成为具有辽阔草原粗犷、淳朴的风格；又有清山碧水般的细腻和喜戏情调。

一　相亲

蒙古族的习惯，男孩到十五岁的年龄，父母就要积极为其选择佳偶，定下百年之好。挑选媳妇的途径一是拜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广泛物色；二

是走村串户物色；三是社交往来物色；四是双亲领着儿子在集市中、庙会上、戏台下，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中，物色美丽的姑娘。

若看中了哪一位姑娘，立即探知她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年方几何，劳动技能，脾气禀性，以及父母的品格，脾气爱好等方面的底细。后来延用汉族合婚习俗摸清属相生辰是否犯忌，门可当，户可对一一搞个清清楚楚，做到心中有底。若是与姑娘父母相识，便可请来喝酒，叫男孩过去帮助干活，给姑娘以好感，增进友谊，透过信息。不相识，便求亲友把意向透露给女方，探听对方意图。如果男孩女孩自由相爱，父母又看得上，会受到支持。

在婚姻问题上，蒙古族也是“骨血不能倒流”，坚持近亲不能结婚。恪守“无媒不通婚”的规矩。

二　求婚

一旦物色到相貌端庄，年龄相当的女子，就把媒人请到家，设宴招待，说明意图，去女方家“求亲”。

蒙古族对媒人要求很严格，除能说会道善交际外，必须是父母双全、夫妻双全和儿女双全的全命人。

媒人去求婚也叫“送哈达”，骑骏马，穿礼服，

打扮得体。带上男方准备的四件礼物:一匹哈达两坛酒、一件全羊加糕点,全羊也可以一块茶砖四角贴上四块奶饼代替。到女方家,请安后,把哈达挂在佛像前,把其他礼物放在桌子上,将哈达献给女方家长辈每人一条。姑娘父母如果欣然收下礼品,并为媒人热情款待"应口酒"(巴嘎阿日黑),便是成功在望。女方再配上一个媒人,作为女方的代言人。如果女方对这门婚事不满意,那就只让媒人喝顿茶,不留四件礼品,便是婉言谢绝了。

即便成功再望,女方为了突出身分与尊严,也不是一两次求婚就应允,常常是由双方媒人来来往往地周旋数次方能确定。女方家长正式口头应诺亲事,叫"应亲",蒙古语叫做阿玛瑟格呼。

三　订婚

在男女父母和儿女双方都没有疑议下,由双方的媒人,分别到男女双方家里,议定订婚时间和赠送财礼和陪送。择定良辰吉日男方备齐四样礼品:酒、肉、米和粉条及哈达,前往女家订婚,蒙语叫"哈达格乌勒古呼"。

蒙古族从前没有向男方索取"财礼"的习俗,只是订亲和结婚时女方宴请客人的酒肉全由男方负责。

订婚时,男方父母、媒人、至近亲属,祝颂者三

人(蒙语叫忽答);女方父母、兄嫂、亲叔伯、亲娘舅都要参加,并遵循人数成双,象征吉利。

到女方家后,媒人先把哈达献在佛龛前,敬酒一杯放在哈达上,把礼品摆在桌子上。由男方祝颂人,用歌声唱着说明,女方一一查点接受。此时女方的嫂子和女孩的妹妹们,也用唱词,千方挑剔,百般“为难”,导演一出唇枪舌剑互相难倒双方的辩论“歌剧”。

接着是献哈达,先给佛像献,祝赞者唱着歌儿一祝赞;再给女方父母献,又是一祝赞;给舅父母献,又是一祝赞。继之叔伯父母,依次献祝,热闹非凡。祝词是即景生情,言词甜蜜,夸张,唱腔嘹亮。

最后女方摆上订婚宴(蒙语谓“苏木被力格图”),通常欢庆一天。

订婚后,姑娘就不轻易走亲访友,赶集逛庙会。要去也用头巾包裹头部,不露颜面,表示已经订婚。

四　娶亲

在娶亲之前,由男方根据男女双方年龄、属相和生辰择好结婚的良辰吉日,送到女方家中,一是女方好有个准备;二是为了夫妇婚后百年合好,福寿双全。

蒙古族的结婚仪式为期两天，第一天是女方家的喜日。女方在出嫁前一天，由姑娘父母请一对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全命人，作为姑娘的“叩头爸妈”，她们的任务是在姑娘即将要成为“新娘”那一刻为姑娘梳理头发：准备一碗清水、一碗奶水，把姑娘大辫子解开，蘸着清水梳理，再蘸奶水把头梳亮，从头顶一分为二，编成辫子，盘于头上，戴上固箍冠，插上头饰，戴上耳环、项链，打扮得华贵美丽，光彩照人。

女方父母还要举行送亲茶会。请来和姑娘年龄相仿的未婚姑娘为客，用喝茶为女儿饯行。母亲把熬好的第一碗茶端给女儿，女儿躬身接过茶喝一口放下，再给父母敬茶，伏地给双亲叩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父母嘱咐女儿孝敬公婆，善待丈夫，参加茶会的姑娘们每人赠给姑娘一份礼物，唱着《慰亲歌》，一慰必然婚配情；二慰莫忘父母恩；三慰莫忘姐妹和乡亲。

最后女方父母选定主婚大宾、伴娘及能说会道、妙语连珠、调情打俏的四位大嫂、送亲人、送嫁妆人等再吃一顿送亲宴，众人仍然是边吃边唱。喜庆气氛荡漾在屋宇和庭院中，就等新郎来娶亲人。

男方经过精心准备，一切安排妥当。娶亲前

一天，先宴请娶亲队伍（“萨得格”蒙语，意是结亲队伍）。由五至七人组成：新郎和新娘直系亲属首席“忽答”，“二忽答”是邀请的有娶亲丰富经验，能言善辩，能歌善念经文的人，车夫二人，押车小姑娘一位，说客一位。男方父母把接亲车的起程时间、方向交待给这些人，并献上祝词。这些人的属相不与新郎新娘的“反相”，而与之相恩佑，有缘份（这是融合了汉族“五行相生相克”学说的明显痕记）。

接亲车要大小两辆，小的接新娘，大的拉嫁妆。接亲这天男方家里点香敬佛、放鞭炮、吹螺号。新郎戴圆帽，穿长袍，腰系绸质宽带，足蹬绒绣皮靴，披弓挎箭，佩蒙古腰刀，跨骏马，站在白毡上，接受祝颂人唱《弓箭赞》和《骏马赞》。祝颂毕，新郎即由媒人、伴郎、祝颂人、帮办人以及迎亲“七人”簇拥下，扬鞭策马，驱动接亲车，按照预定时辰、方向，浩浩荡荡奔向女方家。

娶亲队伍行至途中适当地方，新郎下马，双膝下跪，二忽答把酒肉摆放地上，祭奠苍天和山川，保佑娶亲平安吉祥。祭毕，上马，驱车直奔姑娘家。

娶亲队伍快到女方家时，几位年长的“平安使者”（指不受婚阻的亲家）策马先行，女方请进院，

热情款待。

娶亲队伍到姑娘家门，新郎在伴郎的陪同下，骑马从右向左绕姑娘闺房一周，并朝闺房上方张弓射箭，表示新郎的勇武精神。随后下马，进院，却被女方四个大嫂拒之门外。这时迎亲车在闺房的西南角架起帐房，他们将在这里，通宵饮酒，喜戏出洋相，女方不予干涉。

女方一首忽答和二首忽答用高桌把门拦住，蒙古语称“德古德达如呼”。男方说客和二忽答将成坛好酒和白方格布、搭裢等摆在桌上，准备回答女方说客和忽答提出的一切问题。男方说客如不败给对方，接亲人顺利进院，如果答不上女方说客的盘问，到时便有人出面解围。男方拿出重礼给说客后进院，整个过程都是用唱的形式完成。女方说客以非常礼貌的语言请男方进院上屋，女方两位年轻媳妇给新郎及说客敬酒，而后出门用银簪子将酒坛的红布戳透，连同白格布一同收起，撤去高桌，文雅地请迎亲人进东屋。

堵门迎婿这一礼俗，据史载说是耶速亥巴特尔（成吉思汗父亲），给成吉思汗提亲时，返回途中曾遭塔塔尔部的暗杀。此后男女婚嫁格外警惕，必须盘根问底，搞个清楚才让进屋。

新郎进屋前，将弓箭放在蒙古包上或屋子的

西南角。进屋向佛像献上整羊(修斯),叩头。女方摆上茶点,为客人接风洗尘。茶点后,新郎向岳父母献哈达。向女方近亲一一献哈达。祝颂人唱着美好动听的祝辞,祝毕。岳父母用银碗盛炒米拌奶汁给新郎吃,叫“吉祥之食”,新郎吃三口,叫伴郎吃净,把银碗揣于怀中,回去后给新郎,作为永久的纪念。

中午,在东西两屋设对桌开酒宴。东屋男方新郎,首席忽答、祝颂人;西屋女方五人,客人坐主席,摆接风酒,吃两口撤下。上羊(乌查),请新郎岳父母坐上座,娶亲人左右作陪。新郎立于地下,用刀割第一块羊肉敬天,割第二块肉敬地,第三块肉敬岳父母,第四块肉敬新娘。之后,伴郎和伴娘抢夺羊肉(乌查)。结果总是各抢一半,双方大吉。再入席,正式开婚宴。

在婚宴开始后,由男方大宾祝颂人带领新郎和伴郎给女方至亲长辈、兄嫂、姐妹以及出席婚宴的所有人献哈达、敬酒、敬烟。此时女方把酒瓶、酒坛把守起来,叫作“护酒”。男方取酒时必须对上口令,答对了,伴郎向护酒人,叩头,取酒敬宾。女方诸人接敬酒时都有祝辞。场面喜气洋洋,歌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随后,男女双方都入座,边喝边唱,边歌边舞。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男方祝颂人会叫来与新郎属相相同的小姑娘(小忽答)，托着酒杯，再次为女方长辈敬酒，接杯人都要有祝辞，有的是即兴编创，有的是传统篇目。这些祝词具有诗的格律美，歌的音乐美，词的意境美。显示了蒙古民族民歌深厚文化底蕴和豪犷的大漠风情。

做“新郎”是男子最甜蜜的时刻，汉族新郎是娶新娘入洞房前后；蒙古族的新郎是在娶亲喜宴上，经得起最甜蜜的挑逗和饱尝戏谑和折腾。

美餐多时，婚宴上又开一场新的文戏：求庚问名。新郎用对歌的形式猜出新娘的年龄、属相和芳名。一群姑娘将新郎团团围个严实。男方伴郎边唱边舞，女方伴娘对唱，猜对为止。

接着是曾经阻门的四大嫂鱼贯而入，坐定后，四大嫂的主颂人也进来坐下。男方祝颂人手提玉磁瓶领着新郎过来。新郎手捧哈达，伴郎高举求名问庚的全羊(焦勒门修斯)，将礼品陈列四大嫂面前桌上。男方祝颂人，用玉磁瓶为四大嫂及祝颂人斟满五杯美酒。新郎面向大嫂双膝跪下，手托玉杯美酒，祝颂人也跪下，高声吟唱《求名歌》。又和对方祝颂人展开长时间的求名问庚对唱，四大嫂尽情嬉笑新郎，满足之后，方告诉庚名。其实庚名男方早已知道，只是借机宣扬姑娘的名望和

增加婚宴的情趣。男方还要准备个金银对环和秀珍蒙古袍。在求庚问名的适当时候祝颂人从怀中取出，受给首席大嫂，蒙古袍绣工精巧，钉有七十个小扣，空两颗未钉，表示：两颗金扣，一对红心，新郎一钉喜事就成。这是结婚纪念，许多夫妇，留到白头偕老。

对方首席大嫂，从怀中取出哈达及庚名红单，交给新郎，新郎双手接过，叩头退下。四大嫂回到西屋，把金银环及秀珍蒙古袍交给新娘，新娘叩头致谢。留作永久纪念。

求庚问名结束后，女方给新郎换装。先在地上铺上红毡，用小米在毡上画个卐字，蒙语叫“哈斯塔嘎”，表示吉祥。请新郎站在上面，由两个年轻媳妇或妇女多是嫂子和小姨子，先喂新郎黄油和牛奶浸泡的炒米。男方说客要赞美一番，以歌唱形式报男方送来的礼物。女方说客开始报喜，再报女方陪送的嫁妆。后开始为新郎换装：头戴蒙古帽、身穿蒙古长袍马褂、腰系红腰带，足穿蒙古高筒靴。腰刀套和褡裢挂在腰的一侧。但在换装过程中，戏谑百出，如只掐着胳膊不给穿另一只袖，只穿一只靴，不给另一只，更为难堪的是不给裤腰带等等，每次新郎都要好话央求，施以“金钱”馈赠，最后穿带整齐，打扮出一个伟岸漂亮的蒙古

青年。

晚饭时，女方为新郎包饺子招待。调皮的嫂子和小姨子在饺子中做着各种文章：有的多放辣椒；有的甚至放进蒺藜（吉利）。新郎不小心辣着是小事，刺破了嘴，就出了洋相了。有的拿走了靴子。于是新郎除满酒请安，好话央求，还得送上礼物。靴子赎回，可别急着穿，靴筒里有又粘又热的肉粥。

诸多嬉戏中，新郎不可少的节目里"掰羊膝骨"，蒙古语"沙恩特音好力木"。在娶亲之夜的笑语中，有人端上一盘羊腿。新郎要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羊膝骨掰出三块：一块祭天，一块给新娘，一块自己保存，留待与新娘对验。

还有精彩的新娘新郎合啃羊脖骨。伴郎与祝颂人领新郎到新娘屋中，正面是梳头爸妈，东北侧面是伴娘和新娘，看热闹的姑娘站满一屋。此时端来煮好的羊脖子骨，非让新郎用手掰开不可。这羊脖子骨是小姨子小舅子暗中拣粗大的中间插上木棍，增加了掰开难度，身小力薄的男子是掰不开的，此时自然受到女方嫂子的奚落。男方祝颂人，过来帮助把肉剔去，掰开半截，拔出木棍，送给嫂子，说出肉给新娘吃，棍给嫂子用，挽回败局。

嫂子把肉接过来，端给新娘，按传统风俗要新

娘和新郎合啃。但此时梳头妈妈发话转移话题，问男方祝颂人这一风俗是怎样留下的？祝颂人用美妙的唱词回答，也就不用啃羊脖骨了。

女方婚宴，通宵达旦，一夜茶不停、酒不停、歌声不停，欢声笑语，真是个欢腾的良宵，人生最美好的夜晚。

清晨，旭日霞光万丈，女方住地充满喜庆气氛，新娘就要随娶亲队伍启程了。头带珠宝首饰、面罩红纱，身穿桃红长袍，足蹬精绣皮靴，花枝招展，美丽动人。由叔父搀扶，在亲友的赞歌声中向父母乡亲告别。此时新郎新娘骑上骏马，鞭炮齐鸣，香烟缭绕，二人绕香炉三圈，下马。新娘在叔父搀扶下乘坐接亲车，随后嫂子们分坐左右辕，母亲、姐妹坐于车内，嫁妆车跟于车后。女方为娶亲队伍一一敬“上马酒”，男方祝颂人用歌向女方致谢，接亲的队伍也在女方亲友的美好祝辞的歌声中缓缓地离去。

接亲队伍走在半路，首先在预先选择好的高地上，点燃篝火，敬上美酒，祭天、祭山川。二是对箭。在祭天时新郎和伴郎策马回家报喜，并带来一辆车，新娘换坐这辆新车。新郎绕新娘坐的车一圈，与新娘互相验箭，并对验羊膝骨。梳头妈妈为新娘分头。

娶亲车临近男方家时,男方的嫂子们迎出门外,敬茶、奶、食品、炒米。剩余食品倒在车轮上,寓意新娘婚后财源滚滚。

新娘到门前,仍遇到小伙子们在门前的拦门棍。女方嫂子出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来来往往的调侃,送上礼物,才放行。新娘与送亲的请进屋里献茶,热情招待。

五　结亲

拜天地,这个仪式是接受汉族的习俗。根据提前查好的时辰,吉时一到,举行拜天地仪式。烧香、放鞭炮,夫妻双双跪下叩头,二忽答唱蒙古《祭天祭地经》。分头妈妈给双方再次梳头,并说一些吉利的祝福话,表示成为结发夫妻。

祭火神,先在火盆上架好干柴,点上海灯,向火中投放五色布条、干鲜果品、红枣烧,等于给火神一只大绵羊,由喇嘛主持念《祭火经》,随之给新娘夫妇净手净面。

拜父母认亲友,新娘首先向公婆叩头,并双手敬献布鞋两双,再为兄嫂也献上布鞋两双,其他亲友敬献哈达一条。随后新娘一一向亲友敬酒。亲友也要向新娘赠送礼物和钱财,新娘一一叩头道谢。

此时亲友入席就座,饮酒高歌,把婚礼推向高

潮。蒙古族的送亲阵容是庞大的，少则三四十人，多则百八十人。送亲的不论翁、媪、姑、童，男方一律招待，一律敬酒。宴席散后，送亲人临行前仍敬“上马酒”。

蒙古族的闹洞房是文明的。主要让新郎新娘合唱或单唱蒙古族中流行歌曲。大家也唱一些美好的祝词，最后大家共同唱“好来宝”等。之后新娘给每人斟一杯酒，分发一些糖果，大家知趣地散去。这时分头妈妈让夫妻俩对面躺下，把门窗关好，退去。新婚夫妇此时才算进入平静而又不平静的洞房花烛夜，人生美好时。

蒙古族的婚礼，是一部民俗史，具有特殊文化底蕴，是诗剧、歌剧，更是亲情、爱情、民族情的喜剧。

参考书目：《漠南风情录》
《赤峰市文史资料选集》第四集
——《喀喇沁婚俗记》单夫
——《喀喇沁右旗蒙古族平民结婚仪式》
——《宁城县志》
——《蒙古族嫁娶》
——《赤峰蒙古史》(上卷)
——《蒙古风俗习惯》
注：作者吴恩巴雅尔，为喀喇沁旗县王爷府的副馆长。

回族的丧葬

崔万民

围场满蒙自治县由13个民族组成，在12个少数民族中，回族位居第3位，主要分布在围场镇北菜园街和杨家湾乡海苏湾村。回族人民的丧葬习俗是土葬。它同汉族、满族、蒙古族的葬俗是有明显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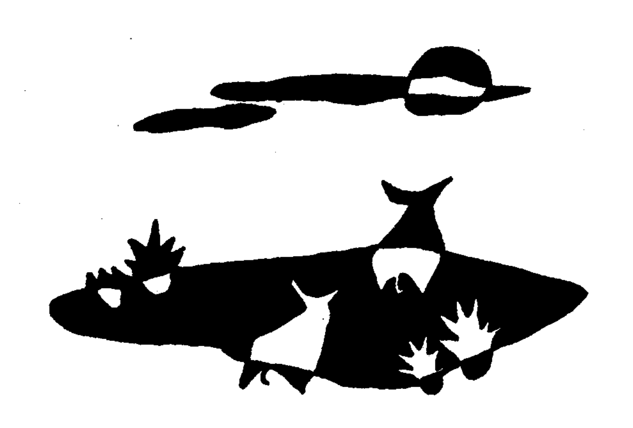
回民“无常”（死亡）时要请阿訇主持殡葬。因此围场回族人的丧葬与伊斯兰教大致相同。伊斯兰教主张厚养、薄葬、速葬、土葬。**厚养**，即指子女孝敬父母，赡养老人，细心服侍，尤其是父母丧失生活、劳动能力时，要很好照顾老人，充分满足其物质、精神方面的需要。**薄葬**，则指无论亡人生前是贫是富，社会地位或高或低，一律用同样尺寸的白布裹尸，埋入同样大、小的墓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得用任何物品陪葬，葬礼的程序也都一样，送葬人不须穿“孝服”，不吊孝，衣服洗净便可。反对大操大办。**速葬**，是指葬而不择时、不择地，三日内必葬。一般晚上“无常”，次晨出葬，晨亡午

葬。**土葬**,是把尸体直接放入土中,不用棺椁。丧葬,有“洗”、“穿”、“站”、“埋”四项礼仪。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者统称)的习惯说法为:清水洗、白布包、简礼、深葬。是在人“无常”后,所进行的。**“洗”**,俗称“埋宜台”(尸体)。要洗净全身,叫“着水”。一般由三人承担,以至亲为好,用两大桶净温水,按先右后左,先上后下的顺序,遍洗全身,先是“小净”,然后再清洗全身数次,用两块浴巾分别擦拭上身、下身,看不到任何污秽为止。**“穿”**,俗称穿“可番”(也译开番,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寿衣”),将准备好的白布可番,先卷左,后卷右,一层一层的包裹好,男性亡者,包括“皮拉汗”(坎肩)、小卧单(如同褥子)、大卧单(外层包裹全身的白布)用三块(件)女性增加盖头、胸罩两件,共五块(件)。再用白布带系腰和紧头、足。回族格底木教派穆斯林一般还要在白布上书写“清真言”或“作证词”,以示死者敬仰安拉。口、额头、手脚处,要放冰片、麝香以防腐、驱虫。然后移入“塔布匣子”(一种底层可抽拉的无盖木匣),即清真寺内专送亡人的公用木匣,由亲人抬到清真寺,由阿訇举行“站”礼仪式。**“站”**俗称站“者那则”,也译作“折纳孜”(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殡礼”)。由阿訇或者死者生前选定的主持葬礼的伊玛目(阿拉伯语音

译，意为“站在前面的人”、“首领”、“表率”、“表征”等，为伊斯兰教用语）率事先进行过大、小净的送葬穆斯林，站在面对头北、面西（面向麦加克尔白）放在最前面的“塔布匣子”（塔布，波利尼西亚语音译，意为“禁忌”，不可侵犯）举行转“费达”（即赎罪）仪式，诵读“古兰经”（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诵读”、“读物”、共三十卷，114 章，6200 余节）章节（内容是祈求真主宽恕死者，祝愿死者安息），送葬者站一个大圆圈，按照定制与死者年龄计算出应转的圈数、人次，再由家属拿出现金或实物（有的教派以古兰经）递给圈中伊玛目，再传递过来，依次传递，直到转移够计算的圈子数和人次为止。而后，伊玛目站在“塔布匣子”旁，面向西，送葬穆斯林站在伊玛目后，抬手至耳念三次“赞主词”（即安拉至大），全部仪式结束，由众人护送遗体去墓地埋葬。对宗教祈祝祷一项仪式，有的举行，有的不举行。丧葬的浪费也往往花在宗教活动上。**“埋”**即埋葬，必须是土葬，坟坑深两米，长可容体，直坑西壁再挖一个偏洞（称热合提）上园下方，高约一米，将亡人头北脚南，面向西放入偏洞内，取出匣子后，用砖封好洞口（热合提门），然后填平直坑，地面堆成鱼脊形坟堆，南北向，长方形。有的不留坟头，立石碑。有

的地方仅用沙土埋葬。如果亡人死于海上，由可在葬礼后行水葬。入葬时间阿訇诵经。亲属不许啼哭。葬后三天、七天(头七)、月斋(一个月)、“四十”、“百日”、“周年”，一般要在家请阿訇诵经。主麻日、开斋节、古尔邦节亲人要到坟上悼念亡人。老人亡故后，还要请阿訇“走坟”、“守坟”四十天或一百天。至于当今有些人戴黑纱、披麻戴孝、扎纸张、焚化纸钱(冥票)等等，搞的一些活动，是受当地汉俗影响。

穆斯林去世，忌称“死亡”，而称“归真”，即“回归圣真主阙下”之意，或用阿拉伯语的音译“冒台”，意即逝世。也有称“无常”的。



美丽的塞罕坝

王福兴

素有“华北绿宝石”之称的木兰围场塞罕坝，中国北方最大的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总面积141万亩，其中森林景观110万亩，草原景观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8%。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高等植物81科、312属、659种，有以狍子为主的兽类11科，25种，有以黑琴鸡为主的鸟类27科88种。来这里度过假，避过暑的，都感慨频多，称这里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的确这样，当你登高远眺，映入你眼帘的不仅是浩瀚如碧海的黑松林，还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顷草原，更有一望无际的醉人花海。鸟语花香，尽在其中。塞罕坝美得出奇、美得令人向往，美得引无数国内外游人到此赏玩，尽情歌舞。

塞罕坝的美，美在四季，四季如画。

春天的塞罕坝，虽没有喧闹的场景，但有顽强

生命的歌吟。当冰消雪融，当高原的风变得明媚柔和那棵棵小草在发芽、泛青，只须一夜春风来。那离离原上草，不仅野火烧不尽，冰雪也压不住。当你仔细观察，它们一啸冲天的向上精神，立时会使你焕发出青春的火焰。你站在那里，可以思接千里，暇思万想，赋诗作画，也可以尽情高歌“草原就是我的家”。

夏季的塞罕坝，是迷人的季节，也是动情的境地。放眼望去，万木葱茏，百花竞放，彩蝶飞舞。不说别的，就说花吧，那种类繁多的花点缀在草丛中，经风一吹，那舞姿就令人倾倒，那扑鼻而来的香味，一闻就会沁人心醉。花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金莲花和干枝梅，前者以规模和赋有药效价值见长，且风姿绰约，动人心魄；后者以罕见和怪异取胜，且风骨清逸，勾人心魂。金莲花在木兰的规模堪称举世罕遇，盛开之时，如翳如云，如伞如盖，漫滩铺去，万顷金黄。干枝梅的美誉在于花的忠贞不渝，锲而不舍；子熟而花不落，叶谢而花不凋，枝枯而花不弃，是忠贞爱情与忠于职守的恰切象征，那细碎如星，纯洁如雪的小花与枝干相偎相依，生死不离，委实令人心醉。

夏季走进塞罕坝，仿佛进入清凉的世界，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 25℃，在无

边的松林中小憩，清静惬意，林中听涛，花海赏艳，令人神往。在白桦林里散步，如梦境。登上塞罕塔可见“云开灌木万青山，紫菊金莲遍地生”之境地，森林草原，漫岗迂回，河湖密布，牛羊成群，狍鹿飞驰，百鸟漫顶，白云擦肩，花朵鲜艳，这美丽的画面令人流连忘返。

秋季的塞罕坝，天高云淡，风情无限。望天空的云朵变幻万千，看马群悠来漫去，使人迷恋，叫人陶醉。坝上秋天的夕阳也是美的。当夕阳把秋天的草原罩上了神秘的面纱时，远近的一切，都归宿在一片雾纱之中，若云又若霭，天地合一，满眼是轻柔的红、鲜亮的黄。秋花遍地，一眼望去，一簇簇、一串串、一朵朵精致的小花俏立枝头，在风儿里轻轻的颤动，更有那花中骄子——干枝梅不择季节地开放着，在夕阳的照耀下，更加显得赋有生命力。

冬季的塞罕坝，冰雕玉砌，银装素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好一派北国风光。在这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的时候，滑雪场上人影点点，百橇竞逐，拍雪景，作诗画的大有人在。坝上的雪景千奇百态，你步入其中，神话般的情思萦绕心头，让人心旷神怡，神情融入大自然的美妙画卷中。

塞罕坝，自然的美，用文字表达不尽。只有身

临其境，才能领略到他美的内涵。这里有迷人的十里画廊，还有登高望远的塞罕塔，更有神话般传说的塞北佛石庙，只要你有兴趣，前边的坝头观，黄花滩、百花坡、塞罕湖、七星湖、泰丰湖、滦河源头第一漂、康熙点将台、乌兰布通古战场、将军泡子——都在等待您的赏游。



围场的堆砬山

王福兴　　田普录

座落在围场县城南不远的群山中有一山名叫堆砬山，又称灵龟峰，耸立其间。

堆砬山峰秀、林茂、石怪、景奇，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层层叠叠，一块和一块似连非连，险而不夷，巨松在挺拔陡峭的崖壁中伸出手臂，像是欢迎贵宾的到来。抬头望去，有块巨大的岩石一头凸悬在空中，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但不必担心，又非常坚固。原来堆砬山是天然石块挤在一起的两座小山峰，像一对孪生姐妹，依偎在大山母亲的怀抱中。又像柘木枝杆上长出两个幼芽，那样清新、活泼。

往上走，两峰间的山口又像一座石门，站在石门往下看去，展现在眼前的景物会使你赞叹不已。只见一根粗壮的岩石柱，托起约有两三个磨盘大的圆形巨石，形状真像个大蘑菇。在蘑菇石的一侧还发现形如鲸鱼状的岩石图案，有头有尾，特别是头上出现的眼窝更增加了逼真感。

拨开茂密的植被，沿崎岖小路，从东南角向上望去，两座山峰的顶端各有一石龟卧在两峰上，头朝东方，一大一小，大龟在前，小龟在后，大龟背负重物，奋力昂头，小龟伸长脖子奋力追赶。这就是灵龟峰的来意。再看顶端两边的巨石千姿百态，其形各异，有的像黄山，"猴子观海"，有的像"熊猫戏竹"直起笨重的身躯向游人致意，一些"四不像"的怪石也能令游人展现驻足的风姿。

山的背后处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山洞，洞内非常凉爽，是野餐、避暑的好去处。山洞不远的密林中有一块比炕稍大的长方形石板，人们叫它"仙人床"，置身在"仙人床"上，举目望去，白云朵朵，绿水青山，水在崖中流淌，鸟在枝头上鸣唱，草地上多种山花在风中抖动，像块无边的花地毯，这里树木葱茏，落叶松、油松、枫树、山杨、白桦与野花泥土夹杂在一块，放出沁人肺腹的芳香。



神奇的玲珑峰

范国核　吴振琦　张庆海

出围场县城西行,沿国道111线行至18公里处,在伊逊河的北岸,有一处天造地设的神奇所在,这里峡幽谷静,岭绿嶂奇,美景浑然天成,这便是少被人知的清代僧机图(蒙语,意窟窿)峰。

走进玲珑山的入谷口,两边是陡峭的悬崖,绝壁上是两个巨大的石狮,双目圆睁,相对而视,形象逼真,让人不由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妙。沿谷间山路前行,峰回路转之后,在东山的半山腰处,有一个巨大的石人威然矗立,石人五官俱全,栩栩如生。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大盗在玲珑峰挖宝,有一仙人为护宝,日夜在山上看守,最终化成了石人。

盘山而上,穿过成荫的绿树,隐约可见一角飞檐,这便是原天仙观坤殿的所在。天仙观为张李之道长所建,毁于"文革"期间,1980年其弟子徐宗界在遗址又建了两间道观,如今徐道长已80有余,被聘在白云古洞的八宝洞当道长。玲珑峰能

被道士选为修身养性之所，足见其山奇水异，非同凡响。

在天仙观的左前方，有一个泉眼，泉水清澈见底，鱼虾浮动，颇有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所写“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意境。泉的东面有一巨大的“石龟”缩足引颈，将头伸向泉水，此为“神龟戏水”。正对“神龟”的西面山峦，龙飞凤舞，奔腾跨跃，到泉水处戛然而止，酷似一条青龙，人称“青龙汲水”。那群山舞动的曲线，神龟酣然的情态与泉水静谧的波光水色，山水交融，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需雕琢的，天然的和谐。

沿石阶而上，在郁郁葱葱的山核桃枝下，有两块巨石相对而卧，亭台石地，树影婆裟，依山傍水，宛如两个长者在忘情对弈，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南斗北斗对弈”。在玲珑峰巅的平坦处，有一凹陷的石坑，相传是古代的“莲花池”，在莲花池东有三清观，西有独角龙，前有南天门，无不是神奇所在。

玲珑峰的巅峰之处有一巨大的梯形山洞，前后通天，其独特之态让人叹为观止。其北侧是北天门，举目远眺，但见群山起伏，云雾弥漫，白茫茫的云海淹没了群山，只有些最高的山峰，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那飘动的云海如惊涛拍打海岸，又

如白棉素娟四处堆积，烟波徐徐飘飞……此刻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这里便是元代的尖山寨。

玲珑峰奇特的地形地貌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它位于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系余脉的沉降带，随着地壳的运动逐渐上升为陆地，形成连绵起伏的中、低山脉或丘陵，地质表层为花岗岩、玄武岩等，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重岭沟壑的奇特的岩洞。

神奇的玲珑峰如今已向游人敞开了胸怀。它希望有识之士的慧眼识珠，不吝啬地给以装点，展现给更多的游人。



苍 翠 崖

韩玉文

在县城的西部天宝山腹地，有一摩崖，叫苍翠崖。

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援而上，危岩劲松在绝顶上森严屹立，两侧峭壁于步履间悄悄后移，在行进中，忽然出现一块开阔地，这便是苍翠崖侧。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块巨石堆成的一座石山。石山的顶端绝壁处，清晰地镂刻着一个“磊”字，其意明了此山即三块巨石组成，山为三石，三石为“磊”，“磊”字与山天趣浑然。移步向西，十余丈高的“苍翠”崖尽收眼底，那行草书大字，恰到好处地站居摩崖中间，游目四望，这里峭壁千仞，涧壑内清溪倒悬，苔藓丛生，松涛与水韵形成美妙的琴音，可见“苍翠”意韵之清远。摩崖石侧平直的石壁上篆刻着“岫涧”二字，从字面上看乃两峡一涧之意，与自然景色亦颇吻合，但仔细思之，似有更为深远的机理，竖书的“岫涧”两字均为左右结构，分而读之即是“山间”、“山水”，再细察，两字下

面有一个反复记号，若把壁上二字拆开反复使用，便可读成一联："山间水，山水间，山山水出涧"，这样读来绝妙异常，"山山"为"出"，"水间"为"涧"，分合得体，并且联语与天宝山自然风光相得益彰。于是，便急于试对，结果可想而知，偶联难成。

后寻访杨野先生方才得知此刻为民国年间围场教育世家皮献亭及其子女的真迹。他说，当时，皮献亭连同其子皮文蔚，其女皮文英，被人们誉为"塞外三苏"，他们的琴、棋、书、画堪称紫塞一绝，从笔力笔法推断，"苍翠"二字系献亭所书，"磊"字为文蔚之笔，观"屾涧"二字笔道纤细、隽美，当是才女文英之作了。只是这"屾涧"二字还能读成一联，以前并未斟酌过，细细想来，不正与东坡、小妹、秦观的回环诗相近吗？深思之，极有可能当年文英出此上联，皮氏三杰没有对出下联，刻此石旨在向后人征对吧！

我不由的感叹起来：此奇山配此奇文，可谓相映成趣。继而，再把思路拓展开来，只有中国的方块字，才能音、形、意兼备，才得以分合自如，才蓄意遂远……

由此，使人想到，摩崖侧的一尊奇石上，刻有"皴丑"二字，"皴"为中国画技巧之一，意为此石奇丑，堪可入画。按拆合关系，"皴"右边为皮，乃三

文人之姓氏，左边是“俊“字的一半，拆开应是皮氏谦谓之语：“三皮”合起来，只配半个俊杰，此丑难当呀！这也许是为对不出“小妹”的下联而发的感慨吧?!



别具一格的大光顶山

张桂如

大光顶山在围场中部群山中独占魁首，别具一格，在县内外小有名气。其座落在县城东偏北方向，据县城 30 公里。此山高大，海拔 1772 米，山顶上平坦处达 5 平方公里。它山脚的四面分属于 4 个乡。乘车沿盘山公路向上，你就会发觉这座大山别具一格。它山脚下是农田，下半坡是阔叶林，上半坡是针叶林，山顶上是开阔起伏的草甸。它集坝下景色与坝上风光于一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每到夏季，到这里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大光顶山原名大观景山，据《围场厅志》记载，“大观景山，四周多树木，顶巅平阔，纵横十里，山上有泉”，清帝康熙、乾隆都曾到此山射猎。山上曾发现老兵营寨遗址，据说这里驻扎过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后来，大观景山怎么会变成大光顶子了呢？据查资料，原来围场开围以后，设“垦植局”，在山顶采伐“高九丈、直径五市尺”的大松树，

供清廷建筑用。后又经民国、日伪时期的乱砍滥伐，原始森林残遭破坏，形成了一个光顶，所以人们叫它大光顶山了。解放以后，大光顶山经过围场人民治山治水、植树造林等梳装打扮，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异彩。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由于大光顶山高，站在山崖上可以远眺绵亘的塞罕大坝，鸟瞰周围数百里群山。在这里看山，有如在海岛上看海，起伏的山山岭岭恰似大海的波涛。由于山顶平阔，百草茂盛，繁花似锦，坝上草原有的花这里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百花争妍。夏日里到此一游，既饱览了大山的雄奇景色，又领略了草原的秀丽风光，真会感到身轻气爽，心旷神怡。有一些外地客人，来不及上坝，就到光顶山一游，也会心满意足，觉得不虚此行。

光顶山又是百宝山。这座大山里盛产山韭菜、蕨菜、黄花、蘑菇、草荔枝、大黄等，几乎是围场山野资源的大展览馆。山韭菜，相传为前朝占山为王的绿林中人所种，个别地方古韭畦依稀可见。这里的山韭菜比家韭菜叶宽，味道比家韭菜鲜美、味更浓。蕨菜，又名如意菜，黄花，又名金针。都是围场的特产，又同为清朝著名宫廷菜。蘑菇，有草蘑和松蘑。夏秋之交，雨水充沛，蘑菇圈随处可

觅。草荔枝是一种鲜红鲜红的草莓类野果，酸甜可口，味似荔枝，非常好吃。据说康熙的一位宠妃，平生最爱吃大光顶山的草荔枝，被称为"荔枝娘娘"。大黄，又称酸膜，县内食品企业加工的酸膜罐头即以大黄茎干为原料。其酸甜味道又与草荔枝有别，采回蒸熟食用，别有一种滋味。凡上过大光顶山游玩的人，没有空手而归的。大光顶山的森林中还有山鸡、野兔、狍子等许多野生动物，时常与游人不期而遇，令人产生意外的惊喜。



伊逊河

张秀超

伊逊是蒙古语九曲，弯多的意思，亦称羊肠子河。伊逊河是围场县域内较大的一条河流，它发源围场的塞罕坝下，源之初是一脉细弱的水流，隐藏于丰草茂林之中，但它汲塞罕坝峰岳之精气，聚山川之灵韵，不以其弱小而止息。一路跌宕，一路高歌，于峰回处逆转，于险滩处夺流，自强不息，永往直前。它以其坚韧越千里沟壑；以其包容汇百川之水。有容乃大，百年沧桑，不舍昼夜，它以细流而成大河，浩浩荡荡，流经围场中部疆域。主流从今天的哈里哈乡，东南流经棋盘山、龙头山，围内流经90公里，经南流出崖口，流经隆化城南，继而再度南流，出隆化县经滦平县在承德市的宫后村清代喀喇河屯行宫后归入滦河。

伊逊河流经丰草秀木之中，水质清沏而甘甜，清玄烨皇帝当年赋《汲伊逊河水烹茶》诗赞曰："玉泉伊逊真巨臂，难为伯仲均天禀"，京城玉泉水以水质佳而名满京都，皇帝称赞只有塞北伊逊水可

与玉泉水比,可见伊逊水非同一般了。林茂丰而禽鸟聚,河水深而鱼肥。伊逊河出产鱼中极品细鳞鱼,其鱼味道鲜美。当年乾隆皇帝来围打猎食此鱼赞不绝口,其随行官员乘兴赋诗《伊逊河食细鳞鱼》:"卓歇伊逊上,秋风落叶初,何图木兰塞,重见莱花鱼(细鳞鱼)——晚餐辄停箸,不敢当风蔬。"这位官员十分欣喜地称赞,想不到在偏远的木兰围场有这样味道鲜美的佳味、鱼香满口,不忍下咽,致使食者停下筷子细细品味。

"上善若水,水善万物而不争"木兰围场的伊逊水,从清至今,数百年苍桑阅遍,无论是烽火侵袭,还是盛世太平,它经九曲十八湾奔流不息,滋润着塞外这片远山黑土,养育着一代代木兰儿女。锥峰刚凛,伊水缠绵铸就木兰人坚韧、勇敢、勤勉、善良的刚骨和心性。今天,木兰人伴着伊逊水的节律奏响新的拼搏进取的进行曲,再铸木兰辉煌。



玄烨 弘历 颙琰木兰诗作选注

白雯萍

玄烨二首

一、塞外赏览风俗[1]

玄烨[2]

莫道严关险[3]，　　要荒[4] 总一家。
戎楼无鼓角[5]，　　战垒[6] 是桑麻。
野净[7] 知民乐，　　时清见物华。[8]
林中归径晚，　　旗旆[9] 满烟霞。

---

① 赏览风俗：赏览：指皇帝巡视蕃察四方。风俗：在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通行的风尚、习惯、仪节等。

② 玄烨：（1654—1722 年）爱新觉罗氏。福临三子。清入关第二代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年号康熙，谥号仁皇帝。庙号圣祖。八岁登基，康熙八年亲政。捕权臣鳌拜，停圈地，削"三藩"，统一台湾，击败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匪徒，与俄国签定《尼布楚议界条约》确立中俄边界东段线。三次亲征噶尔丹，平其叛乱。派兵击败准噶尔反动势力对西藏的侵扰。酷爱西方科学知识，认真向西洋传教士请教。但未能推广应用，使科术落后于欧洲，埋下了以后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祸根。（占黄河、疏运河、奖开荒、开海、矿之禁。尊孔读经，宣扬程朱理学。扶廉吏，惩贪官。晚年可称治平之世。）

③ 严关：严密险要的关口。

④ 要荒：边远的地方。

⑤ 戎楼无鼓角：戎楼：在边疆建筑的了望敌情的城楼。鼓：古代军队打仗时用的战鼓。角：军中用以传达号令的螺角或军号。

⑥ 战垒：垒音 lěi 磊：古代军中作防守用的墙壁，如深沟高垒。这里指战场。

⑦ 野净：野：指民间。《晋书》"朝野清宴"。净：清净。

⑧ 时清见物华：时清：时代清明；物华：万物之菁华。

⑨ 旗旆：旆音 pèi 佩，旗子上镶的边：泛指旗帜。

玄烨以五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了在民族问题上的深刻思想,以及其广阔胸怀和愉悦心情。

此诗起句意境辽阔,思绪翱翔于广大的塞北空间,抒发了玄烨中原和关外塞北是一家的民族统一思想。中间四句,铺叙景色,用词遣句,清淡恬适:戍楼、鼓角、战垒、桑麻,是实是物。在诗人眼中构成一幅古战场变为田园图。““无”、“是”二字用的准切有力;“知”、“见”别致生动;前两联写中外一家,古战场变成田园种植桑麻;后两联写和平时期民乐、物华。前后照应,层次明析,诗意深刻,语言质朴。反映了玄烨雄健质朴的诗风和雄才大略的胸怀。

此诗大意:不要说边关的险要,边远的塞北和中原总是一家。边庭的哨所已听不到战鼓和号角声,战场已变成良田,生长着桑麻。北国民间安宁,人民安居乐业,时代清明,到处可见丰饶的物华。傍晚从林中归来,旌旗映照着绚丽的晚霞。



二、木兰回跸驻避暑山庄之作①

玄烨　癸酉②

木兰秋狝薄言旋③，　　山馆重教此憩延。④
菊有黄华幽傍砌⑤，　　桂余金粟馥喷筵。⑥
隔林麋哨声迟鹿，　　写栋⑦ 云飞影乱烟。
往返停留频属咏，　　笺挥壁勤⑧ 自年年。

玄烨于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从卜克崖口出围回到山庄见景生情，有所感怀，写下了此七言律诗。景物与思绪交融，平淡中寓开朗。用优美的自然景物代替了宫廷物什，构思巧妙，语言锤炼，代替了典故的堆砌。语意清新，境界开阔。但缺乏思想内涵。诗的大意是木兰秋狝结束了，已经凯旋，回到山庄处理政务和休闲。那菊花吐着幽香开在台阶的旁边，桂树的花蕊似金粟一样喷发着香气，漫过了席筵。林外哨鹿声声，招来了麋

---

① 此诗选自《承德府志》卷首六·天章三·页二十四。
② 癸酉：干支纪年，康熙三十二年公元 1693 年。
③ 木兰秋狝薄言旋：木兰：满语，“哨鹿”的意思。秋狝：狝音 xiǎn，古时秋季帝王出猎称为狝。《尔雅·释天》中有“秋猎为狝”。《左传·隐公五年》：“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也”。薄：少、迫近。旋：回，如凯旋。
④ 山馆重教此憩延：山馆：指山庄。憩：休息。延：伸展、连续、推迟。
⑤ 菊有黄花幽傍砌：幽音 yōu 优，僻静，深远。砌音 qì 气，台阶边沿。傍：靠近。
⑥ 桂余金粟馥喷筵：金粟：桂花的花蕊如金粟点缀枝头，亦谓之金粟。桂：桂花树，花小黄或白色，极香。馥音 fù 付，香气。喷：受压射出。引申散发出。筵音 yán 言，古人席地而坐铺的大席。泛指酒席。
⑦ 写栋：画栋，雕梁画栋。
⑧ 笺挥壁勤：笺音 jiān 尖：小幅的纸。壁勤：在石壁上刻字。

鹿;画栋雕梁的亭榭屋宇隐约于云烟中。往返和停留在山庄与木兰,我不断的作诗,年年刻于石上或挥毫于纸端。



弘历二首

一　猎

弘历[①]　　辛酉[②]

秋蒐文囿[③] 是王庭，　祖泽贻今赫濯灵。[④]

桓赳[⑤] 健儿身掠鹞，　骠姚车骑[⑥] 箭流星。

龙堆[⑦] 露冷鸣苍鹿，　沙塞风高语白翎。[⑧]

大兕小豝[⑨] 亲射得，　驼峰高架进慈宁。[⑩]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弘历命准备木

---

① 弘历(1711—1799年)爱新觉罗氏。弘历。清世宗胤祯第四子。1735—1796年在位，年号乾隆，谥号纯皇帝。庙号高宗。实施“宽严并济之道”，继续推行“摊丁入亩”，鼓励开荒，修治河道，颁布“出旗为民”令，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先后派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西藏珠尔默特叛乱。两次用兵准噶尔部，后期两次击败廓尔喀入侵，严词拒绝英国特使马格尔尼提出的侵略要求。但也拒绝了通商，造成闭关锁国，科技落后，失去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积贫积弱，为其后代埋下了丧权辱国的祸根。尊孔子、倡汉字。下令编成《五体清文鉴》、《满州三原流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典通考》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此间，借机毁书二十余次，屡兴文字狱，屠杀反清人士。用和珅大长贪污之风，吏治腐败。嘉庆元年(1796年)，禅位太子颙琰。称太上皇三年后卒。

② 辛酉：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

③ 秋蒐文囿：蒐音sōu搜，指春天围猎。囿音yòu右，养动物的园子。这里指木兰围场。

④ 祖泽贻今赫濯灵：祖泽：指康熙的恩德。贻音yí仪，赠给、遗留。赫音hè贺，显耀、盛大。灵：效验，神灵。

⑤ 桓赳：健壮威武的样子。

⑥ 骠姚车骑：骠音piào票、骑音qí齐：坐骑、骑兵。骠骑将军：汉武帝时设此官，秩禄与大将军同。霍去病因征匈奴有功，武帝拜为骠骑将军。这里指代参加木兰秋狝的八旗将士。

⑦ 龙堆：古指塞外地。《汉书》中有“楼兰国最在边垂近汉，地当白龙堆。这里是借喻塞外的木兰围场。

⑧ 沙塞：平沙旷野的塞外。这里仍是借喻木兰围场。语白翎：百灵鸟在天空鸣唱。

⑨ 大兕小豝：兕音sì四，古书上指的是雌性的犀牛。小豝，豝音bà巴，母猪(野猪)。这里借喻弘历射猎的大小野兽。

⑩ 驼峰：驼音tuó柁。驼峰：骆驼背上的肉峰。慈：旧称母亲为家慈。慈宁：慈母康宁。强皇太后居住慈宁，以“慈宁”指代皇太后。

兰秋狝,这是他继承祖制第一次赴木兰围场行围。于八月二十日从伊逊崖口(伊逊:蒙古语:汉意为九数。因是水发源木兰中,凡九曲而出岩口,崖口即今庙宫前山道口)入围,历时二十余日,行围二十余场,。此诗以七律的形式,表达了弘历继承“家法”。率领八旗军旅,木兰秋狝的雄壮场面,以及孝敬慈母的品德。

首句,气势磅薄,视塞北大地是皇家庭院,可谓“气吞山河”。二联,以形象的语言,“身掠鹞”、“箭似流星”概括描绘了秋狝围猎的场面。意境开阔,气势雄浑。三联,连举两地:“龙堆”实指;“沙塞”泛指,联想丰富,表现一种寥阔的境界和作者的豪迈胸怀。四联写的平淡。诗的大意是:

春猎秋狝的木兰围场是皇家的庭院,圣祖遗留的猎苑神灵又显耀。健壮威武的军士骄健赛过鹰鹞,扈从的蒙古王公,随围大臣箭法高超。在露冷的塞北围猎中,天上飞着苍鹰,地上奔跑着鹿狍。在风高的平沙旷野中,长空搏击的白翎在鸣叫。我亲手射猎的野兽,架满驼峰送给母后,以尽孝道。

二 射 熊

弘历 癸亥[1]

寥萧玉宇[2] 拂秋风， 掌样霜铎好射熊。

却笑汉皇犹赤帝[3]， 空输女子是英雄。[4]

此诗是弘历于乾隆八年第二次木兰秋狝时所作。七月二十二日于伊逊崖口入围，行围四场，就有射熊的壮举。作者以“射熊”为题，显示了弘历的雄伟气魄，暗示南北朝时有斛律光“射雕手”的典故。以七言绝句的形式抒发作者的豪情与治国政策的哲理。诗的气势，直泻而下，神定气足，笔意酣畅，表达了作者的英雄气概，和对刘邦和亲政策的极度藐视。诗的大意是：

秋风吹拂着光洁如玉寥阔的天空，锋利的披箭正好射熊。可笑汉皇刘邦自夸如同“赤帝子”，白送女子给匈奴，算什么英雄。

---

① 癸亥：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

② 寥萧玉宇：寥音liáo辽，静寂、空虚。萧音xiāo消。寥阔萧条的样子。玉宇：光洁如玉的天空。

③ 赤帝：汉朝盛行五德终始的封建迷信学说，谓汉以火德王，火赤色。因神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称其为“赤帝子”。

④ 空输句：汉初，刘邦曾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台（今山西大同市东），用谋士陈平计：送公主给匈奴单于作“妻子”，七日方得解围。这种白白送公主给匈奴单于作“妻子”的和亲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刘彻时期，打败匈奴后，才终止。

颙琰二首

启跸幸木兰行围即事[①]

颙　琰[②]　　王戌[③]

一

习武遵家法[④]，　上兰[⑤]秋狝开。

祖功奕祀仰[⑥]，　考泽万年培。[⑦]

柔远八方暨[⑧]，　近光诸部来。[⑨]

首程风日爽，　沙路启岩隈。[⑩]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七月颙琰自圆明园

---

① 此诗选自《承德府志》卷首十四，天章十一，页一。

② 颙琰：(1760—1820)爱新觉罗氏，弘历第十五子，清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嘉庆。谥号睿皇帝，庙号仁宗。乾隆六十年(1795年)册封皇太子，第二年(1796年)改元嘉庆。至四年弘历死始亲政。清朝封建社会经历百年已由盛转衰。虽努力整顿吏治，杀权臣和珅不能根除腐败。军备驰废，河患频仍，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民族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即位当年就爆发了鄂、川、豫、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参加者几十万人；十八年又爆发了林清、李文成为首的河南天理教起义。起义均经残酷镇压而失败。在位期间，多次减免田赋，修浚河道，但积重难返，江河日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赴热河山庄准备秋狝。二十五日死于寝殿。年六十一岁，在位二十五年。

③ 干支纪年、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

④ 家法：指射猎。《木兰记》中"射猎为本朝家法"句。全句意为学习武功就要遵守射猎的家法。

⑤ 上兰：指木兰围场。上兰观名，在上林苑中，汉武帝每校猎于上兰，颙琰曾把"东庙宫"的行殿称"上兰别墅"。此句意为，在木兰围场展开秋狝。

⑥ 祖功奕祀仰：祖功：指皇祖玄烨，他的谥号为圣祖。祖功：玄烨的文工武治。奕：大、美、次序。祀音 sì 四，祭祀。仰：敬仰。全句意皇祖(康熙)的文工武治令人敬仰。

⑦ 考泽万年培：考，已死之父。泽：谓恩德。皇父(乾隆弘历)培养的恩德流传久远。

⑧ 柔远八方暨：柔远：安定远方之人。暨：与、及、和。全句意：怀柔的政策遍及四面八方。

⑨ 近光诸部来：扈从木兰秋狝的蒙古各部按时到来。

⑩ 岩隈：岩音 yán 言，岩石突起形成的山峰。隈音 wēi 威。山或水弯的地方。全句意走过沙岭又转过了山弯。

赴避暑山庄,八月十七日赴木兰围场,这是他第一次木兰秋狝。

他以五言律诗的形式,叙述了赴木兰的感想和景物。首联讲学习武备遵守骑射的家法,在木兰围场展开秋狝。二联赞扬皇祖(康熙)文工武治,令人敬仰。皇父(乾隆)培养的恩德流传久远。三联是讲柔远的政策遍及八方,扈从的蒙古各部仍如昔日,左右趋扈。尾联,以愉悦的心情写景,秋高气爽,艳阳温暖,走过了沙路又转过了山弯。



二

入崖口[1]

颙　琰　　王申[2]

廿里平原度小村，　峰如户牖岭如门。[3]

御碑旧建瞻崇坂[4]，　神庙新成绕短垣。

倚壁岚光秋日绚，　临崖林景晓霞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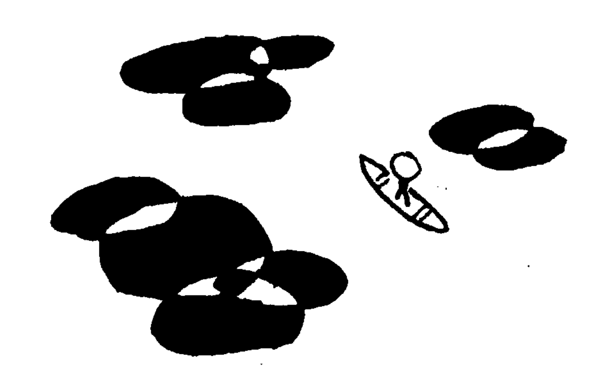
伊逊曲折浮梁接[5]，　甸猎初开千骑屯。

嘉庆十七年(壬申公元1812年)八月中旬，颙琰赴热河避暑山庄，十六日赴木兰围。这是他第七次木兰秋狝。

他以七言律诗的形式描写入崖口时的情景。崖口外廿里的平原上，有人居住的村庄。一个“度”字，写出他悠然自得地行进的情形。第二句，点题，他看到的崖口是重重叠叠的山峰，如户似门。第二联描述过去建的《崖口有作》碑，高高地立在山坡，去年新建的兴安大岭神祠围绕在红墙中。三、四联写景：崖口中的岚光秋日，林景晓霞

① 崖口：即今日的庙宫水库一带。崖：山边。
② 壬申：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
③ 峰如户牖：牖音 yǒu 友，窗户。
④ 瞻崇坂：瞻音 zhān 沾：往前、或往上看。崇：高。坂：山坡，斜坡。
⑤ 浮梁接：浮：飘浮。梁：桥。搭在河上的桥梁。

是那样的绚丽多彩,飘荡翻滚。过了搭在伊逊河上的浮桥,千骑展开甸猎:马驰箭发,鹰飞雉翻……。用语精炼,描绘出一幅崖口秋猎图。



怪异的围场地名

张学军

我县一些地名与其它地方比，独特性非常明显。一些地名从字面上很难理解。外来的游客感到很新奇，但询问又大多得不到准确的答复。有的导游为了应付游客而胡编乱扯，不着边际。如有人对头板、二板、三板地名的解释为：康熙皇帝木兰秋狝时，在此地山顶锯木板，从山顶向下轱辘(滚)木头板，轱辘下第一块的地方叫头板，轱辘下第二块的地方叫二板，轱辘下第三块的地方叫三板。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也有好事者把围场怪异的地名如将"哈里哈、莫里莫、对亭沟、台子水、八十三号"编成了丑化性的顺口溜等等。很多围场人也怕别人提起这些怪异的地名，似乎这是蛮荒落后的标志，是丢人现眼的事情。实际上围场怪异的地名既是汉、满、蒙文化融合交流的产物，也是木兰围场的历史见证，还是当前我们开发旅游产业、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大可不必自以为耻，妄自菲薄。而恰恰应该加以研究，并把成果广泛

宣传，以增进民族特色，增强围场旅游的吸引力。

围场的地名溯本求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因木兰围场驻军和清帝秋狝木兰时的驻跸地而得名。

我县历史上是著名的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自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设立至道光(公元1820年)礼废，期间140年，在围场举行秋狝大典88次。清帝来围狩猎数百次。木兰围场内设78个小围场，围场四周均有八旗兵驻守。后来，这些驻军的建制名称就成了地名。如蓝旗卡伦、营房、新拨、旧拨、小拨等都是因为守护木兰围场的八旗驻军而得名的。当时守护木兰围场的军队分为八旗。据《八旗通志》载：八旗驻防均有固定方位。镶黄、正黄在北方，正白、镶白在东方，正红、镶红在西方，正蓝、镶蓝在南方。驻守木兰围场的八旗兵也是根据这个规定驻防的。以北部镶黄、正黄为中心，按两翼延伸形成闭合圈分布，即左翼为镶黄(三义永)、正白(新地)、镶白(隆化县西阿超乡)、正蓝(隆化县大坝乡石片)四个旗，右翼为正黄(多伦县大河口乡)、正红(多伦县大河口乡)镶红(南山咀)、镶蓝(隆化县碱房乡)。按照清朝的建制，各旗驻地称为营房，每个营房驻军200人左右，是木兰围场驻军最大的军事单位。

新地乡营房村就是正白旗驻军所在地。嘉庆三年,这里因兵多家属多,营房不够用。一部分官兵和家属从营房迁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新地。每个营房各辖5个卡伦,卡伦是满语“哨所”之意,共有40个,每个卡伦都有固定名称,大都设在重要路口,驻守兵丁,分管一段围场边界,蓝旗卡伦乡境内有正蓝旗木垒喀喇沁卡伦(木垒喀喇沁:蒙古语,河名),人们简称蓝旗卡伦。营房下设有固定的巡逻队—“拨”。“拨”是满语“拨什库”的第一个音节,汉语“领催”的意思,是驻扎围场的军事建制,被简称“小拨”。

清帝秋狝木兰时的驻跸地、活动场所、走过道路等,经口口相传,久而久之,成为地名。据史料记载,清帝分东西两条线路进围狩猎。御道口是建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这里设有阿鲁布拉克围(阿鲁布拉克:蒙古语,山阴的水泉),崆郭罗鄂博围(崆郭罗鄂博:蒙古语,危险的石堆)。康熙来此行围狩猎,走过的御道。此道位于小滦河河口处,故称御道河口,简称御道口。城子乡的太后梁名字是因太后驻跸过而得。孝庄太皇太后或康熙、乾隆的母亲曾在此山梁路过,此山梁即称为太后梁。

二、由满语或蒙古语命名的围场转音而来。

木兰围场内的70余小围场都是木兰秋狝时确立的,此前有些是蒙古人游牧时的名字,有的是建围时根据山川形胜和动植物特点分别用蒙古语或满语予以命名。木兰围场开围之后,汉人大量涌入,起初还用原地名,后来由于蒙古语或满语音节很长,汉人使用不便,就逐渐简化和转音,变成了现在的名字。塞罕坝这个地名来源于赛堪达巴罕(赛堪达巴罕:蒙古语;赛堪:是沙或美好;达巴罕:高岭)。塞罕达巴罕,命名是根据当地地势特点而确定的,它们两者之间就是互为因果关系。塞罕坝是蒙语和汉语结合物,取蒙语"塞罕",加上汉语"坝",构成现在的名字。燕格柏乡的名字是由"永安湃"以音译而来。据乾隆《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记载:"……西伊玛图口内,首围为永安湃,围场内地多用蒙古名,惟此处则国语,永安为沙,湃渭地。均皇祖所赐名,而以汉字书永安,亦协猎场吉语也。"新拨乡的月亮湾子也是这样演变而来的。因该地位于岳乐围场,故得名岳乐湾,后取谐音为月亮湾子。在前文中提到的头板、二板、三板,也是转音。康熙二十年在这里设置了固尔班固尔班围(蒙古语,三条山脊)。该围由三道同

为东西走向，海拔高度相同，长度接近的山沟组成，人们把它们分别称为头道固尔班、二道固尔班、三道固尔班。后来，写成汉字头道轱辘板、二道轱辘板、三道轱辘板，简称头板、二板、三板。哈里哈曾是七十余围之一，原名叫哈达图扎布（蒙古语，山峰嶙峋的沟谷），后来人们就叫成了哈里哈。新拨乡白云皋村是从巴颜郭围场转音而来，岱尹梁是达颜德尔吉围场所在地。岱尹梁原为达颜达巴罕，达颜先为大衍，又论为大尹，后定名岱尹。

三、以开围时招垦放地排序号为名。

木兰围场自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设立以来，随着清王朝从兴旺走向衰落，木兰围场也进入了末世。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前任顺天府尹蒋琦龄上奏《进中兴十二策》提出让闲散旗民开垦木兰围场。同治二年始开垦围场，以解决驻军兵饷。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清廷决定全面放垦围场“开垦围场各地藉筹军饷，实为寓兵于民之善策。著派袁世凯认真督办，所有该处地方事务并归该督专辖，以一事权。”袁世凯全权委派已革广西太平思顺道道台何昭然前往设“专垦木植局”，并总理其事。民国五年（公元 1916 年）木兰围场放垦结束。

放垦开围时，这里人烟稀少，很多山川没有名

字。为了工作方便,放垦官员以某地为起点,按一定土地面积为单位,按序排号,召垦放地。后来一些序号就成了地名。所以围场地名最多是“XX号”。如通往坝上的哈里哈川,以五顷四(540 亩)为一号,从小锥子山土城子(今龙头山桥)排起一直排到八十三号。其中哈里哈乡所在地称为六十二号,哈里哈村所在地称为六十三号,最里边的村称为八十三号。上坝的另一条路大唤起川从沟门为头号编排,以 540 亩为一号,依次排到沟里,乡所在地排为二十七号,故地名为二十七号,四十二号村所在地为四十二号,五十六号村所在地为五十六号。而大唤起这个名字是缘于更大范围的排号而起的。这套排号系统是以龙头山乡的大头山为起点,以 540 亩 为一号,山的阳面川即现在的道坝子川,以“大”字编为“大字 X 号”。山的阴面川便是大唤起川,秋狝时叫“安巴纠和洛”满蒙语,意大狍子沟。为了避免重复,便起“大字还起 X 号”的顺序号数。如乡所在地的二十七号村,全称应为“大字还起二十七号。整个川就称为“大字还起川”。后来演变成“大唤起”。一条沟川是这样形成现在的地名的,那么一条大沟里边还有支岔,这些支岔又怎样起名呢?它们就从支岔沟口另排号。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大沟大川里边同一个号有

几处情况。为了加以区别，就在号数前边加上“字”或小地名，就又形成了围场地名中各种各样的“字”很多的状况，如“金字”、“车字”、“罗字”等等。

一条沟川内部排号起名是这样，更大范围的沟川怎样起名呢？这还要介绍一下放垦地的情况。何道台奉旨放地，开始时，还是按部就班，一条沟一条沟一块地一块地地往下放，清王朝处于内患外侮、风雨飘摇之中，军队又急需银子，就出现了整川整川地放垦情况。甚至个别发生了“跑马占圈的奇观，即买主向木植局交一定数量的银子后，自己骑马跑一圈，圈内土地、森林即为自己所有。为了加快召垦速度，就需要更大范围的排号，于是就出现了“XX 川”的名字。如原朝阳湾区一带，是以大素汰梁为根，以羊草沟为起点，排为五道大川、二道小川。羊草沟为头道川，郭家湾为二道川，朝阳湾为半截子川，育太和为三道川，广发永为四道川，六家为夹皮川，棋盘山北部为五道川。

四、以召垦开围时最早开拓者的姓氏、产业或典故命名。

张家湾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这年家居阴河北岸的张万苍迁到南岸的山湾处挂

地立庄，占据大量土地，颇有名气，故以其姓取村名张家湾。郭家湾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1年)，这年山东人郭氏迁此挂地立庄，选居住地在山湾地段，故称郭家湾。育太和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开放围荒时，任氏等人来此开烧锅一处，起商号为“裕泰和”，后把“裕泰”二字写为“育太”，建村时，以厂名取村名为育太和。广发永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有玉田人肖氏最早来此经营百货店，起商号名为“广发永”，后以店名起村名为广发永。朝阳地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属木兰围场边外。这年河北省香河县张氏、田氏、李氏迁来垦荒定居。因此地有一庙，庙门题记曰：“朝阳地”而得名。老窝铺曾设过围场。中华民国时期，王久福从山东逃荒到此地占地立庄，因见有驻兵留下的两间窝铺，故称老窝铺。碾子沟则因石碾子而得名。石桌子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围场开放边荒时，这里曾是废村遗址，什么人曾在此居住不得而知。开围的人们在此遗址内挖掘出一个高1尺、阔3尺见方、刻有文字的石头桌子。因此为奇事，便传为村名。牌楼一名来源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人们在挖掘“孟奎之墓”时，发现墓中有一百余斤的小石楼，形状似牌楼，

后来人们便习惯地称此地为牌楼。黄土坎是移植来的名。清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住在隆化县黄土坎村的周永茂一家迁居此地,挂地开荒。为纪念对故乡的离情,就把故乡的名字“黄土坎”带到此地,该村由此得名黄土坎。

围场地名杂而怪的历史已经结束了,现在全县已经全面推广了地名标准化,一大批经过标准化处理,群众喜欢的新地名已经使用并必将流传下去造福子孙后代。同时,我们对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反映历史典故的地名也应该认真加以挖掘、保护,使之为我县的小康建设服务。

参阅文献:

《围场县地名资料汇编》
《漫话木兰围场》
《钦定热河志》
《蒙古游牧记》
《满洲国各县事情》
《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朝规制》
《八旗通志》
《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

清代塞程见闻录

陈洣辛

清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自顺治始至嘉庆五代四位帝王常巡狩塞外。清代除木兰秋狝外，从京师北去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昭苏乃木城)有路两条：一是经延庆、赤城出独石口；一是出古北口经木兰围场。顺治八年(1651)四月帝福临出独石口巡幸上都地方，回銮时经库尔齐勒(蒙语，意潺流河，今小滦河)河入古北口，单程往返走了这两条路。康熙三十年(1691)帝玄烨统一北疆后，于五月七溪会阅(后称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王公、民众，往返途经古北口、木兰围场的库尔齐勒这条路。

当年清帝出外巡狩没有专职行军“记者”，偶有伴驾的“随銮纪恩”和庶吉士(秘书)官员的“杂记”。今按山阴人余采《塞程别纪》和《清鉴》等资料辑录本文奉献给读者，以便了解当年木兰围场及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于今定有裨益！

塞　程

从京师出东直门，经牛栏山、密云、石匣、腰亭至古北口约二百三十八里。出古北口，经钓鱼台、十八盘、鞍匠（今滦平镇）、小兴州（大屯）、大兴州（金沟屯）、波罗诺至土城（今丰宁县凤山镇）约一百四十六里。从土城东北行经大官营，越百花山、青岭至郭家屯（今隆化境）约一百零五里。出郭家屯逆库尔齐勒河北行，经罗北营、三道营、崆峒山（今窟窿山）、半边山（今半壁山），进入木兰围场的大伯颜沟（今官地）约七十里，复北行三十里至转水河山（今南山嘴），又三十里至红门山口（哈玛尔昂阿，今甘沟口），又四十里至夹河沟（今老窝铺），再三十里至玛尼图（今磨盘山，转西行三十里至甲达河（今多伦县前九号西红旗营房近滦河处），再西行四十五里至诺尔（多伦），西北行经后店子（今长虫坝）至上都四十五里。北京至元上都全程约七百七十九里。

〔从玛尼图（磨盘山）经后滩（御道口境）苏家大山行三十里至沙坑（多伦县大河口境），行四十五里至澄口，又四十五里至白城子（多伦北），再四十五里至元上都。北路无山少沙，而水草丰美，较南路更为方便。〕

路途见闻

“大兴州是元代故州，城基犹存，今有大庄户三家以耕牧为业，丁壮百余人，又有山东流民三四家。大兴州山产榛、栗等干果。城北里许山麓有‘元丞相帖木尔记功碑’俗传李陵碑。潮河之西黑山下的龙潭沟闻说有苏武庙。滦河之东有山如塔。大兴州北行七里至两间房有耕牧数家，其地林木茂盛，溪水流之有声，下马搬石于溪旁落坐，脱鞋洗足。抬头见隔岸山麓树丛中有天鹅禽鹳之类数百只，飞起复又落地，嘎叫不止，重唱如歌。”

“郭家屯者，前代必有人于此屯田（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初对前北平州县弃官避靖难官员二百一十九人免死罪屯戍兴州入粟纳粮者，当有此地。——笔者注），而当时土著人郭为大姓，故因之得名。此地南去古北口，东去喜逢口，西去独石口，北去蒙古，各数百里，此为岔路要冲，不宜轻视置之膜外，今虽有数十人家住此耕牧，不能尽地之利，且人孤势轻，应谪戍凡有罪该赎者万人于此屯田畜牧，方有益于国防建设。滦河从西来郭家屯，宽一二十丈，深没马腹，产鱼最美，名：滦鲫。”

“三道营有篱笆院落五六家，自古北口至此处凡有蓠落草屋，周围皆竖以木或用荆针为栅，高出茅舍，种藤蔓植物爬于蓠上枝叶繁茂侧挂，风摇烟

雨中，在周围的青山衬托下婉如一幅得意的山水画。因之联想，古人落笔处自成一家，必有所见，非臆想之作！”

“大伯（巴）颜沟（今围场官地村蒙语，富饶意）。其山草木颇茂盛，多野兽，蒙古人靠畜牧打野牲为生。又北行三十里至转水河（今南山嘴）山多松树，无人烟。再北三十里红门山口，蒙古名哈玛尔昂阿，山多松树多，无人烟。至此山渐低，闻言从喜逢口至此处，诸山之松皆合抱。本朝众人为获利而采伐，水运至滦河编筏，从喜逢口入关，所弃松树稍尚长十数丈，横山堆积，野火燃烧后成长炭，废弃山野，令人感叹不已！劫后余生之松山上虽多，但乏栋梁之材。”

《塞程别纪》所描述的这些自然环境，具体时间不详。大体上应在道光或咸丰年间。

驿路台站及渡沙之法

自独石口外始专设官员置驿站传递信函和后勤供应等事，名曰：台站。站间距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不等，依水草之便。先前，大兵运粮车马出入沙丘、沙地行进十分艰难。实践中官兵总结了伐柳覆沙之法，即伐割沙柳颠倒捆束，依次排列铺路，柳上再覆盖一层薄沙，不仅驰辁省力、方便，而且加快了行进速度。当銮舆凯旋之日，再加以新

柳,上再覆以沙,柳稍部枝叶略露两端,葱郁平软如绿地沙茵。此法是古代帝王出行警跸平整道路所未曾有过的。

运粮营寨

行军时粮秣的集散地多在三岔路口设置,营寨由文武官员管理,编柳为门户,车驼夹道排列俨然如城市,白天树立旗幡,夜间则鸣放枪炮,婉如年夜的爆竹声,并按时击梆鸣锣。商人随营贸易者,曰:小市(俗称买卖街)。

参阅资料:

《清鉴》

《塞程别纪》

《清实录》



燕山北长城线路南移原因及影响

谢井泉　王福兴

战国时代的燕国在打退东胡之后，为了保护北方的五郡，防止东胡南下，修建了一条“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到襄平(今辽阳)”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后来又延长至朝鲜平壤附近。秦统一后，仍在燕长城部分线路上修筑长城。西汉建立后，也继续沿用秦部分长城线路。据专家考证，西汉的北长城线路是这样的：从河北独石口出来，东经围场、内蒙赤峰、辽宁建平北部、再经敖汉、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与铁岭一带越过辽河向东经清源、新宾、桓仁、宽甸过鸭绿江东抵朝鲜平壤附近。从西汉北部长城的走向看，今河北北部、赤峰南部、辽西北部本属于塞内，即分别属于渔阳(今北京密云境)郡、右北平(今河北平泉)郡和辽西郡(治所今河北卢龙、抚宁间)的中北部一带。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北征乌桓“引军出卢龙塞(即东汉长城要塞，在今河北迁安县)塞外道绝不通”。又据《三国志·田

畴传》:曹操打败乌桓后,从东路返回,“军还入塞,论功行封”。这说明东汉时今河北北部、赤峰南部、辽西北部已变成了塞外,也就是说,东汉没有沿用位于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西汉长城线路,而是把它向南移动了500多里,和现存的明长城几乎接近。那么东汉为什么要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燕秦、西汉长城线路南移呢?笔者试作一些探讨。

一、原因

东汉之所以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西汉长城线路南移,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乌桓、匈奴南侵,进入塞内,使原长城失去了作用。乌桓原本居住在西汉长城的北面很远的地方,汉武帝派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后,“因徙乌桓于上谷(今河北怀来)、渔阳(今北京密云境)、右北平(今河北平泉)、辽西、辽东(今辽阳)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后汉书·乌桓传》),西汉末期,王莽篡位,他“欲击匈奴,派严尤领乌桓、丁零兵屯代郡(今河北蔚县),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服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后汉书·乌桓传》)。从此中央王朝与乌桓的关系开始恶化,乌桓人便经常南下侵掠。在乌

桓不断南下侵掠的同时，北方的匈奴族也时常南下“寇抄”。王莽篡位后，实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他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并发三十万大军击匈奴。这使得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也恶化了，于是匈奴人频繁“入塞寇盗”，严重破坏了边境的郡县，使边境人口急剧减少，正如《汉书·匈奴传》记载的那样：“及莽扰乱，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王莽统治后期，国内暴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起义军经过几年奋战，最终推翻了王莽建立的“新朝”。王莽政权灭亡后，乌桓和匈奴失去控制，他们加紧南侵，占领了北部边境大片领土，一些县已名存实亡。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乌桓与匈奴仍“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

第二，东汉政权建立后，无力对匈奴、乌桓进行反击，只好采取守势，把原长城线路南移。因当时，“方平诸夏，未遑外事”（《后汉书·南匈奴传》），即忙于消灭危害其政权存在的地方割据势力，未来得及考虑北部边境情况。又加之东汉政权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其经济、军事实力远不能与西汉武帝时相比。所以在反击外侵上显得无力，只好采取守势，他把边境的一些县放弃，并把那里的人口大量向内地迁移，只保留辽

西郡的临渝县今山海关一带。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发边卒”，在原长城南部再“筑亭障，修烽燧(《后汉书·光武帝纪》)”，以防止匈奴、乌桓进一步南侵，保护北部安全。这样位于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西汉长城线路就南移了。

二、影响

(一)对后世修筑东北长城的影响

我国古代修筑长城有一个惯例，即后一个朝代大致在前一个朝代的长城线路上修筑长城，如秦国沿用赵燕长城，西汉沿用秦部分长城，而放弃了从围场至黑龙江的大段长城，往南移了500里。由于特殊原因，东汉没有完全沿用西汉长城，尤其是把今辽西北部的西汉长城又向南移了500多里。东汉把这一段长城线路南移后，三国时曹魏仍继续沿用。西晋建立后，也大致沿用这一线路。《晋书·唐彬传》说：晋“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今甘肃境)于碣石”(这里记载有误，西晋修复的是东汉南迁后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北齐建立后，又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据《北史·齐显祖》：“六年……发民150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河北东光境——编者注)至恒州(今山西大同后迁沂州——编者注)九百余里，七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渤海)。从上可以看出，北齐没有

完全沿用西晋长城线路。北周代北齐后，也曾修筑长城，“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周书·于翼传》)，这里的“改旧”二字充分说明北周也是沿用前朝长城线路修筑的。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一开始就“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隋书·长孙晟传》)。据李文信先生考证，隋在幽蓟一带修筑长城的线路为：西至北京市延庆县，东至今山海关附近(见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二期)，这正是北周的长城线路。自此以后，再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只有明朝，明东北长城线路是这样的：沿燕山山脉到山海关，然后折向东北，一直到鸭绿江边的宽甸县虎山南麓。这一线路与东汉的东北长城线路大致接近，只是要比东汉的东北长城短得多。

从上可以看出：东汉以后各朝代虽曾大规模修筑长城，但都未越过东汉南迁后的长城线路，这固然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受东汉南移长城线路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使后人遗忘了位于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燕秦和西汉长城，人们误以为东汉南迁后的长城就是燕秦和西汉长城。

东汉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长城线路南移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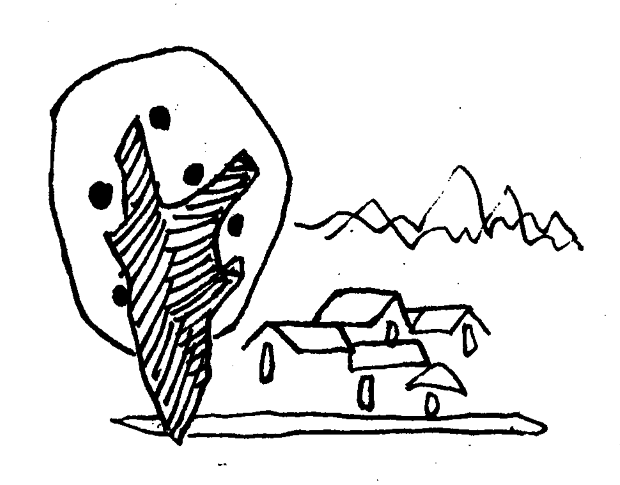
离很大,以后各朝代又相继沿用这一长城线路,这样就使得原位于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燕秦和西汉长城废弃了,也被后人遗忘了,后人误以为东汉以来沿燕山山脉修筑的长城就是原燕秦和西汉长城。据笔者所查,最早把东汉以来沿燕山山脉修筑的长城当做秦长城的是唐朝房玄龄,他撰的《晋书》在记载晋修长城之事时说:“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今甘肃境)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在这里房玄龄就把东汉南迁后的长城当做秦长城。另一位唐朝人李百药在他撰的《北齐书》里也曾说北齐“七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显然,在这里李百药也把北齐修筑的东汉南迁后的长城当做了秦长城。可见,由于东汉南迁长城线路,以后的朝代又大致沿用,这样就使得人们就把位于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燕秦和西汉长城遗忘了,以致于后来人们在建姜女庙时没有把它建在秦长城线路上,而是建在了东汉以来修筑的长城线路上,当时人们误以为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就是秦长城。二千年后,清帝高宗于乾隆六年(1741)木兰秋狝时发现木兰围场地方有绵延数百里的一条古长城,经过切身数年考证,认为史料记载有误,这条自黑龙江至新疆二万余里的长城才是秦长城。其便于乾隆十七年

(1752)秋九月在木兰围场古长城侧竖《古长城说》碑,记述其事。而西汉长城围场东至赤峰段仅有古城地遗址,尚未发现长城痕迹,有待史学界进一步考证。

(三)形成了今天河北北部及西北部的塞内塞外地区格局,燕秦与西汉时,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都处于长城内侧即都属于塞内。前面引《汉书》中的"夷水东入塞外","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等,这里的"塞外"皆指燕秦长城南,而西汉长城的北部,而不是指今明长城的北部。可是自西汉与东汉把今河北北部、辽西北部的长城线路两次南移后,这一带便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变成了塞外地区。由于后来的各朝代又大致沿用东汉长城线路,这样就使自东汉以来在河北北部、辽西北部形成的塞内塞外的地理格局一直沿续下来。隋唐时,虽然其直接统治的地域已超过了东汉的长城,但人们仍称河北北部、辽西北部为塞外地区,在今唐诗里可以看出来,如:"塞北胡霜下,营州(今朝阳)索兵救"(崔国辅《从军行》,"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高适《塞上》)。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防止蒙古和女真南下,重新修筑了北方长城,明长城的修筑把东汉以来河北北部、辽西北部形成的塞内塞外地理格局进一步固定化了,直至

今天，人们仍习惯称河北北部、辽西北部为塞外地区。

注：作者谢井泉辽宁朝阳市党校教员。



兴华寺

彭立平

兴华寺(也称大阁)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东北一公里处,是我县仅存的一处清末群体建筑,也是我县最大的寺庙建筑,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华寺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完工。是大户人家及百姓集资兴建的。兴华寺虽然是民间所建,但其建筑形式具有明显的清代建筑特点,建筑布局十分合理,寺内的两座石亭(钟、鼓楼),更是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全部采用石条砌制而成,这样的建筑,在其它地方,非常少见,具有很强的地方及民族特色,充分体现了建筑设计者的聪明与智慧。

据我县文物部门多次调查、考证,兴华寺有6座殿宇在同一中轴线上,均为座北朝南,从南至北依次为:山门殿,娘娘殿,八仙殿,关老爷殿,大阁,圣人殿,在大阁两侧建有钟、鼓楼各一座,在圣人殿前东西两侧各建配殿一座,各殿的建筑均为砖、

木、石结构，正脊、垂脊饰有瑞兽，屋面为布瓦封顶，前廊后厦，斗拱均在此得以体现，全部建筑古朴大方，科学严谨。是我们研究清代建筑形式及特点的可靠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各殿内供奉的佛像亦是另有特点。佛教、道教、儒教的文化内涵均有展现，这充分体现了民间建筑寺庙的特点以及它的不统一性，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的民族宗教信仰以及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东石亭镌刻的对联：上联“分功亭亭判贤惠二人开窍”，下联“超仙院院判善恶恶士回头，”横批，“判清善恶”。这显然是提醒人们要弃恶扬善，对于后人永远是一个启迪，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兴华寺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称之为大阁，这也不算为错，这是因为寺院内主建筑为大阁，故而当地人称之为大阁，后经文物部门调查发现，在山门殿大门上方的门额处阳刻有兴华寺字样，因此确定，兴华寺才是该寺的正式名称，大阁只是全部建筑中的一个单体建筑。

在六十年代初期，这处价值很高的建筑群未能逃脱人为的毁坏，大阁殿，关老爷殿，东配殿被全部拆毁，其它各殿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殿内的佛像全部被毁。院内杂草丛生，殿宇因漏雨而岌岌可危，很多年内，留给人们的只有遗憾……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县文物部门为了使这处清末建筑群体得到保护和利用，多次对兴华寺的历史、建筑形式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古调查及研究工作，将兴华寺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事在必行，经过申报工作，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兴华寺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自2000年以来，县文物部门先后争取资金40余万元，对兴华寺进行了修复工程，并按佛教寺庙的一般规律，调整了各殿所供奉的佛像，使兴华寺部分恢复了昔日的风貌。



围场潘家店村发现岩画

彭立平

潘家店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蓝旗卡伦乡东南约25公里处。这里为七老图山系，最高海拔1064米，山高谷深，森林茂密，溪水潺潺……。岩画最初是由潘家店村的农民在山中放牧时发现的，围场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得知后，组织人员对岩画进行了详细调查。

岩画集中在一个青石崖侧面，崖面下半部有断裂和人为毁坏之痕迹，岩画处也不十分平整，且有裂缝。岩画由人面像和其它图形两部分组成，为一群体岩画，画面高1.2米，宽1.4米。从岩画遗留的痕迹看，应是采用了磨刻的技法，即是用金属和其它坚硬的钝器在岩石上磨刻而成。磨刻的线条有的较粗，有的相对较浅，但图形清楚，画面给人以朴拙、粗犷之感。

一、人物头像。潘家店岩画的人头像共有9个，画像大小不一，深浅不同，形态各异，无一定之规。(一)圆脸，仅具头廓，磨刻较浅。(二)无头

廓，浓眉，小眼，鼻较大，磨刻较深。（三）扁圆脸，大眼睛，无眉无嘴，磨刻较深。（四）圆三角脸，尖下颏，小眼睛，无眉，磨刻较浅。（五）无头廓，仅具双眼且较大，无眉磨刻较浅。（六）无头廓，仅是双目，单眉，小嘴，磨刻较深。（七）圆脸，双目及嘴均较小，无眉，无鼻，磨刻较浅。（八）三角脸，双目较大且圆睁，双目之上为一横线，表示双眉，大嘴，磨刻较深。（九）有头廓，无嘴，无鼻，仅具双目且较大，磨刻较浅。

这些人物画像以人的面部为主要特征，且均属正面像，完整的人物或侧面像未见。每幅人面都有眼睛，这是潘家店岩画的共同点，但是头廓之内又有明显的不同，有的有嘴无眉，有的无眉无嘴，均不完整，各有省略。

二、其它图案。在潘家店岩画中，除了人物头像外，另有其它图形，图案磨刻较为清晰，特点突出，有的图案很可能表现的是某种动物，这似乎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与放牧有关。有的图案很象是一个文字，但又没有准确可靠的资料加以证实，故推断，如果是代表某一个文字，那它应该是岩画的题铭。图案则明显是不同的标记符号，其确切含意尚无法理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岩画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

右旗等地早有发现,特别是人面岩画在西辽河地区广有分布,除英金河流域以外,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的查干伦河、白岔河、苇塘河等地数量也十分可观。这次围场潘家店发现的岩画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岩画的人物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表现形式上又有所不同。赤峰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在头部多有头发和发式装饰,有的还磨刻有耳朵,这些特征在潘家店的人面像岩画中均不存在。相比之下,潘家店岩画对人面像的描绘较为简单原始。围场潘家店与内蒙古赤峰地区毗邻,同属七老图山脉,两地岩画应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绘画来源于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具体反映。围场境内山川纵横,森林茂密,伊逊河、锡尔哈、乌拉岱、阴河、伊玛吐河、小滦河、吐鲁根等七条河流流经全境,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条件。近年来,通过文物普查工作,全县共发现古代文化遗址300余处,上至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下至清代,且文化内涵较为丰富,说明远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文化。潘家店岩画应是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生活的具体反映,对于岩画的时代和族属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单凭岩画本身对其进行准确

的断代是有困难的，要使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还需对其周围环境和古代文化遗迹进行深入的探求。

岩画是人类最早的造型艺术之一，潘家店岩画的发现，在围场乃至河北省尚属首次，它不但丰富了人类艺术宝库的内容，也为我们在调查岩画的分布范围以及研究人类原始经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意识形态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金龙潭鼋神庙

张桂如

从围场湖泗汰大桥北侧向东，沿湖泗汰河上溯5000米便是围场六大旅游景区之一的围场镇金龙潭旅游风景区。

据说，民国年间，那时称作元宝山镇，也就是现在的围场镇，只有一家开浴池的人们称谓他李掌柜。一天，浴池外来了一个卖金鱼的人，李掌柜看小金鱼活蹦乱跳，闪着鼓鼓的圆眼睛好不喜欢。不由的心中动了一个买鱼放生的念头，便对卖鱼人说："你这鱼我全买了，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把这担鱼给送到河东凤凰岭下的湖泗汰(清代称呼鲁苏台，蒙语，意有芦苇处——编者注)山泉，卖鱼人说："好好好，我送到地方就是了。"鱼人按着李掌柜的吩咐把两盆鱼倒在湖泗汰的泉子里。当把金鱼撒到泉子后水里立即打起漩涡，摇头摆尾，沉入水底。说也奇怪，第二天这泉子就变成了湖泊。湖泊的水蓝澄澄的，游动的大小金鱼非常好看，人们就把这个湖泊起名叫"金龙潭"。冬天寒风一来，金龙潭湖面结成水晶般的厚冰。透过冰层往

下看，冰花绚丽多彩，使人眼花缭乱。有时又会看到叠翠的松林图案。这些奇异的景色，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前往赏游。

金龙潭有个搬家之说，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围场伪日本副县长松木太郎唆使他的爪牙用绳子坠石头试探金龙潭水的深度，几次探测终不见底，于是他想用炸药来炸毁金龙潭。金龙不甘欺凌，坐等灾祸降临。腊月的一天夜里，忽听从湖泗汰方向传来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紧接着灯笼火把，旗帜招展，一片呐喊，穿着各色服装的一队队人马扶老携幼从金龙潭起程出湖泗汰沟沿伊逊河顺流而下。金龙潭搬家了，有的老百姓说："连金龙潭里的金鱼也不愿作亡国奴"。从此以后，金龙潭干枯，变为一片沙滩，唯有一股泉水流入伊逊河中。

围场镇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使金龙潭又恢复了昔日的容颜，并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整修后的金龙潭面积 2380 平方米，水深 7 米，湖周围用砖石砌起围墙，"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湖上游有清冽的泉水涓涓不断注入湖中。湖下游，有渠道和瀑布泻下，形成湖泗汰河的源头。湖中有成群的金鱼游来荡去.人们都说"金龙潭又回归故里了"。

金龙潭搬家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完全可以这样说，鼋神庙是由于有了金龙潭以后才扩建的。据说，在围场开围之初湖泗汰沟内便有一个小庙，小庙只供一位神仙名唤鼋神。中华民国初年，有一位游方道士骑驴来到这里，化缘募捐修成大庙并增加了其它水族神像，后来商会会长万永和及绅商娄中一、杨秀峰带头募捐，进一步扩建完善。可惜原庙毁于"文革"期间。

新千年伊始，为恢复开发"鼋神庙"这一历史文化景观，促进旅游业发展，围场镇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纷纷慷慨解囊，其中祁尚庶一人便捐资十万元。鼋神庙按国家二级神庙标准规划设计施工，于2001年8月1日奠基，总投资100万元，历时百日告竣。经北京白云观田理合道长等前来开光后，开始对外开放。整个庙宇建筑古色古香，彩画凝重绚丽，塑像形神兼备，红砖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群山环抱，绿水相邻。飞檐斗拱，清新脱俗，堪称旅游观光之胜地。

鼋神庙的建筑在围场的六大旅游风景区中，是别具一格的。这是一座道教寺庙，又是一座水族神殿，殿内供奉的神仙皆为水中之神。整个庙宇分为前殿和正殿两部分，前殿右边供的是鱼将军和游龙。左面是蛤蜊大将军，他和鱼将军分别

称为门卫和门丞。职责和门神一样，保卫着雹神等诸位神仙的安全。正殿中间供奉的是雹神，是这座庙宇的主神，雹神左手第一位是东海龙王。第二位是小白龙，他脚下踩的是蟾蜍。雹神右手第一位是塞北灵验佛，即金蟾老祖。这位神仙的原址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大岭的庙内，传说在康熙皇帝率满蒙大军到木兰围场进行狩猎时，来到一个泡子前，下起了大雨，康熙帝的人马四蹄狂刨，就是不肯前进，一位兵士说："皇帝，雨停下来再走吧"，康熙帝不听，说下红雨也要走，说完天上就下起了红雨，前往泡子一看，一个萝筐大的蛤蟆正注视康熙帝。谋士立即对康熙皇帝耳语："它是向您讨封号呢。"康熙皇帝说："立即雨停，朕封你为塞北灵验佛，"果然，雨过天晴，艳阳高照，一只三足金蟾现身谢恩离去。后来在当地修了一座塞罕庙，庙里供奉一佛，手里托着一个三足金蟾。这就是塞北灵验佛的由来，在建好雹神庙之后，从坝上将这位神仙请到此处。雹神右侧第二位是青龙神，青龙神和白龙神轮流执掌本地水族之事。

雹神庙建设者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要营造一种氛围，宏扬一种精神，千年底蕴，历史苍桑，万缕思绪，一柱高香。走入雹神庙就如同跨进了时间

隧道，沟通了历史与现实，沟通了“神”与人。每个人都感觉到在这里可以顿悟仙机，只要你来这里体验一下，保证会有新体会，新的感受。

自从鼋神庙重建以来，一时间凤凰岭下金龙潭边便热闹起来。重要的庙会有20多个，如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二月十五的三清节，四月二十八的民俗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初一的安腊节等，每逢庙会，车水马龙，来这里观光的，看热闹的，络绎不绝。借庙会，人们追忆着历史，思索着未来，展望着明天。

由于金龙潭鼋神庙名声远播，在2004年石家庄市政协委员、石家庄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丫髻山紫霄宫主持李崇德道长不远千里来到鼋神庙传道布教，大开山门招收信徒，更使鼋神庙增加了光彩。

金龙潭旅游风景区一期工程还有月牙广场和步云桥正在建设中。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县城最好的消闲旅游去处，正可谓是：紫气东来湖泗�,凤凰岭下凤还巢。

刚直不阿　万古留芳

——忆女红军蹇先任在围场

王振兴

黄代芳是1946年5月分配到围场的一位女县委副书记。来时年轻的称她黄大姐，小字辈的称她黄副政委或叫黄老太太，其实她当年只有三十五岁。她虽在围场仅工作了8个月，但她办事果断，平易近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对干部既严格又爱护，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当时都不知道她的身世，直到1946年底，她调任四海县县委书记后，才逐步了解到她原来是一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女红军。

红军女战士

黄代芳的原名蹇先任，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1926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加入共青团。

1927年在长沙参加学生运动，转入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在长沙、津市和石门做地下工作。1929年参加湘鄂西工农红军。这是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正准备长征。11月6日她生下了与贺龙结婚后的女儿贺捷生。由于形势严峻，中央规定长征一律不准带小孩。贺龙已经找到一家，说好把女儿寄养他家，可是后来再找该家已搬走。经军团常委研究批准他们带女儿长征。就这样蹇先任带着出生不到半月的女儿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她吃不上粮食，没有奶水，过草地时，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靠吃皮带野草。她也只好把草捣烂煮熟喂孩子。当时她的信念就是母女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到延安后，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女儿一岁多了还不能走路。多亏林伯渠老人想方设法买了一只羊腿，每天给孩子煮一点吃，才逐步好转。蹇先任先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1945年11月分配到热河，任冀热辽军区保卫科长，1946年1月，国民党军在古北口、平泉向热河进攻，我军大批伤员到承德治疗，但医疗和生活管理很差，许多伤员没有被子，没有棉衣。有些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被尿鳖死，对此她很生气。她要求到后勤部工作，去找后勤部长，部长正在打麻将，

不理她。她火了说:“是你们打麻将重要,还是抢救伤员重要。”部长冷冷地说:“这事用不着你管。”这下她更火了,说:“他们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阶级弟兄,我就得管。”这下部长不说啥了,马上派人下去解决问题。她跟着一起抬伤员 ,发被子和棉衣,组织医生治疗,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医疗条件很快有了改观,伤员对她很好,有事也愿意找她。

管好生活也很重要

1946 年 5 月,她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省委分配她到围场任县委副书记。到任后看到政治处的伙食搞的不好,大家有意见。管理人员却认为伙食好坏无关大局,供给标准低没法搞好。她找到总务秘书陈丛林,给他讲管好伙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搞不好会影响大家情绪。然后帮助他们研究办法。要把米碾细点,做饭把沙子淘净,还可以把米轧成面,做成各种干粮,或调剂些莜麦面、荞麦面吃。不要总吃咸菜,可以搞点葱蘸酱或炒葱,这些都多花不了多少钱。抓了几天以后伙食很快好起来,大家都很高兴。

1946 年 1 月,国民党军占领热东地区以后,

围场成了晋察冀边区与东北联系的交通要道，过往的部队和干部很多，有的要在这里作短暂休息。由于接待人员少，加之物资缺，有时安排不好，跟过往人员闹矛盾，甚至找县委、县政府发牢骚。接待人员也认为自己受了“窝囊气”，不愿意干。她又找到陈丛林和接待人员说：“走，咱们一起去接待。”有人说：“他们要打咱们怎么办？”她说：“不要紧，不要怕。”陈丛林说：“我就说你是书记，我是秘书。”她说：“可以。”他们经过调查了解到，过往人员中，有的是前方战斗部队下来进行休整的，有的是来往奉调干部，长途跋涉后到这里休息一下，希望改善一下生活，并不过分。而且他们中大多数是遵守制度的，只有极少数要求过高。有矛盾，主要还是县里工作没做好，首先应从改进接待工作入手。她亲自推心置腹地跟大家说：“我们也行过军打过仗，到了宿营地不也有这样要求吗？要将心比心，理解人家心情呀！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到增强革命团结，提高战斗力的大事，不要小看它。”然后她亲自找有关部门和城关区进行协调，提出具体意见，由陈丛林逐项落实。如事先派下足够的房子，编成顺序轮流派用，同时做好房东的思想工作，请他们热情接待过往人员。由有关部门解决烧柴、粮食、肉食等供应问题，按时兑换粮

食、草票，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对过往人员，陈丛林都要见面问候，必要时她亲自见面，介绍情况。这样，使接待工作很快改观，受到好评。

在撤退的紧急时刻

1946年8月，国民党军侵占承德、隆化，省级许多单位撤到围场，新拨区最多。10月初，国民党军又大举向围场进攻。县委派黄代芳到新拨去协助接待工作。那里单位多人也多，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很难往一起组织。有的单位提前走了，有些单位思想麻痹迟迟不走，敌人打来才着了慌。很多人找她，要粮，要草，要车，要牲畜，支应不暇。最难办的一件事是省法院一位处长找他说：他们带了一批犯人，有些罪大恶极的汉奸须处决，找不到其他领导人，要她审批。她说："这事我可管不了，因为这是一件越权的事。"处长说："你要不管我只有死路一条。"她问为什么，处长说："如果处理不了又带不走，出了乱子我的罪过还能活吗？"这时敌人已经打到了岱尹梁上，机枪、炮声都听得很清楚了。在这危急关头她顾不上个人安危，当机立断说："那好吧，把案卷拿来，把办案人员找来。"她又马上找区武委会主任找人挖坑。他们边

研究边签字，把20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其余进行教育释放。后来那位处长向省领导汇报后，对她们在紧急关头大胆负责的精神表示赞许。

她撤到经棚（今克什克腾旗）后，省军区领导命她带新拨区的人随骑兵团返回新拨，一面了解敌情，一面收容被打散的人员。她找区委书记赵有，赵拒绝不去，又找副书记王文杰动员了30几个人跟着回去。活动了几天后返回经棚。这时县里和各区干部都到了经棚，进行休整。县委发现赵有等人带了款和大烟。县委在动员大会上讲：各区带的款和大烟，要一律交出。主动交出的可以不处分、不公布，否则按贪污论处。其他区都交了，唯独新拨区不交。她又亲自找财粮助理王进海，要他把款和大烟帐目整理出来交出。王说他不管这事，都交给书记、区长了。叫他把账交出来，他说没帐。她又问王："你身上带着钱没有？""没有。""要有怎么办？""你处分我。"结果一搜，搜出很多钱，他才不得不交待赵有带的比他还多。这时她还想挽救赵有，她和王克东亲自找赵有谈话，他仍拒不交待。最后派李政新、陈丛林去搜出很多钱和大烟。把伪币和边区币卷成卷，装了满满两子弹袋。经过进一步揭发，赵有的妻子骑着马带很多款和大烟去了林西，赵有在经棚用机枪

换马，准备到林西与妻子一起潜逃，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既恨又婉惜地说："赵有啊，赵有，你怎么搞的吗，你这个事情怎么能说的清楚呀。"最后经中央分局批准将赵有处以极刑。1983年围场县委召开党史座谈会时，我见到黄代芳谈及此事。她说："那实在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可是党性、党的纪律，又使我必须那样去作。"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赵有的处分是正确的。

敢于坚持真理

在经棚休整后，地委决定打回热西，坚持游击战，经过半个月行军到了围场孟奎，地委通知围场县委留下坚持斗争，地委去黑河川与冀热察区党委会师。

县委认为不具备条件，不同意留下，最后还是跟着地委到了黑河川。听说区党委认为围场县委做法是对的，我们下边人并不知道详情。到"文化大革命"时，批判王克东，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是"逃跑主义。"很多人都受到牵连可是又说不清楚。直到1983年6月，围场县委召开党史座谈会上，为了澄清这件事，蹇老在这次会上以及后来在地委党史座谈会上，当着刘道生、谢明等老领导的面，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在孟奎，谢明政委把王克东、张静之和黄代芳叫去说："分区去黑河川跟冀热察区党委会师，大约两个星期回来。你们就不要走了，留在围场坚持斗争。"去的三个人听了都感到很意外。黄说："不行。"谢说："地委决定怎么不行?"她说："我们在这里坚持，条件不具备，敌人气焰正高，还乡团也很猖獗，群众工作基础差。我们只有 80 多个人，其中干部 40 多人，女同志 10 多个。武装力量很少没有战斗力，气候很冷。大家衣服很薄，不打死也得冻死。"谢说："两个星期回来，你们就坚持不了?"她说："军事情况往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两个星期能不能回来很难说，请地委对这些情况加以考虑。"谢说："地委已经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克东说："我们回去传达地委的意见再研究一下。"

晚上召开了全体干部会，王克东同志传达了地委决定，大家听了以后，无所是从。有的说，这样行吗? 有的发牢骚说："他们为什么白天不走黑夜走，不走大路走小路。"个别人说："那咱就留下吧，省得跟他们受累受气!"黄说："大家要好好想想，看留下来有哪些有利条件，有哪些困难。"大家数来数去，数不出多少有利条件，尽是不利条件。

如：我们给群众的利益太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土匪太多而火力强大，路又熟；我们有效战斗力不足等。第二天，分区出发前，谢政委又把她们三个人叫去问怎样动员的？她们汇报了情况，认为留下有困难，请地委考虑，谢听后说："哪有你们这么动员的。"她说："动员也要说清楚为什么去打仗，为什么去拼命。"谢政委很生气地说："哪有夏天打仗，冬天把兵收起来不打的。"并说："你们回去讨论怎么坚持，怎么活动。"他就走了，我们回队后，在宿营地看到东北方向山上有人活动，黄让同志们看是敌人还是群众，有人说看不清楚，面对这种情况，她下决心愿意一个人承担责任说："走，随我来，跟着地委后面前进。"走到下午宿营地时，在嘎拜梁上，分区传令把我们截住，不让走了，传达钟司令命令：围场支队停止前进，王克东、张静之、黄代芳到地委开会。这时黄吩咐县委秘书陈丛林向来路放哨，并说："你不要睡着了，耳朵要听好，分区如出发，你们就跟进。"在小滦河川地委召开了扩大会。司令员钟辉是黄1937年在抗大的同学，1943年在中央党校的同学，跟她比较熟。他首先问有什么意见，黄说："意见我昨天已经说了，今天早晨又说了。"他说："那还可以再说嘛。"她说："我没有信心执行地委的决定。"他说："那你可以跟我

们走。”她说：“这不是我个人生死问题，要怕死我还不要求到围场来呢。我要对围场干部负责，对省委、中央负责。”这句话把谢政委惹急了。他说：“那么说是我们对党不负责了，现在就讨论你黄代芳的问题。这时王克东站出来说：“没有信心，不是黄代芳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县委讨论的意见。”谢政委又问张静之：“你们挺北时是怎么来的？怎么坚持的？”张答复说：“那是民族斗争，要不是很快胜利了，恐怕我们早就不存在了！”我们三个人都表了态。谢说：“那就讨论你们县委的问题，既然你们没信心，那就让有信心的干部来代替。”第二天地委委员在行军中分别深入到围场支队同干部谈话，但是对换县委的问题没人表态。到隆化境内时，地委叫隆化支队也留下坚持。王克东、张静之、黄代芳核计，隆化支队留下，我们也要留下。我们去找隆化县委书记罗平、县长瘳寒飞商量如何坚持、如何配合。这时敌人一个团进攻到郭家屯，打得很激烈，围场和隆化支队都没留下，在分区后面跟进，地委也没有再说什么。

到黑河川与区党委会合后，黄去找刘道生同志说：“我来作检讨来了。”刘道生同志说：“你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做的是对的，给围场解放保留下一批骨干。”事实证明，围场第二次解放，

围场的干部表现得都很英勇，这就是最公正的结论。

这件事，给围场广大干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那种不顾个人安危，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只唯实，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高度的党性原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血染塞北　魂飘木兰

——记开辟围场半截塔区工作的区长王剑锋同志

白　雯　萍

王剑锋(1924—1947年)同志是河北省曲阳县西郭村人。1945年8月15日围场第一次解放后，年仅21岁的王剑锋同志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到原热河省围场县城关镇任区长，1946年3月调任半截塔区区长。

开辟半截塔区

半截塔是围场西部大镇。日伪统治时期，设有警察署、协和会和村公所等基层行政组织，反动统治十分严密，敌伪势力很强。加之日伪的反动宣传，人们对八路军了解甚少，都处于观望态度。

王剑锋来到半截塔，为尽快“开辟”这块土地，深入到家，访贫问苦，宣传党的“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发动群众，团结对敌。那时，发动群众十分困

难，可是王剑锋区长凭着对革命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对贫下中农的热爱，走家串户，颂党情，话未来，鼓士气，很快半截塔群众“清算复仇”斗争就开展起来了。不久《冀热辽日报》以“半截塔清算复仇运动如火如荼”的标题表扬了半截塔区的工作。随后根据省委指示，又开展了减租减息。使种地主地的贫民得到实惠。

王区长在“开辟”半截塔工作的过程中，很注意妇女工作，他组织妇救会，并发动广大妇女做军鞋，动员男青年去参军。在此同时，他还把青壮年，组成“护地队”，维护社会治安。不久，半截塔的几个村很快建立了村级人民自己的政权。

风雪转战三千里

1946年8月，国民党十三军侵占承德，热河省委和省政府等机关转移到围场后，曾有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杨、苏(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调入关内作战，只剩下省军区独立团和热西分区警卫团担任阻击任务。他们阻敌于隆化、白虎沟一线。

十月初，敌人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和部分“还乡团”从伊逊川、伊玛图川、小滦河川，分三路向北推

进。敌于9月18日占领隆化后。我军决定战略转移。县委、县政府和东部几个区于10月10日至16日撤出围场县城。经羊草沟、新拨过塞罕坝奔经棚(今克什克腾旗)。

半截塔在区委书记张尚卿和区长王剑锋的组织下,于10月10日夜转移到燕格柏五号。第二天,国民党军占了半截塔,我部分区小队被队长袁喜廷和刘金生拉上南山,在其操纵下叛变。其余八十余人(包括区干部三十多人,区小队三十多人,部分民兵)继续北移,夜宿燕格柏三十一号,这时阻击部队完成阻击任务也撤退下来之后,王剑锋他们也连夜尾随部队转移。在夜间行军,由于地形不熟加之道路泥泞,第二天清早才到天桥。休息片刻,他们又接着前进,当来到大唤起母子沟梁的时候,海拔一千六百余米高,满坡长着羊胡子草,又滑又徒,十分难上,王剑锋屁股上长个大疖子,走路都痛,何况爬山,但他咬紧牙关,继续行军。在王剑锋等同志的带动下大家艰难地爬上了山头,妇女主任杨静波怀着身孕,也一样艰难地跟着爬上了梁,口渴了用雨布接点水喝,饿了煮窝瓜、土豆充饥。当他们半夜走到翠花宫梁上,遇到军分区大部队返回来了,说敌人已经占了姜家店,截断了去路,王剑锋他们又折回到大唤起得胜沟

住下。第三天黎明有一股一千多敌人来袭击。他们顾不上吃饭,有的拿上一点生莜麦面或几个土豆赶快转移。军分区司令部当即组织反击,激战两个多小时,留下小部队掩护,大部队决定转移多伦。围场县支队新建两个连在这里被打散了。

从这里到多伦约有一百五六十里,须走一天一夜。可是此时的坝上,已是十月的天气,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鹅毛大雪。赶到复兴地已是遍体湿透,衣服冻成一层冰壳。

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除了伤员、病号住进屋里时,其余八百余人都是露天宿营。他们互相依偎取暖。王剑锋发现莜麦秸子垛可以蔽寒,叫大家钻进休息。第二天走时仍不忘叫大家整理好,不要违犯群众纪律。

第四天,队伍走在荒凉的坝上草原,一天未遇到人家。无水、无粮。王剑锋忍着饥渴,互相鼓舞,移动着迈不动的步履,艰难拨涉。下午三时趟过大滦河,走到距多伦七、八里地方,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多伦已被敌军占领。指挥部命令,退回大滦河,准备夜行军转移经棚。

这里去经棚约近四百里。坝上多沼泽、疏林,荒无人烟,野狼成群。白天风雪交加,夜间寒风刺骨。王剑锋他们穿的是单夹衣服,尤其是夜行军

冻的打哆嗦。在行军路上，王剑锋一边走路一边宣传，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前行。但一些人由于失去了革命的信心，还是开了小差。最后半截塔区只剩下六人（区委书记张尚清、区长王剑锋、妇联主任杨静波、农会主任王尚海、青年主任陈士良和民教助理王振兴）。

这六人当时可以说是革命的火种了。为了革命和围场人民得解放，他们继续转战，经过一天的艰难行军，夜宿有名的杏花山。这个地方只有三户人家，没有粮食。王剑锋他们去十里之外的村庄买粮食，买回几斤莜麦面充饥，饭后继续出发，走了一天，到了大克头。这里有三十多户人家。离经棚还有九十里地。人们怀着胜利心情，在大克头宿营。半夜有一股土匪偷袭，被部队很快打跑。第二天王剑锋的疖子流着脓血，走路十分困难，年青的陈世良和王振兴要搀扶他走，他说你们的脚也打了泡，我就是爬也一起和你们一起爬到目的地。傍晚，半截塔区的张尚卿、王剑锋等六位同志，和大家终于到了目的地——经棚。

到经棚找到县委书记王克东、副书记黄代芳、县长张静云。围场县干部和区武装到达经棚的共有二百五十余人。住在距县三十里的西地和头道营子。经过二十多天的休整，总结撤退经验、教

训。经地、县委的报告和学习毛主席游击战术军事思想，统一了认识，鼓舞了信心。

半截塔的干部原来撤出有一百多人，现在只有六人，陈世启说真的有点“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觉。王剑锋说：“百炼成钢，数量少了，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咱们能以一当十啊”。大家表示坚决打回热西去，就地闹革命，解放老百姓。

王剑锋和同志们踏上从经棚返回围场三百余里的路上。沿途要过经棚西河和西拉木伦（河）。河水一米多深，已结有一层薄冰。人马一过，踏破薄冰，顺流而下碰到腿上，像刀子一样就是一道血口子。不少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趟河。多数同志过河腿划破了冻僵了，走不动路。王剑锋同志鼓舞大家继续前行。经过七天行军，到了山湾子，又和一股敌人遭遇被我军打跑了。后又接到上级命令，叫迅速到隆化郭家屯跟大部队会合。王剑锋和他的战友们连夜出发，黎明时到了旧屯，这时郭家屯传来了激烈枪声，有敌人一个团在郭家屯截击。军分区司令员钟辉令两个连抢占山头掩护，其余人就地抢渡大滦河。王剑锋他们趟着冰碴水，冰冷刺骨，过河后跑步前进，进郭家屯西南沟，跑了两个小时，才甩开敌人。

次日，王剑锋他们又继续出发，中午到了“一

肯坝”的同盛永，休息半天，趁黑夜穿过平安堡到丰宁县大滩。第三天清早，就钻进一条小山沟，两边是悬崖峭壁，窄处约有五六尺，走二十多里才钻出窄胡同，到了山根，这时下起大雪，山梁海拔约有二千米，开始山坡较缓，越走越陡，没有路。雪后更滑，王剑锋带头往上爬，爬上二三十米就是一身汗，停下喘口气，北风一吹，凉彻心骨，但王剑锋从来没叫一声苦。

血染塞北

王剑锋被分配到孟奎武工队，他主动要求回半截塔，那里当时是敌占区工作十分危险，可王剑锋没顾这些，毅然回到半截塔，只身深入到已被敌占领的塔镇、杨树林、尹家窝铺一带，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宣传八路军一定会打回来的……。杨树林尹家是他的堡垒户，在这生死关头，尹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交给王区长，当通信员。王和尹在半截塔周边深入各户发动群众。为了扩大影响，一天夜里，他们烧了半截塔西山炮楼。当人们看到西山敌人炮楼熊熊大火烧起的时候又纷纷议论说，“八路军又回来了”。

国民党警察署的官员和自卫队刘金生、袁喜

廷十分惊恐,他们四处探访是谁烧了炮楼。王区长和尹已转移到任家营南龙洞山区,有人告密,刘金生带自卫队三百多人直扑南龙洞,包围了南山。

王和尹在南龙洞也是十分警惕,白天隐蔽在南山上,晚上下山做群众工作。

冬季山上树叶已落,隐蔽性很差,稍有移动,就会被发现。刘、袁自卫队有马队百余人。王区长叫尹隐蔽在一丛柞树下,他越过两道山梁,企图引开敌人,最后右腿受重伤,只能卧倒射击。就在这时,手枪被敌弹打中,退不出子弹来,最后被俘。袁喜廷踢着王区长被打伤的右腿说:"这不是王大区长吗,你也有今天?!"王区长厉声地说:"参加革命就不怕死,你们这些叛徒,将来死的更惨……"随后就昏过去了。

敌人找毛驴把他驮下山,王已不能骑驴,又找个牛车拉到半截塔。当夜审问,问王清算时搞出的大烟放在哪里了,问还有谁是共产党?均遭严辞拒绝。刘等烧红烙铁,烙王的后背,王宁死不屈。刘、袁未能得到丝毫口供。

敌人一看,什么也没得到,四天后,敌人张某找来一辆牛车,叫尹通信员背王区长上了牛车,尹又被绑在车上,拉到南门外杨树林边的草地上,解开尹,把王抱下车,王已不能站立,但仍可看出他

那清癯刚毅的面容，毫无惧色。

这时敌人机枪班长徐某用机枪将年仅22岁的王区长和年仅18岁的尹二人杀害。尹的家人把尹拉走，袁喜廷高叫着："叫那些八路军的孝子贤孙来报仇吧！"又甩手一枪把王区长的右臂打断。当晚，街里商户石广财把王区长遗体埋在靠近一棵大杨树下。

王区长已牺牲五十多年了。但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仍激励着围场人民从贫穷到富裕，从富裕奔小康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后记：此材料根据王振兴同志《转战三千里》一文整理和补充。



青山有幸埋忠骨

——忆原中共围场县委书记王尚海同志

王振兴

王尚海同志是山西省五台县杨白乡李家庄人。1921年4月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1944年5月入党。1945年7月任区抗联农民部长。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调干部到东北开辟新解放区。他毅然报名到热河。10月,被分配到围场县半截塔区任农会主任,从此,先后在围场工作29年,他把半生贡献给了围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一、农民的贴心人

1945年冬,围场的政治形势非常严峻,日本虽然投降,但伪汉奸,特务,伪军警与惯匪勾结组成多股匪队,活动十分猖獗,袭击我区公所和地方武装,捕杀积极分子。当时地方党政的工作任务是积极配合部队剿匪,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复仇”和建立村政权。王尚海到半截塔区后,在

区委领导下，带领当地的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但当时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不敢接近我们。尚海通过深入调查得知一些地主和伪甲长从中在作乱，搞反动宣传，及时向区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工作人员不准再吃住地主、伪甲长家里。此后他积极深入到农民中去，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党的主张。但他是山西人，说话群众听不懂，还须别人给当翻译。为了克服这个障碍，他积极学习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遵守农村的风俗习惯，那时贫苦农民家里多数没有炕席，但他从不计较当时的环境，进屋就坐在土炕上，时间不长，就热情地和群众攀谈起来，走到田间，见老乡在干活，不由分说就动手跟着干起来，边干边唠家常。老乡看他实在，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并都给他反映真实情况。一次王尚海带领工作组住在任家营，半夜时一位老乡及时来到住地，向他反映情况，说在四五里远的一个村里有一伙武装土匪，让工作组及时转移。另一次工作组到万泉沟，老乡报告，一伙土匪在伪甲长家吃住了两三天，今天早晨才走。尚海带着工作组及时警告了那个伪甲长。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带领的工作组在半截塔南小区六个村，成立了农民组织，斗垮了恶霸和伪甲长，选举了一心跟党走，勇于去战

斗的雇农当了村干部。

1948年春全县开展土地改革,他积极投身于广大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疏导工作,组织农会,开展斗争。他分管的几个村,时间不长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斗倒了地主,平分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闹灾荒,他又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开展跑运销、刨药、打猎、打柴、编织等活动,使灾情得到缓解。后来他担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地位变了,但他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始终没有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刘伯明同志回忆说:1959年,我在县委当秘书,跟尚海去半截塔东沟村,到一家姓张的村干部家,正赶上两个小孩在牛粪火中烧土豆吃,他也拿起一个要吃,张大爷赶忙说:"你别吃,那是牛粪烧的"。尚海笑着说:"没关系,你们能吃,我就能吃!"由于他跟群众亲如一家,他也受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文革"期间,半截塔区的农民听说王尚海在机械林场被造反派批斗和毒打,去了几十人找造反派说理,并说:"如果你们再打他,我们就让全公社的人来跟你们讲理。"

尚海同志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对阶级敌人敢于进行坚决的斗争。1946年9月,任家营村贫农主任佟福被人暗杀,尚海亲自调查,继之因国民党

军侵占了半截塔，使调查中断。1947年5月，围场第二次解放后，他又继续调查，终于查清是恶霸地主吴尚花所为，他立即组织区小队和民兵，深入到敌占区把吴抓捕归案。1952年冬，他任组织部长时，听到这样的汇报：1946年胁迫区小队叛变投敌，并亲自杀害区长王剑锋的元凶刘金生，复员回来了(刘是1948年冬被俘后隐瞒身份混入部队的)到县，当时书记、县长都在外地，尚海立即召集在家的常委开会研究决定请示上级，逮捕刘金生。经有关部门批准，他便亲自带人执行任务。刘自知罪恶重大，在回县前，早有准备，当尚海等人走近他时，刘便拉响了藏在裤兜里的手雷，刘当既毙命，炸伤了公安局股长袁振锋等人。

1947年10月，制造北沟惨案，杀害村干部和无辜群众10人的匪首牛刚，解放后远遁他乡隐蔽。对此，尚海同志一直耿耿于怀。1959年他任县委书记时，公安局得到有关牛刚的线索，尚海听了汇报后，立即选定半截塔区委副书记、民兵教导员周景凤，给他下了命令，不论花多大代价，一定要把牛刚抓回来。老周不负党组织的重托，历经近6个月，行程一万二千余里，终于将牛刚抓捕归案。

二、无限忠于党的事业

尚海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凡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从不讲价钱，认真负责的去完成，困难再大，环境再艰苦他也毫不动摇。1946 年 8 月，国民党军先后侵占承德、隆化，并准备向围场进攻，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派遣特务和匪队到围场进行骚扰，造谣破坏，策反民兵，袭击过往人员。每天来飞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这时，根据上级指示，尚海积极协助区委书记、区长进行备战工作，在群众中宣传“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整顿基层组织和民兵，准备打游击。10 月 10 日，国民党军侵占了半截塔，区委与县委失去联系，只好跟军分区部队北移，在坝上行军 5 天，荒无人烟，露宿野外。有的人思想动摇脱队逃跑了。他便积极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吃饭问题。一天，队伍走到青龙背，只有一户人家，领导机关下令不准买这家粮食，每人发了一个土豆。大家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尚海冒着危险，走出八九里路买回几斤莜麦面，给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到经棚县(今克什克腾旗)后，与县委会合，进行休整，总结经验教训。他做为区委委员，主动检查自己没做好本地干部的宣传教育工作，致使多数人离队，感到很痛心。1947 年 1 月，回到围场西部打游击，他被分配到孟奎区武工队，他带一个小组，积极进

行恢复基层组织,建立秘密情报站,发动群众进行反报复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后来因主力部队撤走,敌人乘机进行频繁出击,我地方干部和部队受了一些损失。分区领导决定围场、隆化两县武工队向外线突围转移。由于情况紧急,尚海他们小组被丢下,后来他们又联系上另外一个小组,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有的人主张往北追县委,有的主张就地隐蔽,有的主张去黑河川找上级领导机关。尚海分析认为:往北去,部队已走三四天,肯定追不上,而且这一带土匪很多,危险太大;就地隐蔽等于放弃斗争。他力主去黑河川找地委。为了避开敌人,他们夜行昼伏走小路,走山路。经过十多天行军,终于与地委取得联系,是年5月随部队参加收复围场的战斗。他们给部队当向导、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表扬。

1953年后,他先后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农村发展互助合作,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由于他有多年的农民生活,切身体会到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力量单薄。所以,他对互助合作运动特别热情。开始时农民对互助合作道路有顾虑,只能由低到高,循序渐进。他在区工作时就从换工插具的临时互助入手,再到季节组,常年组。1953年全县开始试办14个初级合作社。当

时遇到的问题是:土地入股、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和生产劳动如何评工记分问题以及粪肥、牲畜、车辆如何作价分配等。社员中分岐很大,急待县里拿出办法。尚海亲自带工作组搞试点,并到各区调查研究,跟基层干部和社员商讨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当年除两个初级社受灾严重减产外,其余社都大幅度增产增收。1954年又办起103个初级社,并试办两个高级社。尚海亲自带农村工作组,在水泉村蹲点办高级社。对此可以说没有一点现成经验可遵循。对机构设置、生产资料作价、生产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分配原则等问题,都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地实际情况,一个一个研究解决,有时一个问题要反复多次才能定下来。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新办的初级社中,有些因条件不具备,问题解决的不合理,社员情绪不稳定,少数人闹退社。那些天尚海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心里非常着急。此时,省委通知,暂停发展,大力进行整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经过几个月整顿工作,问题正逐步得以解决。可是1955年6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达以后,各级党组织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批判"小脚女人"。9月,省委又发出"做好准备,迎接合作化新高潮"的号召。

到年底有70%农户报名办初级社。1956年3月，一轰而起，全县办成212个高级社，占农户的99%。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互助组甚至个体农民直接入高级社的。群众说是“隔着锅台上炕。”生产关系这样急剧的变化，带来一系列的思想和实际问题，影响着群众的积极性。这时尚海和县委一班人确实困惑了。他想：“难道自己真的落后于群众了吗?”他也积极探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条原则，面前出现的这些问题算是适应吗？他陷入苦闷中。但处于他的地位又不容他怀疑。每当推行一项重大政策或进行一项涉及面比较大的改革时，他总是恪守两点：一是认真研究上级指示。二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听听基层干部和群众是怎样说的，怎样想的。尽量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县实际情况相结合，拿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他搞调查研究有个特点，不仅是听汇报，而总要深入到农户、田间、地头去观察，直接跟群众交谈。所以，他的意见不是空泛的谈论，而是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56年春实现高级合作化后，有的干部沉浸在“完成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中，对下一步怎样走无所考虑。还有些干部面对各种思想和各项管理问题，苦于没办法解决，整天坐在屋里空讨论。

尚海下去了解到:农民着急的是种不上地,明年怎样生活。他立即同县委其他同志交换意见。认为当务之急是种好地。首先把影响春耕的粪肥、种子作价解决好,作业组没划好的,先以原初级社、互助组为基础种好地,其它问题待春耕后再解决,这样做受到群众欢迎和地委赞许。

当时社员顾虑最大的是对生产资料处理问题。曾出现杀卖牲畜、偷砍树木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围场的情况提出了解决办法。耕畜作价可稍高于市价;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原则下,允许社员留少量牲畜;成年果树可按三四年收益作价入社,也可由社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宅旁零星果树和树木可归社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稳定社员情绪的作用。对于组织领导,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根据上级指示,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风整社。他亲自带工作组深入社队,边解决问题,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使大部分社稳定下来。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领导骨干少,群众思想准备不足,加之层层下达硬任务过多,安排农业生产,农田建设任务过大,规定劳动出勤率过高,偏重农业,忽视副业,过于强调集体生产,忽视社员家庭副业等,使生产遭受损失,

造成一些社队集体虽有所增产，但社员收入却没增加，甚至减少了。据典型调查比上年增收户63%多。持平户占1.5%，减收户35%多。围场历来收入水平就比较低，再减少收入，农民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这怎样向人民群众交待呢？怎样体现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呢？那些日子王尚海确是想在心里，思在脑里，有时彻夜难眠。为了寻求好的办法，他不顾劳累又亲自深入到不同类型社里，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发现除极少数是因为领导干部弱，管理不善，造成减产减收外，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干活大帮轰，分配大平均，影响了群众积极性。再是重视农业，忽视林、牧、副生产。三是强调大集体，忽视社员家庭副业。减收症结找到他又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请"诸葛"献策，让大家进言，在倾听大多数意见之后，王尚海亲自到基层社搞试点，不久在实践中就总结出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征购、超产奖励）的经验做法，但刚要推广，上边有人便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能推行，当时尚海实在想不通又陷于苦闷之中。

为了增产增收，扩大生产门路，纠正单纯靠种地的习惯，王尚海又制定出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从政策上解决集体管的

过死的问题。根据副业生产性质，适当划分集体经营和社员个人经营的范围。规模较大的林业果园、粉房、窑业、运输以及面积较大的采集杏核等，由集体经营。适合分散经营的养猪、家禽、兔、采药、打猎、采榛子、蘑菇等，由社员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应允许社员养一两头大牲畜，三五只羊，宅旁栽十几棵果树。这些办法本来对促进集体经济和调动社员积极性都是有好处的，但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三、艰苦奋斗不褪色

王尚海一生艰苦朴素，严以律已，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而且对亲属子女要求也很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是有口皆碑的。

1946年春，半截塔区开展清算斗争，从一家逃亡汉奸家里抄出一支自来水笔。当时有种说法是："八路军三宗宝：手枪、钢笔、表。"尚海当时使的一支破钢笔，写字时总"拉稀"。村干部看到后就把抄出的笔送给他，他就接收下来。回到区里，有的同志看到后说："尚海在哪发了洋财啦"。本来是句玩笑话，可是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在生活会上做了检讨，把笔退还给村里。他从此立下一条誓言："绝不占国家和群众丝毫便宜"。他一生也

确实这样做了。

1953年后，他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职务变了，但他艰苦奋斗作风始终没有变。那时县里没有汽车，也没有马。他又不会骑自行车。下乡时，通班车的区他就坐班车，不通车的地方都是背起包步行。58年地委分配给县里一台旧美式吉普车，除了有紧急任务送一下外，他很少用车。他说："走路便于接近群众"。刘伯明同志回忆：1959年3月，他跟尚海一起下乡去克勒沟区。白天背着背包走村串户，到地里检查送粪、墒情，晚上开会研究抗旱打井，积肥工作，一连走了几天。年轻人都觉得有些累，他始终不喊累。

他从不以权谋私，要求别人做的事他首先做到。下乡时跟大家一起吃派饭，到区里跟区干部一起吃大锅饭，在县里他坚持做到年节请客不到，送礼不要，按人供给的"食品票"多余不收，受到人民的一致赞赏。

他个人生活也很俭朴。他从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上级来人多数让别人去陪，他很少陪客。他家生活不富裕，每月除给老人寄钱外一家五六口的生活是十分紧巴的。据刘伯明回忆说，一次跟尚海下乡，回来已过中午，王尚海把他领到家吃饭，就是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豆芽，为了招待他，炒了

一盘鸡蛋。他家的摆设，除了炊具外，就是两个木箱子，一对柜和一张旧三屉桌。他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工作了十三年，造林数十万亩，生产大量木材，但离场时还是结婚时的三样家具，没带走林场的一草一木。在许多物资都实行定量供应的年代，他家从没走过后门，多买供应以外的物品。

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少，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他爱人带着孩子去挖野菜。他调到机械林场后，因只有一个复式班小学，老大、老二在围场初中住宿，每人每月只给 6 元伙食费，不让他们乱花钱，他七个孩子没一个念高中的。孩子们的工作，他没有以权安排一个，都是通过参军或招工选拔的。他唯一的姑娘爱萍，机械林场子女转工唯独没她的份，只好到孟滦林管局所属林场基层当临时工，而对他人提拔自己的孩子当了分场领导，只是一笑了之，毫无怨言。1974 年他调到承德气象局工作，他的老儿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几年找不到工作，儿子埋怨他“无能”，他只能做解释工作，后来有一位老同志才帮助他安排孩子在苗圃当临时工，在城里找不到对象，便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多年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没有口粮，一直到 1983 年他离休也没找人帮助解决。1987 年秋，我去看望他，看到他家

的困难情况，我找有关部门领导帮助才得到解决。这些事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小中看大，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的高贵品质。更可贵的是他坚持一辈子不变样。

四、翠林深处埋忠骨

尚海同志在围场担任区、县领导多年，对那里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情况是深有体会的。每年春季都有一二十次沙尘暴，严重时白天在屋里都要点灯，人们外出一会儿弄得耳朵鼻子里都是沙土，迎风处种上的地把种子都刮出来，窝风田每年都有大片庄稼被掩埋。风沙的危害，使他深深认识到林业的重要性和需要森林保护的紧迫性。以他为首的县委每年把封山育林和造林当作重要任务布署和检查，而且抓得很认真。在统计完成造林任务时，有的区汇报每人每天造一两亩，他觉得有水分。就亲自带工作组到半截塔区布都沟村搞试验，跟农民一起栽树。他们起早贪黑每人才栽110棵，折合3分地，他当即批评了虚夸假报的错误作法。后来规定不仅要看造林数字，而且要检查验收看成活率多少。同时他也认识到造林是一项巨大的工程。1962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林业部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场，地委调王尚海任场党委书记。他毅然服从了组织安排，但也感到肩上的担

子份量不轻。这年夏季笔者在围场见到他，谈到他到林场工作问题时，他说的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坝上不造林，受害的咱县是首当其冲，而且要影响承德、北京。这一点咱比谁都明白。这次地委决定让我去坝上，我看选对了。艰苦是肯定的，可是咱不去受苦让谁去呢！我后半辈子就在坝上拼了。"我说："你觉得主要困难是什么?"他说："别的我不怕，有一点顾虑就是文化水平低，机械造林技术性很强，闹不好要出洋相。"不过我想凭他对党的忠诚和坚强的事业心，困难再大也难不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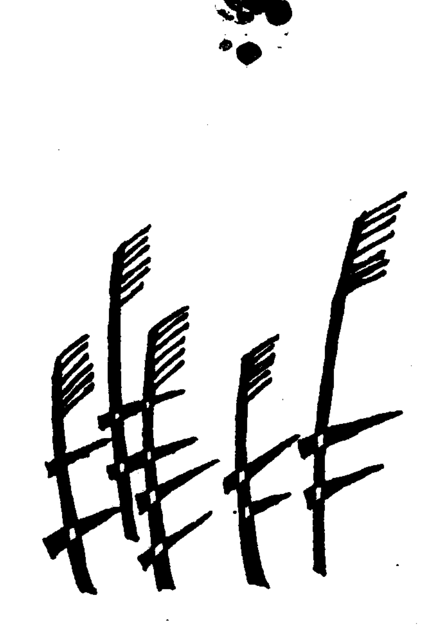
建场初期，从外地调来一批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有的人害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尚海为了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毅然把家从承德市搬到坝上，过起了农家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本人在场内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大的造林、农耕、收秋打场，小到装卸车，修厕所乃至道路除雪，总是干在先走在前，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场部汽车每十天半月从承德、围场拉回一些茄子、青椒、黄瓜、豆角等蔬菜，他与职工家属同样买一份，从不搞特殊。每到严冬季节，他屋里也照样上冻，墙上房顶挂满霜雪。他家里的困难，从不跟别人说，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经常深入到干部和工人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多数人安下心来工作！职工

和家属无论大事小情或夫妻吵嘴都来找他解决或评理。

建场初期，有人主张迁总场到坝下重建象样的办公室和宿舍。他的意见是“先治坡后后治窝”。利用原有的办公设施不变，应集中力量把育苗、造林搞上去。他到场看到烧天然次生木材时，感到非常可惜。经过研究下了一道命令，一律不准以有用木材当烧柴，次生林抚育、清理火烧迹地、站杆倒木要经总场批准，在技术人员监督下进行，有效地制止了乱砍盗伐。开始机械造林时，由于苗木长途运输和技术原因，效果不好，他同技术干部和工人研究总结失败的原因，并一起跟班作业，每天下来像土人一样，直到使机械造林达到技术标准和完成任务。他在坝上工作了 13 年，完成造林 54 万亩，更重要的在于，这个领导班子，教育和带动了一大批人，在这块荒凉的地方站住了脚，而且甘心情愿地为坝上林业事业而献身。1973 年秋我去林场参观，又见到了他。看到一望无边的松林，已经一人多高，心情特别开朗。我问他：“你这些年有什么感受?”他说：“我总算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也爱上了这块土地!”我说：“你打算长干下去吗?”他说：“我连坟地都看好了，马蹄坑是我参加机械造林的第一块林地。1989 年 12 月 26

日，尚海同志与世长辞了，林场按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马蹄坑林地，并立了“王尚海同志造林碑”。1990年原林业部副部长刘琨来场视察时，把这块林地定名为“尚海林”。实现了他与围场大地共生存的愿望。

注：本文作者为原围场县县长



我所记忆中的李政新

王振兴

我和李政新认识是1945年冬。1946年10月北移,至围场二次解放,我们一直在一起活动。后来他调出围场,我们屡有书信来往。据我了解政新同志不是英雄,也没有伟大壮举,但他在平凡的事业中,显现出他高尚的人格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

李政新(原名李兴唐),1919年11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高力铺村一个贫农家里,小时在本村读小学四年,因家庭贫困辍学在家务农。17岁闯关东在牡丹江修铁路做苦工,由于不堪工头残酷压榨,逃到沈阳皇姑屯当搬运工人,后来到龙凤煤矿当井下工人。由于生活水平低下,又生了重病,怕被日本人活埋,在朋友帮助下,于1942年逃回老家。在老家一边务农,同时参加抗日工作,当过民兵班长,参加抓汉奸,配合部队打炮楼,破坏敌人铁路等活动。由于工作积极,斗争坚决,

1943年6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被调到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秘密交通站当交通员、副站长。除了完成送信、送情报外,还负责护送首长过封锁线,他曾亲自护送杨得志、程子华、苏振华、李运昌、杨雨民等领导人安全穿越敌封锁线和铁路,多次受到县委的表扬和奖励。

日本投降后,冀热辽区党委抽调一批干部,到热河开辟新区,李政新毅然报名,同年10月下旬到围场县,被分配到县西北边沿的城子区任区长,赵如桐任区委书记。这里的冬季特别冷,政治形势也非常严竣,区、村政权都被日伪残余势力把持,土匪活动猖獗。赵、李二人是第一次派来的共产党干部,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智斗群魔

当时,围场西部只有半截塔、城子两个区。半截塔区是伪警察分驻所长任芳伍任区长。城子区是伪御道口村长孙吉林、伪柳塘子村长刘景玉、恶霸地主龚文喜等人把持,并有100多人的公安,全部是伪军警、讨伐队。此时我收编了这批武装,孙吉林兼任大队长,四个小队长都是伪警长和地主、伪甲长。他们照旧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广大群众

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李、赵二人到城子区公所那天，孙吉林、刘景玉、龚文喜都在大门外等候，他们一拥而上，毕恭毕敬地道辛苦，然后让到区公所东隔壁的董荣家里，炕上点着大烟灯，还有两个女的在一旁伺候烧大烟泡，他们齐声说："区长、主任一路劳累，先抽一口解解乏吧"。李、赵二人说："我们不会抽，八路军也不准抽大烟"。他们只好把大烟灯拿走，马上摆上酒宴招待，说了许多表示欢迎二位到来和拥护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话。其实这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先拉后打、软硬兼施的办法。对此，李政新是有心理准备的，知道这些人是靠不住的，时刻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但面对敌人的势力，又不能一下采取过硬的措施，只能一面跟他们周旋，一面想办法制服。刘景玉要把自己的好马送给李政新，孙吉林找人说媒，要把姑娘嫁给他，都被他婉言谢绝。这也刺痛了孙、刘等人，他们预感到八路军干部难对付，所以他们又千方百计阻挠李政新下乡接近群众。下乡时以保护领导安全为借口，派人跟随，吃住专门往地主、伪甲长家安排，酒肉招待。即使到了群众家里，他们在一旁，群众也不敢说心里话，这种方法确实阴险，李政新也昼思夜想设法摆脱他们的控制。有一次到厂沟去，跟随的人把李引到恶霸伪甲长的哥哥田

树柏家里，先热情招待，然后控告雇农邢永发，说邢的二儿子邢玉清打死他儿子，要求偿命。经过询问邢家，情况出入很大。李政新把跟随的人支开，自己深入到户，开始的时候有的群众不敢反映真实的情况，怕田家报复，李政新耐心跟老乡讲共产党是为贫苦老百姓办事的，才有人说了一些真实情况。田的儿子与邢争风，田想把邢砍死在庄稼地里，二人打起来，田不是邢的对手，急跑到他情人家里，暴饮凉水炸肺而死。田以势压人，抄了邢的家，把所有财产抢走，还要邢玉清给偿命。是非已经很清楚了。判案这天，来了不少群众，要看八路军的区长怎样断案。田、邢两家各申述己见以后，李政新把他了解的真相公布于众。决定把田抓起来，勒令退还邢家的财产。这一下轰动了，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为老百姓办事的。也使那些上层人物惊慌了，他们感到李政新是很难拉过去的。于是原形毕露，孙吉林带一部分马队上坝活动，不受节制了，并暗地和土匪头子任海勾结。刘景玉借病回家藏起来，龚文喜也不见面了，暗地里招兵买马，伺机“拉杆子”。公安马队的人也背后嘀嘀咕咕，散布不满情绪，形势非常紧张。就在这紧急关头，赵如桐开小差跑了，李政新人单势孤，一个人在魔鬼群里，随时有被吃掉的危

险。但他没被吓倒，他请示县委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以充实县大队的名义，把区公安马队抽出一半调到县大队，以削弱反动武装的力量，又可为扩大新兵创造条件，同时调县大队一个连到城子区协助剿匪.不久又派了区委书记罗竞选和张振东、岳芳令、臧翠琴、杜连升等人，杜任区队连长，组成了区委会。区委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在坝里一些村，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进行扩军，改造村政权，组建民兵、农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可是时间不长，情况发生了严重变化。

在危急关头

正在区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时，孙吉林、任海股匪二百多人占据了御道口，扬言要攻打城子区公所。并串通公安马队的人作内应，这时区小队只剩下 30 多人，其中有一个班是原公安马队的人，很不可靠。另有 10 几个新兵，没有战斗力。农历腊月中旬的一天，接到情报，孟奎有土匪活动。李政新找县大队孟教导员商量决定，县大队两个排去孟奎剿匪，留一个排协同小队守区公所。他又连夜派人给在孟奎下乡的罗竞选等人送信，要他

们提高警惕。拂晓时，他回到区公所正组织防御，这时，在西门站岗的战士报告，在离城二里多远有骑兵活动，分不清敌我。李立即跑到西门岗楼上看到有一百多骑兵向西门走来。他叫战士开了两枪，骑匪马上散开了，他判断一定是敌人。当即下令狠狠地打。他手使“旁开门”的二号盒子枪，打了一梭子，敌人后退到何家大院，依托土墙还击，双方对打起来。这时原公安马队的班长龚振铎骑马来到西门，李命令他参加战斗，他说回去叫人，马上就来，结果他带一个班投敌了。敌匪攻击的更猛烈了，大约半个小时，子弹快打光了。他根据双方情况，感到不能久战，他紧急跟孟教导员商量，准备再猛打一阵后就突围。他带一名战士回区公所取上子弹，正要往西门送，敌人已冲进西门，孟已带队突围走了。他和战士冲出区公所大门，十多个土匪喊着“捉活的”，向他们追来，他们飞跑着穿过马路，跳过几家院墙，越过城墙豁口，二人已跑散。这时几个骑匪绕过东门向他围来。他准备跟敌人拼了，跳到一个坑里，拧开手榴弹盖，用二号盒子枪打了一个连发，敌人不敢前进了。他趁机跳出坑外，跑进一条沟里，匪徒一阵射击，没伤着他，他很快跑上南山，钻进灌木林里，跑上山顶脱了险。这件事在群众中把他传神了，说

“李区长会飞檐走壁，快马都追不上他”。他突出重围，只身一人到孟奎找到罗竟选等人，汇报了战斗经过，总结了失败教训。主要是轻敌思想，对匪力量估计不足，对内部不纯，警惕性不高，使混入内部的坏人有机可乘；加之，指挥不统一，教训惨痛。他是个不贪功，不诿过的人，主动做了检查。

匪队袭击城子得手后，力量更大了，已达到二百五六十人，气焰更加嚣张了。叫嚣打下半截塔过大年。李政新等人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时，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撤到半截塔，等县里派部队再打回来。李政新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把区公所丢了，要自己收回来，只要依靠群众就能坚持住。”最后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五个人进行游击活动，与匪队周旋。一天匪队窜到孟奎，妄图搜捕他们，李、罗等转移到牌楼，住在秘密党员戴凤阁家。一早从公路上来两人，其中一个穿着县大队服装，被孙广祥截住，带到院里盘问，支支吾吾。李政新马上出来，摆出一股傲慢的架势说：“怎么回事啊”，给孙使了个眼色后，又装作土匪的样子，叫戴凤阁媳妇找大烟、做好吃的。那个穿制服的家伙摸不着头脑，开口问：“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李假称是张桐轩匪队的小队长。那人自报家门姓胡，是县大队里咱们的人派来的，给孙大队长送信的，

你们打半截塔时,我们在里面也准备好了,里应外合打下半截塔。他说完后,李说:“告诉你吧,我是城子区长李政新”。那家伙吓了一哆嗦。岳芳令气的眼红,要拉出去枪毙,被李、罗制止住,把二人捆上立即押送到县里,并马上给半截塔区通报了敌情。过了两天,孙吉林、任海匪队窜到碾子沟,住在三号徐家大院,仅距半截塔十多里。李政新等人活动到六十棵杨树。区队杜连升带着郑永寿小队也来到这里,提出要去碾子沟说降孙吉林,李、罗都不同意他们去。郑永寿说:“我和孙吉林私交很深,他能听我的。”郑是石桌子村地主当过伪甲长。杜也是立功心切,对郑很信任,跟李、罗说:“有我在,他不敢叛变。”坚决要去。在没得到李、罗批准情况下,他们走了。结果到了徐家大院,郑叛变,把杜连升和一名老解放区战士、一名16岁的通信员扒光衣服捆起来,冻的半死后枪杀了。李政新对这件事一直感到很歉疚。1983年6月我在围场跟他谈起这件事,他说:“那件事我有责任,那是两位很好的同志,如果我坚决制止,他们也不会牺牲”。

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拂晓,土匪攻打半截塔,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有所准备。匪队被击溃,孙吉林和三号头目孙继武被击毙。李、罗受到县委通令

嘉奖。并鼓励他们尽快恢复城子区的工作。

1946年8月，国民党13军侵占了承德和隆化。9月初，县委副书记黄代芳到城子区传达县委指示，部署战备工作。区委立即在干部和群众中做准备打游击的动员工作，对区小队进行阶级教育和军事训练；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对少数打游击有困难的干部、战士，批准离队回乡隐蔽，并发给他们一些衣物。

10月7日，敌军攻打了孟奎区公所，区委书记刘建勋、武委会主任王青连夜到城子区求援，说是被土匪袭击了。李政新、罗竞选当即研究决定抽调30名区队由罗带领去增援，李政新留少数区队守卫城子区。罗竞选带队走到太后梁上，与敌遭遇，是土匪配合正规军进攻。阻击两个多小时，伤亡很大，撤出战斗，向石人梁方向转移，与区失去联系。敌人很快向城子进攻，李政新和分区供给处政委陈祖仁商量，靠现有的30几人是守不住的，决定转移。陈政委带20多人装上车向柳塘子方向转移。李政新带十七、八个人，上西梁吸引敌人，掩护供给处。边打边撤，一个多小时后，摆脱了敌人。他打算去找老罗，研究如何坚持就地打游击，可是走到十三号沟与供给处汇合了。跟陈政委研究怎么办。老罗他们毫无信息，一时很难

找到。如果继续往北去御道口，前面已没有自己的部队，敌人追上来必遭失败，只有向东北方向找到领导机关再做定夺。正在这时发现敌人又追来了，必须立即转移。他们主动担起掩护任务。因为前面都是山沟小路，只好弃车留马。能带走的东西，马驮人背，带不走的东西就地坚壁，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舍不得扔，李政新要下来背上，由于人马负重太大，行进速度很慢，傍晚才到碾子沟垴，已经一夜一天没吃东西了。听老乡们告诉，上午在半截塔方向打得很激烈，下午咱们的部队往燕格柏沟里走了。他们抓紧做饭，吃完立即上路。夜间在燕格柏沟垴与省军区警卫营相遇。得知围场、半截塔都被敌侵占了。部队领导要他们随队转移，开始踏上艰险的北移之路。

北移与南下

残酷环境是考验人的最好试金石。在这天夜行军中，公安助理孙广祥拉走了六名战士叛变。跟随李政新的还有四名战士和民政助理郭建忠、妇联主任兰素刚。郭已 40 多岁，并有高度近视。李政新身背二号盒子枪、苏式连珠枪，还扛着一挺捷克式机枪。加之走的都是崎岖山路，很难跟上

大部队,有时只能奔跑着追赶。第二天中午走到大唤起沟垴,一股敌人堵击过来,部队不能与敌人纠缠,留少数人阻击,大部队跑步突围。他一面鼓励大家:"要坚持住,突出去就是胜利!"一面发动战士照顾老郭。一直到傍晚才停下来休息,又是一天一夜没吃上饭了。饭后连夜北移,有的人走着路,站在那里睡着了。有的人小休息时,躺在冰凉潮湿的地上睡着了。可是李政新连盹也不能打,他要随时叫醒别人。太阳出来时,到了新拨附近的一个村子,准备搞饭吃,又一股敌军追击到岱尹梁上。热西骑兵团两个连狙击,敌军火力太强,骑兵团只能边打边退。李政新赶紧叫醒大家吃点饭,急忙向山湾子方向转移。这里撤退的人很多,道路拥挤,秩序很乱,快到山湾子村时,敌军又追了上来,截断了后面人员,形势很危急。幸有省军区警卫团赶到阻击敌人,才幸免于难。傍晚走到坝根,又连夜上坝。这已是第三个昼夜了,行军更加艰难,要经过一些涝塌子地,在泥水里走不小心陷进泥里拔不出腿,加上人多走不快,稍一站就有人睡着了,后边人连推带喊才醒来。此时坝上已经结冰,许多人还没穿棉衣,只好把被子披上取暖。到中午才下了坝,找到住户,吃了一顿饱饭,睡了一夜,这在当时简直是天大的享受。就在这

天夜里，李政新得了急性扁桃腺炎，疼痛难忍，发高烧，他没有跟别人说。第二天过西拉木伦河，一米多深的水，天气寒冷，水流很急，身体弱的人很容易被冲倒。后来有人组织起十几辆大马车，后面拴上几根大绳子，年老体弱的人扯着绳子过河。他和战士扶着一老一女安全渡过河去。他高烧不退，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又连续走了四天，到经棚县城，找到县委领导。黄代芳同志看到他们疲惫不堪的样子，连忙叫警卫员给他们六万元边币，叫他们修鞋、理发。马上又命他和县委秘书陈丛林到二十里外新地村去号房。他二话没说就走了，按时完成了任务。县委对他们不怕坚苦的精神进行了表扬。地委书记谢明在整训动员大会上，也表扬了他们干部、战士团结一致，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同时，严厉批评了新拨区委书记赵有，私自带大烟和款，并用机枪换马，准备和老婆潜逃的腐败行为。县委命令他和陈丛林二人去抓人取赃。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差事，赵住在二里路外的一个村子，他手下有 20 多枪马，如果弄不好，会出大乱子。他俩商量不能硬抓人，而采取了分化的办法。一面动员赵应向组织坦白交代自己错误，争取从宽处理；一面向其他干部战士讲明利害，应站在党组织的立场上解决赵的问题，这才下

了赵的枪，连人带赃一起带回。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11月下旬，地委决定打回热西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为便于指挥，围场编为一个支队，县直干部为第一中队，方雨青为中队长；各区为二中队，李政新为中队长。妇女同志单编为一个队。这次南返，途经经棚、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四海、崇礼、延庆等县。前期是沿着塞罕坝内外行军，天气严寒，最艰难的是过河，先后淌过经棚县城西河，两次过西拉木伦河，都是一米多深的水，河水冲着冰块，冰凉刺骨，冰块碰到腿上，就划一道血口子。人们一只手举着棉裤，一手撩着棉衣。每到这时，李政新总是跑前跑后，组织年轻体壮的同志搀扶年老体弱的和女同志，他身上背着别人的背包和枪支。夜行军时别人可以休息打个盹，他总是前后照应，不让一个人掉队。从碾子沟九号过牌楼梁，到孟奎，要通过十多里公路，为了避免与敌遭遇，进行夜行军。没有正式路，前半夜走灌木林中间的小道，后半夜已无路走，山很陡，又是风化石，弄不好就掉下悬崖。李政新特别担心。他在前面摸索探路，后边人一个挨一个坐着往下挪。本中队的人下来以后，他看到后边还有些人没下来，又爬上去往下护送，来回爬了三四趟，棉衣都湿透了。20多里路，整走了

一夜，围场支队是后卫，下梁后天已亮了，还有十来里公路，传令跑步前进，他亲自拉着老郭跑，大家安全到达目的地。连续昼夜行军，人困马乏，到石桌子村宿营，人们倒头便睡，他忙找人烧热水，叫醒大家洗脚。这时听老乡反映有一个罪大恶极的伪保长，隐藏在附近村里，他立即请示县委批准，亲自带人去逮捕回来，交县委决定处决了。

围场支队住在三岔口，准备过嘎拜梁时，地委突然传下令来，让围场支队留下就地坚持打游击，对于去留问题，地委和县委意见有了分歧。县委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不具备留下的条件，主要是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气焰正高，还有还乡团都是地头蛇，很猖獗；而我们只有80多人，其中老弱病及女同志20人，战斗力很差，加之正值大雪封山，无处藏身，如无部队配合，很难站住脚，勉强留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县委领导三次找地委申述意见，要求留一个连或一个排配合，地委也不答应，并说要讨论县委的问题，“既然你们县委没信心，那就找有信心的干部来代替”。第二天，地委书记到围场支队找到方雨青和李政新说：“你们留下在围西打游击，由你们两个领导。”并让他们考虑尽快答复。这下李政新有点懵了，县委让跟进，地委让留下，地、县委都是上级，能不听谁的呢？真是左右

为难,急的他直冒火。就在这时,敌人一个团向郭家屯袭来,分区领导到前方指挥战斗,再也不提去留问题,围场支队随分区转移了。事后问他:“你当时是什么心情?”他说:“当时真有点懵了。凭心说,我认为县委意见是对的,当时手里攥着两把汗,如果留下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也做了最坏打算,那就是拼了。”到黑河川与区党委会师后,刘道生同志肯定了围场县委意见是对的,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郭家屯突围后,第三天在上黄旗又遭敌人一个团袭击,人们突围时很狼狈,很多人没吃上饭,大道上丢了许多背包。在进一条西北沟时,钟司令员遇到李政新,命令他带十几名有步枪的干部战士,抢上山头监视敌人,等大队走远了再撤。他二话没说,坚决执行,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大部队已走远,看到远处敌人行进的影子,才撤出警戒。整整追赶了一天,奔跑了 80 多里,爬过一座千米高山,天黑以后,到四岔口才赶上部队。

又经四天行军,北上一肯坝,夜穿平安堡至大滩的 40 里公路,过一道 40 多里大山,钻一条 20 多里的窄胡同一样长沟,冒雪爬一座海拔两千米的大岭,到了黑河川,跟区党委会合,住在喜峰砦,休整 10 多天。过了元旦,十三旅打下崇礼县城。

傅作义派大军报复,进攻冀热察根据地。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先拖垮敌人再打,并决定围场支队(改称长江支队)把女同志和病弱的同志留在四海县工作,剩下70人参加“牵牛鼻子”。这一段时间主要沿长城内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从喜峰砦出发南去东万口、龙门所、东卯。又西去万全寿、后城、四海冶,再折头北返琉璃庙、汤河口、喇叭沟门,杨木栅子。半个月来,昼夜兼程,行军千余里,经常急行军。顾不上吃饭、靠几把炒米、几块冰雪充饥。免不了有些怪话:“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山路,白天不走黑夜走,吃不上饭吃山药蛋,山药蛋吃不上,要饿肚子”。这虽是怪话,但也是实情,确实有点超常。可是李政新比别人更要累,行军时他跑前跑后,帮助体弱生病的人背包,扛枪,不让一个人掉队。宿营时别人睡觉他要安排住处,烧水照顾大家洗脚,还要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在行军途中,再次犯了急性扁桃腺炎,高烧不退,头两天瞒着大家,第三天实在坚持不住迈不动步了,话也说不出来了,领导上知道后,想把他留在后方治病,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对围场西部情况比较熟悉,病再重我也要回去。”张县长把马给他骑,他说颠起来更疼,他不骑,坚持着走。晚上宿营躺在炕上起不来了,

饭也吃不下了，县委秘书陈丛林，听老乡说用麻油炸鸡蛋趁热吃下去能治嗓子，老陈给他炸了两个鸡蛋逼着他吃下去，一阵巨痛吐了两口浓血，立时觉得轻松了。

在杨木棚子休整两天后，地委决定恢复隆化、围场西部地区。由十三旅一个营、分区独立团配合，连续走了七天，先后打下丰宁县上黄旗、隆化县郭家屯后，回到围场。

城子区武工队

腊月二十四拂晓打下郭家屯的当天下午，围场支队返回到官地，侦知城子、孟奎都驻有百余地主武装。并侦知石棚沟有30多敌人催要粮草，二十六日拂晓包围了这股敌人，我们进村，匪徒们已上了山，对射一阵枪，匪徒们跑了，缴了很多粮食、肉、粘糕、豆包等，分给了群众。为了尽快组成小滦河、孟奎、城子三个武工队，李政新任城子区武工队长，杨德国任指导员，张振波副指导员，开始有干部7人，后又调进3人，战士4人。当天夜里返回到城子区，在六棵桦、八顷、桃山一带活动，了解敌情和群众情绪。年三十那天县委把各武工队集中到西龙头大院，汇报工作研究布置下步工作，

每人发了一斤肉、一斤荞面包饺子。夜 9 点多接到情报,敌一个团实际 300 多人已到白音沟,正向西龙头前进。县委紧急部署仍分散活动,城子区武工队连夜冒着大雪寒风走 70 多里,到六棵桦南沟,住在老贫农李广兴家,他把炕让出来,李政新坚决不住,大家铺上干草挤在两间屋子地上睡。初一早晨,房东大娘把藏着的豆包、粘糕、猪肉拿出来给大家吃,李政新说什么也不吃,大娘急着说:"你们不是说咱们是一家人吗?你们要不吃,以后别上我家来"。李政新、杨德国商量,这么好的群众,如果不吃会伤他们心,决定饭可以吃,必须按价付钱。

在这天拂晓分区独立团在马道梁伏击了追击我们的敌人,毙伤敌 20 多人,初二早晨城子武工队向黄土梁子转移,下梁时,跟一股 20 多人的地主武装遭遇。匪徒正在村里老乡家抢东西、抽大烟。李政新带队冲了下去.敌人蒙头转向,往后山上爬,一阵追击,打伤匪徒 2 人。老乡告知领头的是一个姓梁的保长。第二天,他派人来说情,条件是人不见面,交两支大枪、一支撸子枪,把人遣散,再不与我为敌。经过几次战斗,震慑了敌人,驻城子、孟奎的地主武装龟缩到半截塔去了。

这里地处塞罕坝下,正值数九隆冬,经常零下

二三十度，每天夜里都下一层清雪，当时已积雪盈尺。人们在前段行军中，上级号召轻装化，大家把棉被和一些衣服都送给贫苦老乡，只剩一身棉裤棉袄。武工队又经常夜间活动，趟着大雪，顶着“白毛风”，刮到脸上象刀割，手脚麻木，两只脚，鞋和袜子冻在一起，到住地还得互相帮助往下拽。睡觉不能脱衣服，经常被冻醒，在地上活动取暖。在外面站岗，经常冻伤手脚，每天夜里换岗，都由李跟着出去，带着回来。他挨的冻最多，觉睡的最少。武工队到城子后，听到很多贫苦农民控诉恶霸地主反攻倒算的罪行，激起了大家仇恨情绪，抓了两个地主处决了。王克东同志来检查工作，听了汇报后指出，反报复斗争要讲政策和策略，对地主也要区别对待，对罪大恶极的要镇压，给群众撑腰；对有一般罪恶，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对开明人士还要争取团结。李政新主动检查了自己过激情绪，后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次黄河大队把地主林凤章抓住，交给县委处理，王克东、张静之把李政新找去研究，他认为有个叫林凤岐的罪恶大，林凤章罪恶不大，经教育释放了。不久把林凤岐抓住，交县处决了，并由县政府张贴了布告。六棵桦杨金生的弟弟在半截塔当警察队，一天夜里武工队到他家里，他很害怕。李政新向他

交待政策，说明只要他不跟着做坏事，他回来可以既往不咎。杨表示感谢政府，一定把区长的话捎给他弟弟，叫他不要干了。桃山村顾增，是地主，当过伪甲长，但那时在摊花销等事情上，经常替贫苦百姓说话，配给物质不克扣人，日本投降后，他也很靠近我们。李政新、杨德国亲自找他做争取团结工作，他很赞成党的主张。后来他给我们做了很多事，每逢降队出来活动，他冒着危险找人给武工队送信。他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骑上毛驴到半截塔找老关系，搜集对我们有用的情报。在他家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1947 年 5 月，我十三旅等部队经过该村，他积极筹集粮草，杀猪慰问，受到部队好评。上述工作对分化瓦解敌人、安定群众情绪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八路军抓到没跟着走的干部和区小队的人就活埋。有一名叫宛金贵的区干部，北移时他没跟着走，我们这次回来，他不敢照面，找人捎几次信他也不见面。后来得到他的藏身处，李政新亲自找到他，给他讲了党的政策，批评了他的错误做法。他表示愿意出来工作。根据当时形势，没让他公开到武工队，要他多做些在家的干部和区队战士的工作，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并做些情报工作。经过工作，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接近我们了，有三名区

小队战士回来参加了武工队。

主力部队撤走以后，敌人又猖狂起来。匪队纠集起来配合正规军，不断偷袭、奔袭。孟奎区长史志新、半截塔区长王剑锋先后牺牲，地委机关遭袭击，电台零件丢失，与上级失掉联系。3 月初，敌人从小滦河、孟奎分路进攻，军分区黄副政委判断，敌人有合围之势，通知围场、隆化两县支队进行突围，结果造成“二返经棚”，受损很大。

部队走后一天，午夜时才接到侦察员的口头通知，武工队立即出发，在没膝深的雪里走了半宿，第二天下午在大唤起沟垴遇到城关区苑才等三名战士，脚冻坏不能走路，武工队没法带走他们，只好给他们留下粮票、菜金，托付老乡给掩护养伤。又连夜追赶，翌日中午赶上部队，才知道共被冻伤 70 多人。有的坐牛车，有的骑驴，雪地行军很慢，一天只走三四十里路。由于城子武工队一直急行军，没有冻伤人。李政新请求担任后卫。沿途敌人进行堵截和追击。城子武工队有时抢占山头掩护，有时殿后阻击，李政新总是冲在前、撤在后，八天打了九仗，才到经棚县城。

上级决定在这里休整，并担任守城任务。都住在民户家里，李政新跟战士们住在一起，为了不浪费宝贵时间，他用自己的零用费买铅笔和纸，订

上学习本，发给战士，要求每天学会三至五个字，由我和李秀担任教员。每天学唱歌，学会了《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六、七首。

由于几个月来昼夜不能脱衣服，大家都是满身虱子。为了消灭虱子，买了些“百部”熬成药汤，晚上在屋里点上干草火，用条帚往火里扫虱子，然后把百部水抹在衣服缝上。有两个战士得了疥疮，买了些黑柴油，抹在疥疮上用干草火烤，这些土办法挺有效。那些天生活虽然艰苦些，但大家情绪很高。

1947年5月，围场第二次解放，武工队解散，李政新带着城子区的干部和战士回区，投入剿匪、土改等斗争中。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却在半截塔土地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调到隆化县支队当连长，他没有丝毫埋怨，以饱满的热情多次参加剿匪作战。1948年5月，解放隆化作战中负伤，定为三等残废。伤愈后转业到张家口地方卫生部门工作。1957年调煤炭设计院，先后任设计室、选煤室、办公室主任。他刻苦钻研业务和技术，深入实际，深入现场，跟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打成一片，兢兢业业，很快从一个军人转变成一位称职的技术管理干部，先后参加三个大型、新型选

煤厂的建设工作。他的工作受到中外专家、技术权威和工人的称赞。他非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惜人才。1957 年反右派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几名专家和技术干部。为此，在反右倾和“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打断三根肋骨，但他不改初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加倍努力工作。1982 年离休后，仍担任两三项社会工作。不幸于 1990 年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他以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做斗争。有病期间，委托他老伴兰素刚给围场的老同志写信，惦记着第二故乡的发展和建设，表示病情好转时再回来看看，但未成行。不幸于 2003 年 8 月 5 日与世长辞。

李政新的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他重奉献、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任何条件下，都以饱满热情的精神去工作，在他身上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他做人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以律已，善待他人，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些事情他做起来很随便，不是在纪律约束下的自我节制，而是一个革命战士本色的自然体现。并且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辈子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片冰心铸艺德

——记画家许益智

王　福　兴

许益智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九九五年五月，在全国人民政协报社、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国际老年人中华老人诗文书画大赛”中，这位老人根据六十多年的养生经验编写的长寿诗文入选，他绘画的“骏马图”也同时入选 。画面上形态各异，奋蹄欲飞的骏马栩栩如生，受到多方名画家的赞赏。之后，随同其它精选出来的珍贵艺品到全国各地展出，又到台湾进行大展。他多年在诗文、美术绘画上辛勤耕耘，不断探索，获取累累硕果。

目睹大红的证书，驻足在笔墨精妙的骏马图下，我采访了这位老人。

许益智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出生在隆化县城，九岁入学，十岁丧母，当时留下姊妹五人，生活

极度困难，被迫辍学。十二岁被姑祖父张席珊收养，第二年复学，后由中学分科推荐考入关东洲大连美术学院。三年结业后分配到隆化县第一完小任美术教师。

他自幼就爱好美术，在小学熟通其他科目的基础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在小石板上画马和小动物。自己认为好的，就用毛笔描下湿印，印在纸上再加工。由于他勤奋好学，天天练习，在校美术课程中始终名列前茅。

寒暑假，很多孩子不是串亲戚，就聚在一块玩。唯独许益智舍不得时间去玩耍，他一个人到隆化街内去向名画家蒋荣修老先生学习画画，专攻花卉和山水，另有一位叫汤百川的名人，画马出名，他又慕名拜于门下，由于他虚心吃苦，学习执着，那位名人非常爱慕他，于是教他画马乐此不疲。后来他画的马比其他弟子都技高一筹。

十四岁的那一年，隆化调来一位妙县长，他有一位小姐名叫妙素筠，酷爱画“金鱼”，她的宿舍是在县府的最后院，大仙堂旁边。此地宽敞优雅，环境极佳。周围古松笼罩，奇花异草，鸟虫鸣叫，一派生机。许益智得知道这位小姐的画功极佳，恨不能飞到她的身边一睹为快，填补自己的艺术空白，这深院高墙不容易呀！但他为了与名家交往，

多学技术，每星期和假日从顺水沟爬进去，站在小姐画画的窗下，凝神观赏，妙小姐画的“金鱼”色彩逼真，水草蓝天相映，金鱼游来荡去……看到出神入化的时候，他爱慕若狂，恨不能进屋求教认师，但外边有警卫员，不仅不让进反而几次催他走开。可他两腿象钉在那里，半步都不愿离开，这位妙小姐听说这个小孩爱看画就搭了一句话：“爱看就叫他在外边看吧”从此警卫员不再管他了。

初窥艺术殿堂的奥秘，眼界为之大开，正在他兴趣意浓，求艺甚强的时候，画金鱼的小姐搬走了。许益智黯然神伤，为没能向小姐学到画“金鱼”的本领深感遗憾，为此他偷掉过眼泪。

是年，隆化街北门里有一座西医大药房，大夫名叫李春阳，是回民，他请来一位画家老先生，名叫王子厚，人称蝴蝶王，张三营家。这位老先生专门画蝴蝶，他画的“百蝶图”遐迩闻名，很受崇拜。一天，许益智去买药看见那位老先生正在作画，看的入了迷，竟忘了买药。为了博采众长，获得更多的画艺，许益智每天都来这个药店隔窗赏画，这个老画师看着他这样倾心投入，就送给他一幅栩栩如生的蝴蝶图。他接过这幅画如获至宝，不仅每天去观赏，而且还试笔去模仿，作画的蝴蝶怎么看也不逼真，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拜这位画家为师，

画家见他如此酷爱画画，就收他为徒。但这位老师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教你，你有什么要求说说吧！"许益智开口答道："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求您从头到尾画一个蝴蝶就行。"说完，这位画师拿起笔从头到尾就画了一个完整的蝴蝶，然后又给他讲讲专制的画笔，又给他包上一包蝴蝶绒，将有关画画的技巧和绒的画法又向他叙述一遍，就这样许益智步入了画蝶的殿堂。

按画师的指点，他回到家就开始练习画蝴蝶，一天他终于画成一个蝴蝶，他高兴得欣喜若狂。

为了画一个"百蝶图"，他放学回家就到野外去欣赏蝴蝶，不仅看它飞，还要亲自捉，一次，一个大的蝴蝶在他头上飞来飞去，怎么也捉不住，为了捉住它，走了七里之遥，一双新鞋被楂子扎了个粉碎。许益智觉得这样要捕捉一个蝴蝶，太难了，他忽然想起苍蝇拍的理论，就亲自用根铁丝围一个大圈安一个一米长的木把，用胡椒眼冷布做个二尺深的网兜，用手一摇蝴蝶就进去了，翅膀还完整，这个网兜成了他的一俱之宝。至今还保存着。

虽然自己有了捕捉蝴蝶的工具，但捕来的仍然重的多，不尽人意。于是许益智，就向牛羊倌作宣传捕捉一个蝴蝶给一分钱，戴飘带的给二分钱，从此向他出售蝴蝶的人络绎不绝。

隆化街里知道许益智会画蝴蝶了，有人来向他求画，许益智在画之前有个条件，谁找我画就给我捉蝴蝶，捉几只就给画几只，但不要重样。就这样许益智捕捉到自然的蝴蝶就多了起来。为了蝴蝶标本保留完整，许益智就用胶水贴在大本子上，然后照着标本一个一个画在对开图画纸上，又给起名子。什么“罗汉衣”，“珍珠翠”，“黑老虎”，黄狸大王”等等，后他邮寄日本高级彩色印刷厂印50张。寄回来没到家，就被亲朋给分了。最后到家只剩3张。

为了防止亲友再拿去，回到家许益智精心剪成一个个单蝶，贴在纸上，钉成一个本，搁上硬皮，外写上“蝴蝶标本”四个字，然后如珠如宝地就存放起来。痛惜的是，一九四八年，被人撕了卷烟抽了。

新中国成立后，许益智仍担任着农村学校教员，由于他对美术苦心所诣，所以在课外的时间，就向学生询问谁家存有古画？有一名学生说“我家有，但我父亲每年春节挂一挂，过初五就搁起来了，上面画的全是金鱼”，此时，许益智听着入神，想着着迷，于是他就亲自去这位学生家访观，一见此画非常面熟，但一时也想不起来，当看到“妙素筠”绘时，头上就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这不就

是解放前那位隆化县长之女妙小姐画的吗？心里在叨念着睹画思人，倍感亲切，于是许益智就象这位学生家长借用10天带回学习，回到家中他把这幅画挂在床边，每日观赏用心琢磨，长时构思，怎样画出鱼鳞的隐现，尾鱼的飘凫，当他灵感像潮水般来的时候，伏案即画，终于画出了理想的小金鱼。

艺术是无止境的，绘画更是博深的，许益智始终未曾松驰对绘画艺术的孜孜追求。他砚池耕垦，不厌其烦，执著励练，造诣所臻。为了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发展，他辞去小学教师，又去北京学绘画、照像布景，三个月的时间，他惜时如金，勤奋钻研，凡老师指点到的，让其练的，他就学而不厌，反复琢磨，，专心去练，由于他求知欲高，获艺心胜，尽管才三个月，对于他来说，等于上了三年大学。为绘制舞台布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隆化建筑董存瑞烈士陵园之初，美术设计只是许益智一人。除烈士墓前碑形图案设计外，碑上“董存瑞烈士之墓”七个大字，也是他费功所写。说起书法，对许益智来说并非所长。当时隆化县城最有名的一位书法家名叫张逊川，楷书颇有功底，远近闻名，但当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字虽好也没人敢用。此时的许益智看出党政领导

的意思，想出一个“曲径通径”的解决办法，为获得张逊川字体模样，他悄悄去张逊川家，求其给写“董存瑞烈士之墓”七个毛笔字，拿回家后照体摹仿，苦练一个星期，这一时间确是废寝忘食，行墨无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从他写就的21个字中精选出七个，镌刻在碑上。

许益智虽是旧社会出生，其思想是进步的，艺德也是高尚的，他在陵园工作，不仅对董存瑞烈士很崇敬，而且对工作也是极端负责任的。初期建筑，月工资政府按石匠工一日三元支付，他从中拿出一元奉献给董存瑞烈士陵园建设。在陵园建筑二期、三期大型复修过程中，许益智都亲自参加了，并且很多时间都加班加点，但从来没领过加班费。1973年，许益智又参加了董存瑞25周年重彩工作，在濒临繁忙之际，为赶日期，他把二女儿许荣杰叫去帮忙做小工，历时3个月，分文未取。

在绘画上，他不倚门户，博彩众长，让英雄尽显风彩，让陵墓庄严肃穆，整个陵园的绘画书写，展现了许益智的综合艺术才能，也映现出了他对艺术上追求的功底。

1954年，许益智调入围场评剧团，专搞舞台美术设计兼绘布景，他在剧团绘的第一个布景就是“拜月记”，这个戏主要演员是三位，布景占舞台

气氛百分之七十，近景是楼台殿阁，廊下是径路栏杆，后衬远景是天幕花园。蓝天明月百花盛开，这个布景许益智绘制得活灵活现，远近分明，线条直观，彩图浓淡有致，所以戏一开场，幕布刚拉开，观众就掌声雷鸣。

许益智在围场剧团工作近30年，他所绘制的各种布景，不计其数，围场评剧团在当时红火的日子，与这位精心绘制布景的艺师是分不开的。

许益智一生中可以说是在画中生活，生活在画中，他画的画远达北京、太原、徐州、承德等地，近在隆围两县，深受广大同仁的挚爱。

许益智退休了，但前来找他绘画的、求师的、探讨艺理的，每日家里来人络绎不绝，但他总是以笑脸相迎，热情相待。对求艺的，他诲人不倦，找画画的不收分文。他常说："人有点知识，掌握点艺术，只有奉献给社会，传播给大众，才有价值"，就这样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条，好多人拿着礼物前来拜师，被他婉言谢绝，机关找他画画给高价，他只收工本费，甚至有的搞行政宣传，工时多少，全尽义务。小学生求他指点，他专心辅导，近几年，有人为培养自己子女绘画，托亲拜友向许益智求教认师，虽已耄耋之年，所求不辞，根据试有爱画之才者，收下数名小学生，每逢星期六日及有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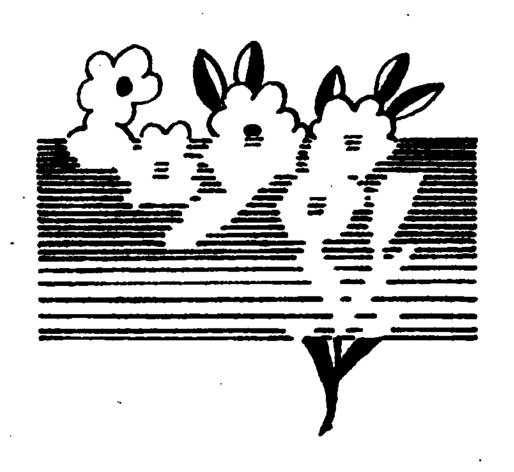
假机会，常来其家按时教画，分文不取。

许益智的画虽然漂洋过海，但未自诩为艺术家，或高高在上，训谕观众，躲进象牙之塔，自我陶醉。他只想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画出平常的事物，从中发掘出不平常的美来，与观众同享。所以我们感觉到许益智的画朴素而亲切，生动而风趣，他的作品在笔墨上承继着很多名人的脉络，也是他个人的气质使然，落笔大胆，用墨苍润，他十分注重笔墨运用中的“气”和“力”，他认为，“气”是整个画面的气韵，乃是画家对作品的一种生命的注入；“力”就是力量和能力，乃是画家对画面的一种精神性的流露，一幅画有了“气”和“力”才具有了精神和生命，此论正可以用来说明许益智自己作品的的艺术风格。他的“骏马图”，给你一种仰颈嘶鸣，其势能遏行云；昂奋四蹄，更是地动天惊之感。

许益智的艺术画作，是多样的，但能大处着眼，大刀阔斧，大起大落，追求神美气足，许益智为人，耿直爽快，不拘小节，崇尚“行侠仗义”。在许益智的身上，古人“画如其人”的理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他的艺术生涯是艰难的，也是奋争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画，博取众家之长，形成了写实

求其真，布局求其新，变化求其美，夸张求其神，用墨求其韵的风格。人们多次劝他搞一次个人画展。他总是说："少宣传自己，多干点实事"。这就是许益智一个老画家质朴的胸怀，也正是这种朴实的精神，使他的艺术之树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并从丰厚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使艺术之树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今老画家虽已年过古稀，但他用心血和灵智创作的画作，将永远留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熠熠生辉。



正直坦荡　敬业爱国

——记围场教育耆宿程金和

尹　志　杰

在围场教育界，程金和先生（1915——1990）堪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他自 1958 年任完中（即后来的围场一中，系县内的"最高学府"）校长，至 1983 年离休，其间虽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几上几下，几进几出，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长岗位上度过的，而只要在岗一天，他就惮精竭虑，扎扎实实工作一天，以其正直坦荡、严肃认真、身体力行的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着身边的教师和学生，为围场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倡"五字四句"作风

在程金和先生二十多年的校长生涯中，最辉煌时期应该是他在学校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五

字四句”工作作风，即1961年至1966年。那一段时间，是程金和以及在校师生难得的“黄金岁月”。

什么是“五字四句”工作作风？为什么倡导这一作风？可以说，这是从当时学校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一套能够体现“先进性”的师生行为准则。

多年的军队生活，使程金和先生养成了一种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干什么事都力求尽快熟悉，尽量做好。担任中学校长以后，他一头扎到基层，每天都进课堂听课，与老师谈心、跟学生聊天，对学校状况、师资力量和教学风气、教育质量很快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发现，教职工主体奋发向上，情绪比较饱满，无论提出什么要求，差不多都能令行禁止，但也存有一些不足。主要是一些教师事业心、责任心不强，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现象。对学生要求不严，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农村调查中，常听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现在的中学毕业生，回到农村不会读报，不会打算盘，不会作记录，不会写总结，不会写信。这使他脸皮发烧，坐立不安。他想，若想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风。经过认真分析，反映思考，1962年起草学校工作计划时，他对全校师生提出了“五个字四句

话"的工作作风要求，即"虚、勤、细、严、毅，五字莫偏废，诸事虚当头，一毅以贯之"。

后来，在很多场合，程金和先生不止一次对"五字四句"作风进行过阐述，以致全校师生都理解了他强调的这"五个字四句话"，就是要人们养成虚心好学、勤奋刻苦，耐心细致、坚毅有恒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这"五个字"是相辅相承的，不可偏废。要在学业上有进步，首先要虚心，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同时，要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毅力，决不向困难低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养成了好的工作作风，就好比有了攻坚克难的"利器"一样，做起事情来才能事半功倍，无往而不胜。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程金和先生非常重视"双基"教育，也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说，有人把学校比作一台汽车，是恰当的。德育是方向盘，知识是内燃机，体育是底盘。这些零部件质量都好，而且又组装得好，才能充分发挥最大效能；如果其中任何一件出了毛病，就无法运行，勉强运行就会发生事故。他认为，提高青少年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没有

严肃认真的学风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为了培养严谨的学风，他首先从“字风”，即写字抓起。要求笔画清楚，笔顺合理，间架匀称，行款整齐，遵循规范，在他兼任语文教师，为学生批改作文时，特别注意纠正错字、别字及不规范字，并将经常出错的错别字整理成“正误表”贴在教室墙上，以提醒学生随时注意纠正。在他看来，在教学上，教师担负着双重任务——文化科学知识教学和语言文字教学。因此，端正“字风”正确使用民族语言，不光是语文教师的事，数理化教师也责无旁贷。他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是“正确传授知识，严格要求写字，多方启发诱导，加强基础练习”。

在强调打基础的同时，他强调要教方法，即金针度人，授人以渔。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培养学生有经常猎取古今中外、上天下地各种知识的学习积极性，还要使学生掌握‘会发酵’的知识，不要死记硬背。在教学上，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学生对教师能宣布‘独立’”。如何才能“独立”呢？就是要学会自学，自己开发自己的智力。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他说：“古今中外，一些有成就的人才是谁造就的？不是上帝，不全是教师，主要是自己。孔子没有上过大学，却是一个大教育家。一个学校培养学生，如果出得人才比较多，一

个重要的经验就在于它培养了学生自己造就自己的能力——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由自己调节的。只要一个人能认识到他自己不仅有被命运支配的一面，还有支配命运的一面，他就应该努力去发展自己支配命运的能力，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之后他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的诗句勉励大家，希望大家把基础打得牢固些，知识学得宽厚些。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不怕水平低，就怕不知底，最怕的是“高空作业”——悬在半空中。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毅力，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教知识，教方法的同时，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学生思想品德的修养。针对一度出现的中小学教育只重视书本教育，忽视诸种品质的培养这一状况，他语重心长地对全校师生们说：“一个人的成功，不只是光有知识，还必须具备德、识、才、学诸种品质。德，听话，服从是不够的，主要包括积极的人生观，强烈的事业心，坚强的毅力，超人的胆略，顽强的自信心，坚韧不拔的意志等。识，是见识，有敏锐的洞察力、决断力，有自知之明——不但自知其长，还要自知其短，而决不是‘我不行’，

这样就限制了创造性。才，是才干，有完成创造的能力，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学，是知识，有感性，理性，书本、非书本。”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要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从一点一滴抓起。“每一个人的道德规范，不外衣着仪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三方面，一个人生在社会上，每天都要和人们接触，不外这三方面的表现。社会风气好，说明这三方面人们都注意到了。反之，说明这三方面都有缺陷。”他要求教师要率先垂范，让学生做到的，老师首先做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主要在道德品质方面堪称学生的表率。所以，教师的言教是重要的教育手段，而身教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求身教重于言教。

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

正当程金和先生坐言起行，兢兢业业地带领广大师生向着既定的宏伟目标扎实迈进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原本秩序井然、朝气蓬勃的校园，冲击得乱七八糟，天翻地覆。“四大”一起，人人自危，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老校长”。他先是被隔离审查，继而被揪出示众，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挂牌游街成了家常便饭，最后甚至

发展成污辱谩骂，拳打脚踢。老校长最得意的“五字四句”工作作风，当时被歪曲为兜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货的“五字真言”，成了他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条主要“罪证”。抓教学质量的提高，被指责为“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不同成分的学生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被指责为“阶级路线有问题”，“是大逆不道”，与学校前任支书处事、工作上的一些分歧，被上纲上线，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当然，造反派感兴趣的还有他的历史，虽然他是起义融编的有功人员，但他毕竟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校官，因此，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无限上纲的批判，强加罪名的攻讦，令这位问心无愧的老校长感到有口难辩，万分痛心，同时也迫使他静下心来，回首往事，认真审视自己从历史的烟尘里走过来的脚印。

回顾历史问心无愧

程金和先生的故乡在黄河南边，溱洧二水交流点的西北，郑伯岭东南脚下的一道穷山沟里。他出生那年正赶上袁世凯称帝，算来应是1915年。祖辈均为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从他记事起，

二十多口人的家庭生活是艰苦的，连海盐都吃不起，常年吃廉价味苦的硝盐，只有麦收季节，才能吃几顿白面馍，平常只能吃玉米面、糠面窝窝，菜是干红薯叶和芝麻叶，吃顿萝卜菜是很稀罕的，有时候干脆就是秦椒水。为了维持生活，一家人只能披星戴月，终年劳作。为了能让家里出一个文化人，改变一下家境衰微的状况，在他八岁那年，一家人节衣缩食，将他送进私塾去读书。后又离开故乡，去城里念高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省城初中、高中就读。这期间接触了一些新文学，如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等。后来，省城群众团体召开鲁迅追悼会，他也参加了，这在当时是冒险的，因为鲁迅被统治阶级视为“赤化分子”。此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同省城高中学生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卧轨请愿，坚持了一周，使陇海铁路被迫中断。这一行动，争取了一些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国际友人到车站慰问，也使南京政府受到震动。可见青年时的程金和在思想上是追求进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宋哲元的部队在芦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之后，他带着违背祖父意愿的愧疚，放弃了已经考取的邮政总局“邮务佐”的铁饭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投笔从戎、献身抗战的道路，加入了商震领

导的三十二军。这一年他23岁。入伍之后，他从干训班学员干起，先后担任迫击炮排战士、步兵连排长、步兵连连长、团部副官。足迹遍及湖南、安徽、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等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最光彩的一次，是他在步兵连当排长的时候，一天，营里派他率一个加强班去华山侧后侦察敌人，他们翻山越岭，边搜索边前进，借着地形的掩护，在敌碉堡侧后隐蔽起来，彼此相距不足200米。当不知实情的日本鬼子傻乎乎地走出来之后，他握紧唯一一挺轻机枪突然发起扫射，战友们的步枪也紧跟着一齐射击，一下子打死了六七个敌人。最惊险的一次，是在鲁南山区反扫荡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敌人"梳篦式"的围剿，因为患病，他无法随队行动，只好由老乡背到半山坡柞林丛中躲起来。一天，曾有一小队敌人打着太阳旗从他面前30来米处走过，透过树叶缝隙看得清清楚楚。所幸他没有被敌人发现，否则定死无疑。

八年抗战之后，紧接着国共和谈破裂，开始了三年解放战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军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致使国民党节节败退，土崩瓦解，东方露出了新中国的曙光。程金和先生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总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鹦鹉学舌"。在中国的命运即将发

生重大转折的关键历史时刻，他在一篇题为《前进开辟道路》的文章中写到："不前进，永远是不会有出路的。……我们处在社会上，最低限度要能进取和有所作为，起一点推动和维护的作用，不要不死不活混一天算一天，那也太乏味了。当然，前途都是自己开辟的，等待机会是愚人的行为。前进吧！出路原是前进引导出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当爱国将领傅作义宣布休战接受改编后，他的心情是为化干戈为玉帛、为国家保存了元气而感到兴奋的。"半生奔波，迷途未远，择善固执，此其时矣！"这正是程金和先生当时的心声。

起义之后，作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他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斗志，参加了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的战斗。在行军途中，通过兵团《子弟兵》报，他正式声明脱离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西北、华北解放纪念章，因表现优秀，列席了一九零师教导团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并受到表彰。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虽未赴朝作战，但在辽西兴城新兵补训师任教育科长，任务是接受训练新兵，并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补充部队。战争结束后，六十四军撤回辽东省，在凤城县，他又受命担任军文化轮训大队大队长。

轮训对象为排、连、营、团干部，任务是补习文化，适应部队现代化的要求。这项工作他从事了两年，使他由文化教育的门外汉变成懂教学、会管理的行家里手，为他以后转业从事地方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回首往事，他是问心无愧的。

身处逆境不沉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有一段时间，造反派们都忙着到党政机关“闹革命”去了，老校长这只“死老虎”倒成了一个无人过问的闲人。尽管自己蒙受不白之冤，遭到了不应有的待遇，但他一旦“闲”下来，还真有点不习惯，虽说回天无力，他总想尽自己所能，为学校办一些实事。于是，为了防止社会上打砸抢对学校的冲击，他同有责任心的教职员一起自愿组合起来，在隆冬数九，值班守夜护校；看到校田地里的窝瓜长大了，猪咬狗刨无人管，他就一筐筐挑回伙房给住宿生吃；看到校园里自生的扫帚苗成熟了，他便一棵棵拔起来，再一把把捆扎好，准备给各班做扫除用具；教室的窗户开了，任风吹雨淋，他见了就随手关上；桌子椅子被搞恶作剧的学生

损坏了，他便抄起工具一点一点地修好……当然，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久，当新的一轮“十二级台风”刮起的时候，他再次被“打倒在地”，同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分子、老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变色龙、小爬虫、流氓、大破鞋……一起被挂牌批斗，并被强行按头、弯腰成九十度服“躬身刑”。劳动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什么活重让他干什么，有意识地对他的身心进行摧残。一些人经受不住非人的折磨，含恨自杀了，却落了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此时此刻，老校长什么念头都起过。但他觉得，在人妖颠倒、良莠不分、是非莫辨的年代，死是廉价的，不值得的。他深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正在喷薄而出。因此表现了极大的耐性。他坚信自己没有罪，不能轻易去死，还要继续为人民服务。

老校长的家庭成员也备受牵连。“墙倒众人推”，特别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更乘机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挑拨离间，企图拆散这个家庭。老伴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被人冷落不说，子女们在婚姻、上学、招工等方面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但一家人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尚未像有些家庭那样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多少让这位老人心

里上有一丝安慰。

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弄得他心身疲惫，度日如年。形势的发展又好似二八月的天，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忽然有一天，在学校实验室，召开批判会，他被从劳动工地带进来。让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是文革以来少有的“待遇”。批判开始了，似是而非的发言一个接一个，有的简直不知所云。最后一位革委会成员宣布，程金和不是“三反”分子，经研究应予“解放”，暂担任保管员。这真令人哭笑不得！

程金和先生是一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他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只要有具体的固定工作，精神上就有了寄托，他就感到心里踏实，就要想方设法把工作干好。在那非常时期，他当了两年半的保管员，跟当校长时一样，脚踏实地，严格要求，认真负责。整天扎在库房里整理东西，各种物品摆放整齐、有条不紊。抬筐绳子断了，接起来；筐底掉了，用铁丝固定上；门锁被雨浇坏了，就在锁上方钉块旧油布或塑料布苫起来……。一些学生看到后说，“筐加底”、“锁戴帽”是老校长的创造。为了物尽其用，不造成浪费，他利用库房门前的小黑板，“颁布”了一系列物品使用制度，有时还就事论事写上一段小评论，引导学生树立勤俭节约的好

习惯,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期间由于缺语文教师,又让他兼任两个班的语文课,两份工作一人担,工作更忙了,休息的时候更少了,但他却乐此不疲。在 1969 年 11 月 23 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就不能计较职位高低,同是做一件事情,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即使一时尚不为人们所认识,终究是会得到谅解的,言过其实,'哗众取宠',是毫无用处的"。

"我虽然年近花甲,不希望退休,只要还有精力就长此干下去,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只要别闲散着。收发工人说,报窗报纸没处投,要交给我,我就欣然接受过来。高中个别学生要搞特殊化,我不苟同,坚持原则,刚一露头就压下去了。"(笔者注: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半年来的工作简直是战斗性的。只要一进学校门,便开始奔走,常常是半天之内不停步,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比零售商掌握的东西都多,比谁走的路都多。"

"我常听到人们对我说:全校师生谁也没有您忙,全校数您的事多!晚间走在街上,老贫农见我来校,也说真辛苦!我不过在这个小天地里,似乎有点忙,事有点多,或者说有点辛苦,不过是相对

说的。现在我才感到有点像人民勤务员了。”

这虽有点“讲用稿”的味道。但从中不难看出程金和先生的内心世界，那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那种身处逆境而不沉沦的执著，那种公而忘私、为民服务的精神，确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县革委会的一名负责人通知他去东风学校（原来的一完小）当校长，收拾那个被派性搞得人心涣散的乱摊子，他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一年后，又把他从校长位置上撤下来，让他管事务、搞基建；再后来，教师打不开点，又让他兼一个班的语文课，他也一口应承下来。此后，又参加中学教师备课学习班，他被分配到语文组，负责作文的批改与讲评。这又给了他一个阐述从端正学风、打基础入手，提高青少年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机会。后来，又责成他同一名姓吴的同志在原东风学校筹建二中，为了维护公家利益绞尽脑汁，昼夜操劳，连觉都睡不安稳。二中成立一年多，又和一中合并了。折腾来，折腾去，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

1974年末，上级提出干部可以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程金和先生很快写了退休申请，而且很快被批准了。开始一段，他感到无官一身轻，每天

背着篓子上山捡柴禾，捡茬子，乐得清闲。时间久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又感到精神空虚，好像一天价悬在半空没着没落。一天，镇委通知老校长开会，主要安排几位退休干部协助管理几所小学，并按居住情况做了具体分工。他和另一位老党员被分配到原二中那所小学。这个闲不住的人，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一样，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一有工夫就带着笔记本到各班去听课，观察学生的课外活动，还注意学生完成作业和批改情况，而后总结一份材料，同教师们交换意见，定期改进教学工作，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个性，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那就要坚持做下去，什么非议也不在乎。如多次遭受批判的"五字四句"工作作风，他始终认为是对的，绝不轻易放弃，一有机会，他便力图使之在教职工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尽己所能拨乱反正

"四人帮"倒台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开始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亟需程金和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的内行领导重新出来工作。在当时教育局领导的一再请求下，在学生

家长和老师们的殷切盼望下，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为了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补回来，尽快改变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他又一次以大局为重，重新上岗工作，第三次担任围场一中校长！

在全体教职员工欢迎会上，他即席讲了一段话。回顾了以往的历程，更主要还是放眼前瞻。他抱着错的改正，对的坚持的态度，决心 跟上时代步伐。他旧话重提再次提到给自己带来荣耀，也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五个字四句话”，希望使之发扬光大，经过持久地、严肃认真地、细致耐心地辛勤劳动，努力形成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习气氛浓厚的，既重视言教又重视身教的，既注意提高学生又注意提高自己的，既提高法制观念又发扬民主作风的正常的教学秩序。他说：“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而学校就要转移到教学上来。我愿意向大家暂定一个五年计划，实在干不动了，再做退一步打算。”

在这个“施教纲领”的指导下，程金和先生和全校师生一起，以其一贯的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从整顿秩序，强化纪律，转变学风，端正校风，夯实基础，提高质量入手，在教学育人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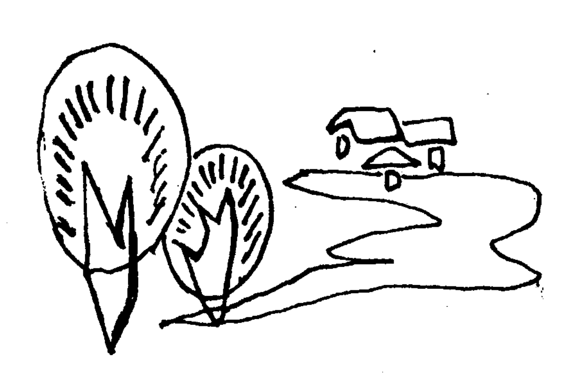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因积劳成疾和文革期间的摧残，老校长未能完成他制定的“五年计划”，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便将他击倒在病床上，不得不赴京诊治疗养，万分依恋地离开了他毕生热爱的工作岗位。

1983 年 8 月，老校长被批准离休了。病情稍有好转，他闲不住的“老毛病”又犯了，通过查阅二百多份中考试卷，他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从卷面上看有关的教学问题》，对“双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改进意见，他谆谆告诫各位老师，一要指导学生认真读书；二要培养良好的学风；三要加强自身学习，永不自满。他还带着有病之躯，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知情者，查阅档案材料，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完成了三十二年校史的撰稿任务，为围场教育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程金和先生不仅精神矍烁，办事干练，知识渊博，文笔也是相当不错的。初、高中时期，他就是“高材生”。从军期间，经常在兵团报纸上刊登文章，其中文采斐然的《谈鬼》，还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一时文名大噪。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曾别出心裁地在校园办了一块墙报，叫《片言》旬刊，刊载一些对学生处世立身，道德修养有益处的短文，

并坚持亲自动笔，写了 65 篇，前面提到，即便在他当保管员的时候，他也不忘利用黑板报写一些兴利除弊的小评论。可以说，利用小黑板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是程金和先生的一大发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字基础，退休之后，他萌生了以文字形式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一个总结的愿望。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同撰写校史时一样，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喜鹊搭窝、紫燕筑巢的顽强毅力，日积月累，百川江海，最终完成了一本 13 万字的回忆录《老校长的脚印》，让我们看到了程金和先生正直坦荡，敬业爱国，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九死不悔的壮丽人生！



留取书香励后生

——记已故书法家赵军先生

尹志杰

在人类即将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前夕，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文联牵头，为已故著名书法家赵军先生举办了一个书画遗作展。在展览前言中，曾这样评价赵军先生的书画艺术及举办这次展览的意义：

“在围场乃至整个承德书法界，论成就，赵军先生无疑是书法艺术上的一座高峰。赵先生祖籍河北饶阳，家学渊源深厚。受父兄熏陶，自幼酷爱书画，终生矢志不渝。无论是读小学，做学徒，还是当店员、创作员，始终锲而不舍，临池不辍。始学颜体，后改魏碑，进而研习‘二王’，兼及篆隶，根基日益坚固。更为可喜的是，五十岁后他舍弃诸碑帖，独创‘赵体’，自成一家，实现了由临摹到创新的飞跃，进入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王国。赵老先生精于楷书，结构严谨，体势峭拔，笔画遒劲，棱角分明，一丝不苟；行、草、篆、隶，舒展沉稳，

法度森严，颇具大家风范。绘画则由《芥子园画谱》入手，走的是兼工带写的路子。满族知名学者布尼阿林先生曾赞颂他‘书名传塞上，翰墨誉山城’，这是当之无愧的。赵老生前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多类书展并屡获大奖；一些书法精品还入选各地碑林，树碑刊石，流传千古。此外还为机关单位、亲朋好友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如今均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我们举办这个展览，目的不光要展示赵老先生丰富的艺术作品和辉煌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激发人们的艺术情趣，陶冶人们的艺术情操，以赵老先生为榜样，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创新，最终创作出既具深厚底蕴又有鲜明时代风格的书画作品，为人民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赵军先生（1920 年——1989 年）以弘扬书画艺术为毕生追求，一生勤奋，铁砚磨穿，留下了大量颇具水准的佳作，是热河书坛一位硕果累累的知名书法家。赵军遗作展，共展出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60 余幅，其中大多数为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很多都是其生前参加省以上书展的获奖作品，还有一幅入选河南翰园碑林的拓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称得上是赵军先生书画精品的一次集中展示。展览吸引了不同阶

层、不同年龄的众多观众，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边细心欣赏这些凝聚着作者毕生心血的艺术佳作，一边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木兰大地为养育了这样的艺术家而骄傲；木兰儿女为拥有这样的艺术家而自豪。当然，赵军先生不光属于围场，也属于承德和整个燕赵大地！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赵军先生不是一位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也从不靠别人的“炒作”而自高身价，他的出名，完全靠作品说话。而赵军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楷书，又是那样的个性鲜明，卓尔不群，格调高雅，富于魅力。在参观赵军遗作展之后的座谈会上，围场书画爱好者纷纷发言，在肯定赵军先生的书品、人品的同时，认真探讨他成名成家的原因。大家认为，赵军先生之所以获得成功，第一源于他的家学渊源。乃父赵汝骧是光绪末科的县学生员，科举废止后，在家继续攻读经史，嗣设塾授课，教育乡里后生。一生好学不倦，酷爱书法，学颜真卿字，名噪一时。其于书法艺术的执着精神对赵军先生影响极大。第二源于他的勤奋刻苦，持之以恒。赵军先生自幼习字，日课百余字，后来工作之余，见缝插针，从未间断，可谓活到老，学到老。第三源于他的转益多师，勇于创新。赵军先生习字从柳公权《玄秘塔》入手，后又

学颜真卿《多宝塔》、钟绍京《灵枢经》和欧阳洵的《九成宫碑》。十七岁之后，在师兄宗少云的影响下，转写晋、魏名碑。除学习张黑女碑、清道人李瑞清帖外，对张猛龙、郑文公、龙门二十品等碑致力尤勤。正是这一转变，使赵军先生的书法创作产生了一个大的飞跃，并由此找到了突破传统，自成面貌的创新之路。谈到这段经历，满族知名学者布尼阿林在记述赵军先生习书道路的《翰墨生涯六十年》中曾这样写道：

"赵军回顾几十年学书作字的历程，颇有体会。他认为自己所以在书艺上有所成就，主要是在学习中以张、郑两碑为主，从而把学习的字体笔画、结体的精神面貌运用到自己所写的字当中去，使自己的字又由生到熟中来。此后，又大胆地离开魏碑，致力于王羲之字《集锦福兴寺碑》(又称半截碑)、史晨碑、峄山石刻、梦英《部首目录碑》及《草字汇》等书，对行、草、隶、篆(包括石鼓、钟鼎)多种书体作了尝试。长期的实践，他的字已经离开了各种碑帖的束缚，走上了自我书写的道路，从心领神会中吸取各种碑帖的笔画起止、结构穿插等精华，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具一格的书体。他以楷书见长，同他学书的人已遍布围场的城乡，可以称之为'桃李满木兰'了。无怪乎人们一见到他

本人或者以他为师的书法爱好者的书法作品，就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赵体’。这是当地人们所公认的，并非过誉之词。”

除了上面三个因素外，赵军先生在书艺上的成功还得益于他丰厚的文学艺术修养。赵军先生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喜爱国粹京剧，是围场有名的票友，在三国戏中扮演一代奸雄曹操，唱、念、做功俱佳，对人物性格把握得恰到火候。他擅长写诗填词，一部手抄的《诗词联语集》，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留存作品不下百余首，其中不乏格律整饬，意境悠远，词句清新之作。如写于丁丑年端午节的《相见欢·端午行》：

“端阳晨曦步野，绿林中。
细沙嫩草鲜葩，静无风。
采蕲艾，轻着手，湿露浓。
远山曲水游人，在画屏。”

以画家的眼光看家乡的景物，以轻灵的笔调写佳节的风情，正所谓诗中有画，情景交融。另如以赞美围场历史、风光为题的《木兰赞》，也是一首文质并茂的佳作，赵军先生曾以篆、隶、楷、行不同书体反复书写过，足见其自爱之情。全诗如下：

万树葱茏数木兰，秋夏宜人气自然。
伊逊秀水环古道，锥峰拔地欲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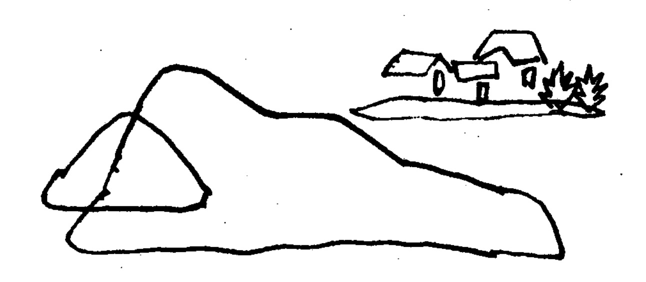
西北绵亘山河翠，东南沃野米粮川。
古来帝王游幸处，今朝林牧续新篇。

1984年4月，赵军先生随承德书协同仁去洛阳、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参观学习，登临胜迹，瞻仰碑林，"博览真谛冲茅塞，广开眼界饱襟胸"，触景生情，文思泉涌，共写下诗词二十五首，形成了他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由于文学功底深厚，赵军先生许多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是自己创作的，短的如谈自己学习体会的联语："笔至欧柳方入境，书追晋魏始通神"；长的如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长城谣》(32韵，224字)，都主题鲜明，文词精美，绝不无病呻吟，故作高深。单只这一点，就不是那些狂妄地否定传统、傲慢地目空一切的所谓"现代派学家"所能企及的。

赵军先生的另一可贵之处，就是他自觉遵循"二为"方针，始终坚持书法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他为革命烈士陵园题字，为博物馆抄录清代碑文，为各机关学校商号题写匾额，为省、市、县各种展览书写版面，为各种盛会撰写贺词，甚至他喜爱的街道主任离任，他也要送上精心书写的条幅，称赞她："忠恳办事，公私清明。谦诚待人，休戚与共。……居民乐道，居委和融……"对于向他登门求教的人，赵军先生更是诲人不倦，耐心指

点，毫不保留地传授学书心得。在他的《诗词联语集》中，留有几首《判仿批语》，就是他奖掖后进，甘当园丁的珍贵纪录。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写字坐偏字不正，注意上下应紧松。起落用笔须有法，点画提顿要分明。结体中心求稳定，两部左右记均衡。阅后留言当记取，自学自评法自通"。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捧读遗稿，我们不能不为赵军先生那蔼然长者之风而深深地感动。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必将与日俱增。如何走出一条成功的艺术之路？如何应用所掌握的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在当今，回顾赵军先生的艺术生涯，无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



抗美援朝英模代表王治国

王 福 兴

2000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500名英模代表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会见。其中就有围场籍的一员名叫王治国。

王治国曾用名杨国钧，1930年2月出生在围场道坝子乡顺景。15岁参加革命，17岁(1947年)为冀热16军区的骑兵通讯员。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过卫生员、警卫员。后到东北抗大学校学习，历任排长、连长，抗美援朝时赴朝鲜参战。回国后任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

几十年来，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论处在什么环境下，他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所在部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入伍不久，王治国就赶上了解放围场的战役。当时围场是被国民党13军所部占领着。他们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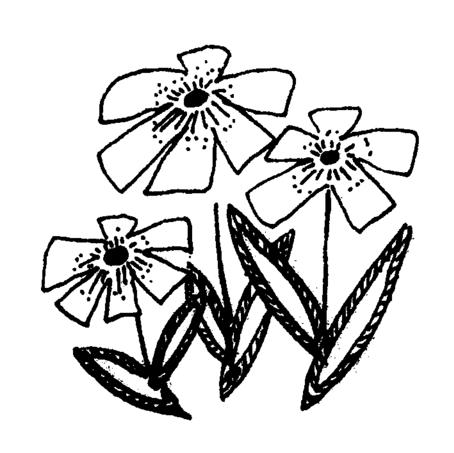
高临下，山头有碉堡，设有轻、重机枪封锁着重要通道，敌人把守的似乎十分坚固。我军经过侦察和严密的筹划，派两个营施实解放围场的战役。当时通讯设备不完备，只能靠骑马通信。这在过去战争的年代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王治国作为一名年轻的通讯员，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为部队通信。一次，他骑着一匹快马从围场南面的部队指挥部往北面的部队指挥员处送信，中间要经过围场街边的一个桥，这是必经之路，当他骑着马刚要接近桥上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密集地进行扫射，使王治国无法前进一步。这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尽快解放围场的战争大事。于是他掏出手榴弹向敌人扫射的方向投去，一股浓烟顿使敌人机枪失声。他急中加鞭催马冲了过去。刹时间敌人机枪又开始扫射。王治国连头都没回直奔我军分队目的地。当他把信安全送到首长手中，感动的指战员们频频和王治国握手，并表示坚决消灭国民党这股顽匪，尽快解放围场。之后他又和小分队偷袭了监狱，救出了关押我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由于他送信准时，使我军两面夹击重点攻破的作战计划得以实施，解放围场比较顺利。而后王治国就去东北军校学习，毕业后任排长，在滦平张百湾和敌人

打了一次遭遇战，他带领全排战士，以少胜多，运动截击，消灭了多我一倍的敌人，受到上级军区首长的表扬。

王治国在张百湾战斗后，不久便提升为连长。刚上任几天他就接到上级命令，带全连赴朝鲜参战。到了朝鲜，给他的任务是坚守鱼隐山，切断敌方增援部队。鱼隐山既是朝鲜的四大名山之一，也是我军深入敌后的重要交通要道。此山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冬季时常缺水，战士们用雪化水，再没雪的条件下，为了保存自己，狙击敌人，王治国他们喝自己的尿，也不退缩一步。粮食供应不上，他们就吃山上的野果芽来充饥。在这样的条件下，王治国带领全连坚守鱼隐山阵地一年之多。在这一年之中，敌军为占领此山，不惜一切代价，每天派飞机轰炸，隔几天就用大炮轮番轰击，并组织敌军无数次向阵地发起冲锋，但王治国带领全连英勇作战，没让敌军占领一寸阵地。有人记述当时的战斗经过："王治国带领全连坚守鱼隐山，临绝境而雄风故我，沐弹雨而斗志弥坚，阵地高程被敌人削去三尺有余，境遇之艰苦、博杀之惨烈，闻所未闻。然我军阵地战旗猎猎，幸存官兵铁骨铮铮，敌始终不及逾越。面对骄横野蛮的美帝飞机，英雄王治国忍无可忍，抢过战士机枪向敌机射

击终以轻武器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长我志气，灭敌淫威，创热兵器对抗高空飞机绝妙仅有之战例……，著名的鱼隐山阵地坚守战，全连立了集体三等功，王治国本人荣立大功”。

抗美援朝胜利后，王治国回到祖国，始终保持一位军人的本色。长期担任团(师)领导的王治国，不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不眼盯在军功章上自沾自喜，而是思索着如何带出精兵。由于他训练有素，过去一向落后的团队在全军区装甲兵军事比武中荣获总成绩第二名，受到军区领导的好评。军区把王治国这个装甲团当作队形的骨干团列于前位，接受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因表现出色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广扬绿色福音的李景星神甫

毕显明

李景星，字七品，1920年出生于围场县镶黄旗三岔口马连道村。15岁入赤峰修道院读书，1944年入长春天主教修道院，1946年转入绥远神哲学院深造，1950年于呼市神学院毕业。后经陕坝教区比利时籍王守礼主教祝圣晋升为司铎，在陕北靖边县毛团库伦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并主持该天主堂教务。1960年返回原籍马连道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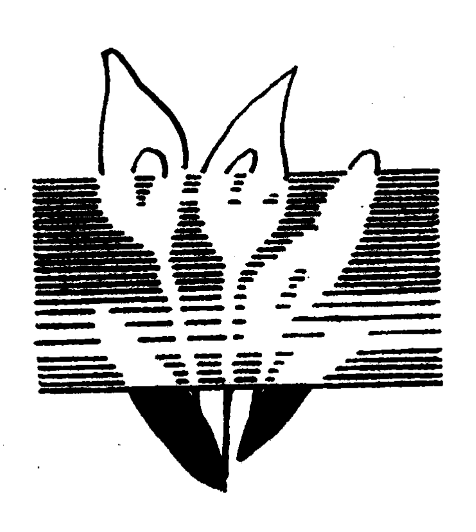
李景星神甫一贯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始终如一地按着天主制定的十条戒律和教规教义约束自己，从不搞外来渗透，也不参与国家法律以外的活动。

由于李景星遵纪守法，精通教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被推选为中国天主教第二届教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承德地区天主教务组组长住围场马连道本堂，负责围场和丰宁两个县6个堂区的教务活动。并聘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协委员，承德市政协委员。

李景星身居围场，心系围场。他倾听过围场七十余围绿色生态惠及人类、惠及围场人民的真实讲述，也目睹了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冲去房屋，毁去土地，卷走羊群，失去亲人的凄凉惨景。对此，他在传授《圣经》的同时，极力宣传绿色福音。他从世界生态环境危机，讲到国际上“绿党”的出现；从森林的作用，讲到中国的“绿色万里长城”；当他讲到马连道村，因森林植被破坏严重，致使山洪暴发造成重大损失时，声音沙哑，潸然泪下。感动的教友们热泪盈眶。李景星擦去眼泪动情地接着讲：“马连道村的山洪灾害，是大自然对人们破坏森林植被的惩罚；也可以说是“主”给我们的惩罚。因此我们做教友的应吸取教训，多为人类做善功呀！”

李景星神甫不但在教友中广扬绿色福音，而且身体力行，从实际做起。在李景星的倡仪下，乡政府批准划给 60 度以上荒山 800 亩。之后，他发动教友义务出工整地、栽植、除草，成活率在 80% 以上。后他又发动教友自动出钱投入生态建设之中，李景星把政府补给他的那些津贴费也无声地投入其中。在栽树的同时种山杏 100 余亩，种草 400 亩。每年又打饲料 10 万公斤，剪树枝 1 万公斤。

本村的山上绿了，李景星没由此陶醉其中，他对其它教友居住地的绿化也牵挂脑中。为了发动教友多栽树，做善功，他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走到哪里就把绿色福音广扬到哪里。李景星虽不在了，但在他倡导下搞生态建设植树造林已初具规模，满山遍野的树木郁郁葱葱。教友们目睹这用汗水浇灌起来的绿树，就情不自禁地忆起已逝去的被县绿化委员会授予“绿色劳动模范”称号的李景星神甫。



民国以后围场地域的变迁

白雯萍

木兰围场有多大,在第六辑《围场文史资料》中王振武同志已考证的很详尽并得出总面积为15000平方公里之说。似应以13500平方公里更接近实际些。

而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前后围场地域的变迁,作为资料供有兴趣研究的同志参考。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日伪大同二年),日寇侵占热河后,伪热河公署公布围场面积是15300平方公里。

这时候多伦(1913年撤厅建县)隆化已建县二十多年了。从木兰围场析出了一些地方,归多伦,丰宁、赤峰、隆化等县管辖,可见此数字不确切。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拟定建立隆化县以后,木兰围场的面积缩小经过四个时期:

一、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伪满康德十二年)缩小2900平方公里。其去向是:

(一)1912年(民国元年)将西部正黄旗营房,正红旗营房和其下属的卡伦划归多伦诺尔厅885平方公里。

(二)1912年(民国元年)将红旗营房苏木沟及附近卡伦划归丰宁县面积约425平方公里。

(三)1912年(民国元年)从柴火栏子到羊草沟东境约840平方公里划归赤峰直隶州。

(以上如此计算,尚须考证——编者注)。

在解放初期,县政府公布围场面积为12400平方公里。此数沿用到1955年。

二 1949年至1955年围场面积又缩小1933平方公里。

主要去向是:(一)1949年秋,将半截塔区(今属孟奎区)碑梁沟分水岭以南地区,伪满称梁前八牌划归隆化约270平方公里。

(二)围场东境,1948年将新地乡岔道子东之三姓庄、孟干沟至松树梁分水岭划归喀喇沁约25平方公里。

(三)1956年将新地乡狍子沟门南双敖包划归喀喇沁约6平方公里。

(四)1956年4月20日围场与克什克腾旗,边界问题纠纷协商解决,划定围场北境吐鲁根河上游(沙金子至喇嘛山)南移,至吐鲁根河沿岸约

144平方公里，划归克旗后由红山军马场使用。

到1956年围场统计局公布面积为10417平方公里。

三、1957年至1981年又缩小1248平方公里。主要去向是，1973年围场、多伦边界问题解决划定，将大红花山岭东山麓划归多伦107平方公里。其余差数待查。

四、1982年全县农业自然资源调查面积是9219.72平方公里。此次调查后继续缩小：

（一）1987年围场、克旗边界纠纷问题解决后，将塞罕坝主分水岭以上、拜察河源头等地划归克旗，176.3平方公里。

（二）1988年4月4日承德行署与锡林郭勒盟行署协议让与多伦6.8平方公里。

据自治县1933年十月土地局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结至现在围场面积应是9036.62平方公里。但对外仍有人应用围场总面积为9219.72平方公里这个数字的。

清末民初围场地方行政建制考

陈 百 谦

自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两千余年以来，县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最稳固的行政建制。

一、清代围场第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厅的建立

木兰围场原是漠南喀喇沁部和蒙古翁牛特部的游牧地，后来敬献给了康熙皇帝。康熙帝从此在这里设围打猎。康熙四十五年(1706)派驻护围部队，设立专门的管围机构，围场总管隶属于理藩院。

康熙末年，热河、八沟和"察东"(察哈尔东部)一带人员俱增，到雍正年间清廷在这些地方相继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热河、八沟、多伦诺尔等厅。从乾隆初年开始，围场护围官兵捕获盗围之犯后一般交由八沟厅审理处罚。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年(1739)清廷批准理藩院理刑司议定的木兰围场新围规时明确规定："围场内偷猎牲畜，盗伐木植之犯交八沟理事同知治罪"；道光七年

(1827)，木兰围场护围军事管理机构及人员编制改归热河都统管辖。军机处重新拟定南苑及木兰等处围场围规，规定对违犯者根据情节分别处以枷、杖、徒、流等刑罚，其中木兰围场围规交热河都统监督木兰围场护围机构和平泉直隶州（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沟厅改为平泉直隶州）执行，前者负责缉捕盗围人犯，后者负责审判定罪，同治二年(1863)木兰围场放垦，规定3年后升课，亦由平泉直隶州征收围场内耕作满3年农田的田赋。

围场放垦后，承领荒地经营农业者或租佃或大量雇工，使不少周边贫民和直（隶）鲁（山东）流民不断涌入围场谋生，加上各地商人，陆续到此经商以及承领荒地者日益增多，围场人口也逐渐增多，因此说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光绪二年(1876)，清廷在已开垦的罕特穆尔围场二道沟门（今四道沟乡）设置围场粮捕厅，隶属热河都统辖区内的承德府。设粮捕同知（从六品，职务相当于知县）1员，征收钱粮，缉捕界内盗贼兼理旗民诉讼。又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这是清代围场第一个正式守土治民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结束了围场地域从明初以后至少几个世纪多没有地方行政机构的历史。

光绪六年(1880)九月，随着农垦区和人口的

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围场粮捕厅治所移至克勒沟。二年后热河提标唐三营守备向围场增派94名绿营骑兵,以维护正围外农垦区的治安。

光绪末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借编练北洋新军之机培植私人势力,为练兵急需款项,袁世凯鼓动练兵处主办大臣、满清贵族庆亲王奕劻以练兵处的名义上奏慈禧太后请全面放垦围场以筹措练兵经费,并建议为专一事权、便宜行事请将围场地方行政划归由袁世凯统治的直隶省管辖。这一奏议很快得到批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围场地方行政于光绪三十年(1904)划归直隶省宣化府,粮捕厅改为抚民厅,与张家口、独石口(今赤城、沽源县)、多伦诺尔(今多伦县)并列为口北四厅。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围场正式实施全面放垦,袁世凯派改编的淮军骑兵一营随屯垦总办何昭然进驻锥子山街,取代木兰围场总管统率的护围满蒙八旗官兵和光绪八年(1882)派驻的四汛绿营骑兵。至此,历时200年的护围军事管理体系停止作用。

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奏请,清廷撤销木兰围场各级护围机构,正式取消护围满蒙八旗兵编制,以其原兵租地安置护围兵且及其家属,使其转而经营农业、畜牧,成为享有

一定特权的普通旗人，只保留原左右翼长以管理这些人的旗籍。同时裁撤原四汛绿营兵。由围场抚民厅按清廷颁布的“新政”章程组建巡警局维护地方治安。

民国元年(1912)经留任的热河都统昆源向民国政府呈请，围场抚民厅重新划归热河管辖。

二、围场县的建立

民初撤销府、州、厅建县是当时革除旧制的举措之一，是在民国的建立过程中统一分批进行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3个月期间(1912年1月1日—3月10日)虽发布过一系列革除清朝旧制度，包括官厅称呼等在内的命令。但在袁世凯控制的中国北方各省区根本不可能发生效力。民国2年(1913)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成功，才下令在全国推行所谓“革除前清旧制”，围场当然也就是在这次“改制”中由厅改为县的。

根据有关资料，民国2年全国共撤销23个府(其中包括承德府)，137个州，79个厅，全部建为县，并新置大名、张北等24个县。热河区域内撤销朝阳、承德2府，设渤海观察使辖原承德府辖区(民国3年热河特别区成立时改为热河道)，其下辖的围场厅以及周边的承德州(今承德下板城)，平泉直隶州、赤峰直隶州一并改州建县；热河区域

外，曾与围场并列为口北四厅的多伦，独石口、张家口也在此次同时改厅建县。并从张家口析出北部地区新置张北县。全国另有55个州、厅级行政机构包括新置的县。至次年，即民国3年(1914)才完成建县任务，其中包括围场县的近邻经棚县(今克什克腾旗)。

三、对《围场县志(残稿)》建县时间的质疑

民国20年(1931)，由李桂芳等纂修的《围场县志》(现存残稿)中涉及到围场的建县时间。所有读过县志残稿的人都知道，文中所存纪事部分各条第一句话相当于一般志书中的大事记。其以下的文字一般都是近一步说明起因和结果，类似于注解。县志残稿中民国元年条的原文是：

“民国元年壬子，改围场仍归热河管辖”

说的是上文提到的围场抚民厅由直隶省宣化府重新划归热河都统辖区的事，由此可知此条纪事的主旨是行政区划的变动而非行政机构的改变。这条纪事下面的文字进一步说明划归热河的起因，顺便提到围场改为县的事情，而且用了“遂更名曰围场县”。好一个“遂”字，原来是时间概念的模糊语言。

笔者根据多种有关资料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几点看法：(一)民初的撤府、州、厅建县对南京

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来说，无论其真共和、假共和都关涉到了除旧布新的问题，围场周边的府、州、厅均在同一年改县，那么围场并非新置之县，作为一个孤悬塞外的改制县级行政机构，无任何理由而单独进行，除非与南京临时政府有特殊关系者，是根本不可能早于民国2年全国各地的。尤其北方各省区均为统一步骤，民国元年厅改县在中国南方也是有的，例如上海附近的川涉厅，即在那年改为川涉县。仅此一条，即可以断定县志残稿的记述有误。

（二）有关围场于民国2年(1913)建县的旁证资料很多。民国期间北京政府内务部主编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及民国22年(1933)4月北京出版的《东北县诘纪要》等有关文献均明确记载围场于“民国二年改县”，其权威性和史料价值远在语焉不详的围场县志残稿之上，当代1979年版《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古今地名录》等权威资料均与此吻合。

此外，张金祥、杨野等同志从长春、沈阳、大连等图书馆查阅到并复制回的日伪时期大量资料（现存县档案馆），诸如辽宁图书馆藏日本人相原孝久所著《蒙古地诘》、大连图书馆藏《满州事情》

中热河围场部分等资料关于围场建县的内容与上述文献记载并无异议。

(三)县志残稿中的纪事错讹颇多。如1985年第二次油印本第五页正面“同治元年壬戌初次开放围场边荒招民开垦”条与《清实录穆宗实录》和当今文史界已成定论的研究成果大相径庭,其记述的时间是蒋琦龄、瑞麟等朝野有关人士创议“开垦围荒”的年份,并非实际开垦年份,作为志书,则不足为训。再如残稿中把厅“同知”均称谓县令也算错误。

综上所述,在有大的历史背景制约前提下,以及诸多权威资料的旁证下,县志残稿中涉及的围场建县时间问题是不可信的,而民国2年(1913)建县的记载是有大量、多种史料依据可查阅核对的,不会有误。

注:作者原牧工商职工现广东省博罗县某私人企业作会计工作



一部难得的地方文史资料

—读《围场县文史资料》之收获

谢 井 泉

笔者酷爱历史，对于历史资料尤其是有关北方的历史资料情有独钟。前几天购得一本河北省围场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写的《围场县文史资料》(1984年第一集)，爱不释手，回到家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仅用一天时间就全部读完了。掩卷思之，受益匪浅，同时也为作为一个县级文史资料部门能编出如此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文字流畅的资料而由衷地赞叹。

笔者看完此书有四大收获。

第一、看完此资料使我如同到围场县去旅游了一次。围场县距我地区虽然不远，但我对她的历史及文物了解很少，看完此资料后，使我大饱眼福，一是通过详细的文字资料我了解了围场过去的历史，也了解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二是通过大量图片看到了珍贵的大型猪首型玉

玦，全国仅有的几枚刻有诏书的秦代大铁权，看到了围场内皇帝下令立的石碑及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也通过《木兰秋狝图》看到了清朝皇帝“木兰秋狝”的盛况，通过地图也了解了燕长城的走向，等等，令我叹为观止。

第二，使我对红山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红山文化最早因发现于内蒙赤峰的红山而得名，分布于赤峰南部及辽西一带。可是这次看完此资料后，得知在河北的围场县也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相同的文物，如猪首型玉块和玉环和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积石冢大墓中发现的几乎完全相同，且比牛河梁发现的要大，围场发现的猪首玉块高达 14.5 厘米，宽 10.5 厘米，重 0.8 千克，而牛河梁发现的猪首玉块高 10.3 厘米，宽仅 8.7 厘米，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围场县下伙房村遗址与牛河梁遗址都属于红山文化，二者可能有继承关系，而下伙房村墓主人的地位要比牛河梁积石大墓的墓主人地位还要高。二是在 5000 年前在河北北部、赤峰南部、辽西生活着一支有统一信仰、宗教的民族，这一支民族究竟是历史上哪支民族，还有待于专家进一步考证。

第三，使我对燕长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距我省专家考证，燕长城，在辽西地有两道：赤峰

北部一道,赤峰南部一道。但我对河北北部的燕长城不太了解,通过读此资料,得知,在河北北部燕长城也有两道,且有一段是重叠的,然后又分开。笔者认为赤峰南部的长城当是秦开打退东胡后建的,因这一线长城东到辽西北票市境内后就是终点了,而赤峰北部的长城即史书记载的“自造阳到襄平”的燕长城,后又延到朝鲜半岛。这道长城后来被秦、西汉沿用。东汉时把长城线路南迁到今明长城一线,而后世又都在此线路上进行维修,致使这道长城得以存在至今。而燕秦西汉长城由于没有得到后世维修于是就荒废了,也被人们遗忘了,同时也使原本属于塞内的河北北部、辽西反而成了塞外。清乾隆皇帝在一次狩猎时意外地发现了燕秦西汉长城,他亲自撰写碑文,记载此事,但他认为他发现的是秦长城。直到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作了大量考察后才得以明确燕长城的走向,但现在关于燕长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燕两道长城的终始点,沿线的郡、县城位置及长城内五郡的交通问题,这需要冀、蒙、辽三家联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

第四,使我对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有了详细的了解,以前对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只是浅层次了解,认为那不过是皇帝们在寻欢作乐,通过

读此资料，我认识到“木兰秋狝”是为了“习武绥远”，即通过狩猎活动来保持八旗子弟的英勇善战的传统，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使国家安定，政权稳固。正由于康熙、乾隆重视“木兰秋狝”，才使得八旗子弟没有“误于安乐”，保持了英勇善战的传统，很好地应对了内乱和外患，出现了康乾治世。而自道光皇帝废弃“木兰秋狝”结果使八旗子弟成为纨绔子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清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对此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阐述得很深刻，笔者在此不再多说。

读一本好书，犹如享受一道盛餐。我希望围场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编出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供读者们享受。



责任编辑：王福兴
封面设计：王德民
校　　对：陈沭辛
　　　　　王福兴